

裸体的共产党

增补版（上）

[美] 克里昂·斯考森 保罗·斯考森 方伟 著

获美国第 40 任总统里根盛赞
被美国中情局誉为“冷战圣经”
解体共党捍卫自由的必读之作

开新出版社
Genesis Press



© 克里昂·斯考森, 保罗·斯考森, 方伟, 2026 年版权所有
作者联系方式: info@paulskousen.com
fangwei@bayvoice.net

本简体版仅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并且允许读者在中国大陆广泛分享和传播。

在中国大陆之外, 未经作者和出版商书面许可 (《1976 年美国版权法》允许的情况除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 复制、分发或传播本书的任何内容, 也不得以电子和其它方式, 或通过现在已知或将来发明的技术, 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储存。

裸体的共产党 增补版 (上)

开新出版社 (Genesis Press Inc.)

美国纽约州中城

网址: www.genesispress.org

电子邮箱: contact@genesispress.org

2026 年 5 月 19 日首版发行

国际标准书号 (ISBN): 978-1-963236-33-0

责任编辑: Kevin Bai

责任校对: Ming Yuan

装帧设计: Sarah Gao

和共产主义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存是不可能的。要么允许它像癌症一样肆意扩散，最终毁灭人类；要么人类就彻底抛弃共产主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前言

1958 年，《裸体的共产党》在美国问世，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好评如潮。几年之后，销量就突破了百万册大关。在 1980 年代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当政时期，如果问美国人是否读过或听说过这本书，几乎每个人都会点点头。

这本书也受到情报机构的重视，不仅获得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高度评价，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誉为“冷战时期的圣经”，情报人员人手一本。

作者克里昂·斯考森（Cleon Skousen）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历史学者、演讲家和畅销书作家。他早年在 FBI 度过了 16 年的职业生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共产主义。本书就是他几十年潜心研究的结晶。

里根在成为总统之前，曾和斯考森一起抵制共产运动。他评价说：“没有人比斯考森更有资格讨论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你会感到震惊，你会得到信息，你会庆幸闻听此言。”

1961 年，斯考森又在本书第八版，增加了“共产党

的 45 个目标”，这些目标要摧毁美国文化，最终颠覆美国。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高层的重视，并被载入国会记录。遗憾的是，截至 2017 年，共产党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其中的 44 个目标。

100 多年来，共产红祸波及全球，奴役了几十亿人口，造成了 1.5 亿人死亡。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以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市场，于是放松了警惕。

没想到，就在西方各国支持中共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共已经取代苏共，成为了共产世界新领袖。现在，西方国家终于如梦方醒——中共已经成为世界自由的头号公敌，而且，比当年的苏共更狡诈、更危险。

《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作为华人读者，无论您是身居中国大陆，想摆脱中共的奴役；还是身在海外，要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都有必要了解共产党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以及它的历史，才能找到最佳对策，战胜它。

我们相信，《裸体的共产党》这本书，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

保罗·斯考森 方伟

目录

前言 / 4

《裸体的共产党》诞生记 / 8

共产哲学篇 / 39

序章 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 40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始祖 / 47

第二章 共产主义的“魔力” / 75

第三章 共产主义的计划和预言 / 91

苏共篇 / 109

第四章 俄共起家三领袖 / 110

第五章 苏联的共产暴政 /	132
第六章 颠覆美国的共产运动 /	156
第七章 斯大林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	186
第八章 共产党战后蚕食自由世界 /	212
第九章 赫鲁晓夫的共产革命 /	250
第十章 共产党祸乱刚果和古巴 /	278
第十一章 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解体 /	315
致谢 /	351
作者简介 /	354
附注 /	356

《裸体的共产党》诞生记

1935年，本书作者克里昂·斯考森（Cleon Skousen），开始了16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职业生涯。随着经验日渐丰富，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局里有一些对共产党很有研究的专家，但是美国大众对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常常被错误信息误导。于是，他向一位专家请教：为什么我们不向大众揭露共产党呢？

这位专家说：“因为还没有适合大众阅读的东西。”斯考森感叹道：“简直难以置信！”更让他沮丧的是，在二战期间，尽管这些专家对共产党了如指掌，可是，他们对国家领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美国人总是掉进共产党设的陷阱。

于是，他心里升出一个愿望——要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书，把共产党的真面目曝光于世。“这样一来，谁来做民主党或共和党领袖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首先都是美国人。”

从此，斯考森就踏上了这个揭露共产党的艰难旅程。此时，东西两大阵营已经陷入了对峙。

冷战时代

在二战刚结束那几年，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并不太在意。他们已经受够了世界大战，对战争带来的压力和物资短缺深感厌倦。他们更愿意专注于追求自己的“美国梦”。共产主义不过是欧洲或其它遥远地方的另一个“主义”，还是让政治家们去处理好了，他们更希望去黄石公园享受假期，买新车、新房或是豪华的收音机。

然而，共产党并没有让美国人安享太平——几乎每天，它都会出现在媒体的新闻头条。

到了1947年，苏联断绝了和美国的表面合作，并且把东欧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萌芽中的苏联帝国内部，无情的战争机器，会迅速碾碎反对斯大林的任何微弱声音。可悲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求救声终于飘洋过海传到美国时，苏联这个大恶霸却威胁西方国家不要插手，否则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东西方陷入了对峙，人们称之为冷战。

当时，西方国家自认为实力雄厚。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向政府保证，苏联的所有威胁，都只限于欧洲大陆的常规能力。1947年9月26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在外国势力中，只有苏联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安全。苏联目前不能对欧洲和亚洲以外地区军事入侵，但有能力

横扫大部分欧洲大陆、近东、中国北部和韩国。”^[1]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这一相对乐观的看法，就被一声巨响化为了乌有。

核武竞赛

1949 年，苏联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西方引以为傲的核武器优势，突然消失了！4 年后，苏联又引爆了一颗氢弹，把冷战升级成了一场核武竞赛。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赶走了他们的死敌——中国国民党，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又一个共产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

八年后的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 1）。它绕地球飞行了约 1,400 圈。这让人们惊恐不已，生怕有朝一日在头顶绕行的会是核弹。

除此之外，令人担忧的还有朝鲜战争、间谍网络、政治渗透，以及苏联不断增强的军力等等。

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警觉起来，开始反击。

美国共产党势衰

在 1950 年代初，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率先揭露了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他呼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美国安全。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开展了类似调查。

到 1957 年，共产党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1950 年代末，美国共产党（CPUSA）的党员人数，已经从近 10 万人降到不足 1 万。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很清楚，他们仍在地下活动。于是，胡佛安插了 1,500 名卧底特工监视他们。^[2]

苏联间谍叛逃

对 FBI 来说，间谍活动是一个严重而又棘手的问题，不得不投入巨大资源调查。他们还承担了铲除政府最高层和最敏感部门共产间谍的艰难任务。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例如，1945 年，苏联间谍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叛逃，向美国政府透露了活跃在美国的 150 名苏联间谍信息。这份名单包括三个知名人物：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和希斯（Alger Hiss）。他

们的惊人故事，将在本书第六章为您详细介绍。

当时，一些亲共报社记者企图摧毁本特利的信誉。有人把她称为“哈里”（一个因间谍罪被处死的女特工）。也有人认为她太天真，是个被共产党欺骗的“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纽约女郎”。

本特利对前间谍同事的指控是真的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争论渐渐被人淡忘了。

克格勃秘密档案曝光

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从里根当政的 1980 年代开始衰落，最终在 1991 年解体。不久之后，苏联的秘密金库和克格勃 - 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馆（KGB-NKVDarchives^[3]）向西方开放。^[4]

在翻译审查了几千份解密间谍文件之后，结果不仅证实了本特利的指控，还表明这只是红色冰山的一角。这座冰山，正在悄然撕裂美国这艘航船。

财政部高级官员怀特确实是在美的苏联间谍。^[5]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密码学家进一步证实，他的秘密代号叫“法学家”（Jurist）^[6]；

钱伯斯早在多年前，就在他的书籍和演讲中，承认

参与了间谍活动；

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希斯，是华盛顿特区苏联间谍组织韦尔小组（Ware Cell）成员。尽管他 1950 年因伪证罪入狱，但人们对他的罪行一直有疑问。这批苏联文件证实了维诺纳计划（Venona Project）的分析结论——苏联电报中的代号艾尔斯（Ales），就是希斯。^[7]

斯考森的 FBI 生涯

就在这些阴谋和国际纷争的乱局中，本书作者克里昂·斯考森，踏上了揭露共产党的艰难旅程。

1935 年，斯考森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就加入了 FBI，开始了 16 年的职业生涯。他后来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

斯考森在 FBI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从最基层的信使做起，很快就成了培训师、多个特工小组的管理人员、枪械教官、警察教官、督查助理，以及 25 人通讯组的主管。和所有特工一样，他被调往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接受历练。

此外，斯考森还经常接受一些特殊项目和任务。例如，1945 年，他撰写了一份公关文件，名为《联邦调

查局的故事》，作为官方出版物，在几年的时间里发行了几百万册。^[8] 他每年还会在全国各地发表一两百场演讲。他的一位直属上司评价说：“他是局里最出色的演讲师之一，非常忠诚，热情洋溢……”^[9]

在 FBI，斯考森的任务并未涉及反间谍部门的共产主义研究，也从未因公撰写过相关研究文件。不过，特工在“犯罪”和“安全”这两个领域都要接受训练，并会不断在这两类工作之间切换。所以，斯考森的日常工作，也会接触到共产党人和亲共者。他也有很多机会和局内熟悉共产主义的权威专家交谈。斯考森在日记中，提到了几位指导他研究的专家。

FBI 内的良师益友

1. 拉德 (D.M. “Mickey” Ladd)。斯考森说他可能比所有其他 FBI 官员都更了解共产间谍活动。拉德曾短暂担任 FBI 的第三把手，领导反间谍工作，监督冷战时期的重要国家安全调查，包括希斯、罗森堡夫妇等案件。

2. 彭宁顿 (Lee R. Pennington, Jr.)。斯考森称他为在 FBI 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研究的良师益友。^[10] 他是 FBI 高级特工，曾和局长胡佛密切合作，专门负责识

别共产党活跃分子和亲共者。在他 1953 年退休时，在 FBI 位居第三。

3. 霍特尔 (Guy Hottel)。斯考森说：“我在华府接受新特工入门培训时，他是我的特别代理主管 (SAC)。他深入参与了对首都共产党犯罪阴谋的调查。”霍特尔和胡佛关系密切，曾担任胡佛的私人保镖。

4. 沙利文 (William C. Sullivan)，是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曾一度担任 FBI 的第三号人物。他是 1962 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 一书的主要写手，作者为胡佛。^[11]

斯考森从这几位 FBI 好友和他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非常具体的知识；对共产党人的心理和运作方式，也有了深刻的理解。

“简直难以置信！”

斯考森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局里有这些熟悉共产党的专家，可是大众却对共产党一无所知。他说：

“当我问一位 (FBI) 专家，为什么我们不发布这些 (关于共产党的) 信息时，他告诉我，因为 ‘它还没有适合大众阅读的东西’， ‘等你读完大约 175 卷辩证唯物主

义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我说，‘好吧，那就让我尝试一下，先从参加专题研讨会开始吧。’他说，根本就没有研讨会，没人写过专题论文。”^[12]

更让斯考森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有识之士致力于揭露共产党的活动，对国家决策者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斯考森说：“二战期间，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以及如果美国选错了，会发生什么。可我们总是掉进（共产党的）陷阱。我对自己说：‘我们在这里被知道答案的美国人启蒙，但美国的领袖们却还是在选错误的答案。’”^[13]

于是，他心里升起一个愿望——要让更多人了解（自由和共产党）这个话题。“这样一来，谁来做民主党或共和党领袖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首先都是美国人。”^[14]

可是在当时，没有一份参考文件可以帮助大众更好地了解共产主义，人们只能沉迷在无知和错误信息之中。斯考森感叹道：

“我当时想，简直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的。”斯考森在1958年说，“这么多年来，所有的陆军、海军的情报人员、FBI和政治学教授，都在大量阅读（共产主义相关）材料，希望能正确解读他们那些表里不一的言论。”

他后来回忆说：“我想描绘出共产党的内心世界，让美国人真正了解它的动机和野心。”

不仅如此，斯考森的最终心愿，是通过研究堆积如山的文献和著作，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书，把共产党的真面目曝光于世。

他告诉记者：“这样一来，普通美国人就能看清共产党的全貌，每天读报时，就可以分析出苏联的战略。”

斯考森说，对共产党的亲身体验，可能会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和好莱坞共产党人过招

其中一次，是他担任 FBI 对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联络官时。局长胡佛要求他，设法让一位《乱世佳人》主演，不要再资助当地共产党，也不要再参加共产党的前线倡导组织——艺术、科学和专业独立公民委员会。^[15]

斯考森在谈到这位女明星——哈维兰（Oliviade Havilland）时说：“我约好时间，去了她和妹妹在好莱坞的豪宅拜访。和所有明星一样，她们在前面有一栋豪华大宅，实际上却住在后面的公寓里。”

斯考森首先告诉哈维兰女士，胡佛先生对她在电影

中的角色印象深刻，并认为如果有人能提醒她，美国对她的生活和事业有多么重要，她可能会给政府提供帮助。谈了 45 分钟，哈维兰还是不为所动，她坚持说，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她和这个“倡导组织”之间的情谊。

斯考森回到 FBI 办公室，想出了一个点子。他请一位技术人员调出 FBI 的秘密录音，这是在哈维兰缺席共产党例会时录下来的。在录音中，这些所谓的“朋友”在她的背后，嘲讽她的天真，还用褻渎的外号称呼她。斯考森把几段这样的讨论，剪辑成一盘 30 分钟的磁带，然后带着一台便携式播放机，再次来到了哈维兰家。

“我对她说，我会在门廊等她听完。如果她愿意，我们再谈。”没过五分钟，哈维兰女士就气冲冲地出来了，“就像赶骡子的车夫一样破口大骂”，斯考森描述说。她怒不可遏，发誓再也不回去了。斯考森趁热打铁，建议她考虑来一场她有史以来最棒的表演。这引起了她的兴趣。

斯考森让哈维兰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揭露共产党是如何渗透好莱坞工会的。而他会保证把一些信息透露给媒体。然后，她应该参加下次会议，假装对有人向 FBI 通风报信恼羞成怒，宣布她不会再捐一分钱，直到找出并处理那个“肮脏的卧底”为止。^[16]

哈维兰照做了。就这样，她在没人怀疑的情况下脱离了这个组织。她之后表达的对它的质疑，让其他好莱坞支持者也都纷纷退出。

冒险反共的胡佛

每当胡佛无法受邀演讲时，其他受过培训的特工或官员（例如斯考森），就会代他出席。斯考森的此类演讲主题，通常都是关于间谍活动、青少年犯罪和黑帮时代的很抓人的故事。他还被委派讨论外国威胁。

“我几乎刚进 FBI 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斯考森说，这不只是出于个人兴趣，还因为胡佛要求所有特工都要研究它。“我们当中，只有两个人真的把这话当回事——沙利文和我。我从外地调到总部不久，我们就成了除胡佛局长之外，仅有的两个可以谈论共产主义的特工……我们在准备演讲时，为了不让局长为难，通过引用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令人厌恶。”^{[17] [18]}

斯考森对一位传记作家说，整个共产党在美国的形势太微妙了，看似任何人都难以解决。“你看，共产党的头目就在白宫地下室。他们控制着大约八个大型工会，而总统想要培养他们，好让这些大工会投他的票。这是

很棘手的事情。”^[19]

此外，FBI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纳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斯考森说：“胡佛冒着生命危险去调查共产党。他认为他们比纳粹更危险。他还向麦卡锡提供情报。”^[20]

随着讨论共产党的演讲师人数逐年增加，胡佛明确表态，他全力支持那些得到授权的演讲师。他说：“有幸在全国各地各种团体前演讲的 FBI 代表，都是在我完全知情和授权后进行的。他们关于共产党的言论，绝不会和我在演讲中的声明抵触。”^[21]

斯考森在日记中写道：“胡佛是推动 FBI 前进的动力源。他敏锐而专业，做什么事都很精确，说话通常像机关枪一样快。我把他当成好朋友。他也是我一生中认识的真正卓越人物之一。”^[22]

斯考森和胡佛的关系很好，两人相互支持。斯考森担任通讯部门主管时，办公室就在局长办公室对面。

二战期间，胡佛局长在几十封信中，把斯考森称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赋予了他一定的行政地位，尽管当时局里并没有这个职位。^[23]胡佛还说，斯考森是“总部最有效的管理人员”。^[24]这些称呼让人们无意中以为，斯考森在 FBI 担任了这些职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斯考森说：“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局里大量

招聘新人。他们召回了所有有行政经验的外勤人员。所有部门负责人都称为行政助理，一共有八名。但他们都向副局长尼克尔斯先生汇报工作。”^[25]

1951 年，斯考森应摩门教会召唤，接受了杨百翰大学的聘请，帮助建设这所大学和教师队伍。他的 16 年 FBI 特工生涯到此结束了。

在 FBI 工作的最后一天，斯考森来到胡佛办公室道别。胡佛站起身来问道：“你在生谁的气？”

“我没生任何人的气。”斯考森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辞职？”

“嗯，您知道摩门教会的情况。他们才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选中你，都会把你弄走。”

胡佛热情地和斯考森握手说：“好吧，看来你是转守为攻了。我知道你的立场。如果你想回来，我们永远欢迎，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26]

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

斯考森离开 FBI 后，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得到了杨百翰大学的有力推动。1953 年，校长邀请他参与编写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或许能用作大学教材。斯考森欣

然接受了。^[27]

几年后，这项任务陷入了僵局，斯考森写信给校长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觉得团队浪费了太多时间，来辩论共产主义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这些内容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记录。

“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我遇到的最困难任务。”斯考森在 1962 年回忆说。“当时，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献不仅太过技术化，而且很零散。此外，关于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哲学观和颠覆本质，还没有能全面涵盖的英文著作问世。因此，编写委员会花了几个月时间，尝试确定一些基本标准来编写教材。但由于意见分歧太大，大家很快就发现，这本书必须由一个人独立编写，然后再征求其他人意见。”

在校长的敦促下，其他教授同意让斯考森暂时摆脱其它职责，专心完成本书。这一过程，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

斯考森面临的难题，是语言障碍和数据获取。当时，共产主义及其创始人的相关历史事实、引文和传记，绝大多数都是用法语、德语或俄语写成的，并且是在欧洲出版，可供美国人阅读的书籍少之又少。斯考森的解决之道，是坚持使用英文版本的原始资料。

“我更愿意根据共产主义原始资料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发现，很多现代共产理论的辩护者，都试图扭曲其原始学说，以便把前后矛盾的地方合理化。”

至于更接近当代的事件，他引用了当前积极研究共产主义阴谋的作品。这些在参考书目中都有列举。

斯考森说：“我的参考书目中包括大量共产主义原始资料，几乎都是 1930 年至 1940 年间，由纽约国际出版社首次在美国出版的。这些都是我个人图书馆的藏书，也是我引用的书籍。”^[28]

到 1958 年，书稿终于完成了。

《裸体的共产党》诞生

起初，斯考森为书取名《共产党人和美国遗产》（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后来又改为《共产党人的呼号》（The Cry of Communism）。虽然还没有敲定书名，但他更倾向于后一个。^[29]

有一天，斯考森偶然和朋友、著名电影制片人德米尔（Cecil B. DeMille）谈起这个话题。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和自由倡导者。当时，他刚刚完成史诗电影《十诫》。斯考森给他看了自己的最终手稿，希望听

听他的反馈。几周后，德米尔回复说：“克里昂，你在书中剥光了共产党的所有伪装和宣传。所以，我建议把书取名为《裸体的共产党》。”斯考森照办了。就这样，这本冷战经典终于诞生了。^[30]

斯考森给 FBI 的好友沙利文写信说，《裸体的共产党》将在几周内出版，“我对你的宝贵指导感激不尽，把它称为我们两人合著也不为过。没能在序言中写上几段来肯定你的贡献，是我唯一的遗憾。不过，当你读到这本书时，我相信你能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你的卓越研究就像挖掘金矿，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内容。”^[31]沙利文在随后的回信中，帮斯考森更正和充实了一些细节和引文。^[32]

在收到初版新书后，德米尔回复说：“你的新书《裸体的共产党》，对这个美国人必须时刻警惕的话题，做了非常精辟的剖析。”^[33]

1958 年，斯考森开始满怀激情地传播真相。他没有选择大出版社来发行新书，而是用自己的积蓄首印了 5,000 册。

可是，斯考森并没想到，最初这些书很难卖，只能堆放在朋友的车库里。大约一年后，这本书终于火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好评如潮的畅销书

《裸体的共产党》第一版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迅速卖光了。紧接着推出了第二版。而第三版，在出版前又几乎卖没了。在两年时间里，这本书的印刷量从 1 万册增至 2 万册，一度高达 5 万册。

新书好评如潮。胡佛一贯不为别人的项目或著作背书，以便 FBI 保持政治中立。^[34] 尽管如此，在收到斯考森的签名新书之后，^[35] 他给斯考森写了一张便条：“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议题上的努力将引起广泛关注。你还记得送我一本印着我名字的书，真是太好了。”^[36]

1959 年，胡佛又给斯考森寄去了这本书的好评。他说：“这些附文的评论对你的新书大加赞赏，我想你会感兴趣看看。致以最美好的祝福。胡佛。”^[37]

联邦调查局的其他朋友也纷纷祝贺他的成就。斯考森日记中提到，他向前 FBI 同事们卖了几百本。^[38]

前 FBI 副局长特雷西（Stanley J. Tracy）评价说：“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本书。它是胡佛《欺诈大师》的续篇。这本书是大学教授的完美教材，应该摆在全国所有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39]

全国广播（Coast-to-CoastRadio）的时事评论家

哈维（Paul Harvey）对听众说：“我从来没给过任何一本书这样无条件的认可。”^[40]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参赞来信说：“我们已把几本书寄往台北的外交部，建议把此书翻译发行。我们将随时向您通报进展。”^[41]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写道：“您剥去了共产主义‘理性主义’和‘必然性’的虚假面纱，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期，为自由世界指明了行动方向。”^[42]

全国性报纸专栏作家兼广播评论员索科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呼吁美国的共产党支持者觉醒，并关注这本书：“对于那些芝加哥的律师们，以及其他真想知道他们在为谁鼓掌的人，我推荐一本书，书名是《裸体的共产党》。”^[43]

美国律师协会在 1958 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推荐了这本书；美国陆军情报学校把它列为推荐读物；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参议员和大学纷纷写信表示感谢和支持。

后来成为美国第 40 任总统的里根，在 1964 年写道：“没有人比斯考森更有资格讨论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44]

不过，这本书对“自由派”媒体毫无吸引力。《展望》

杂志（Look Magazine）在 1962 年 3 月 13 日的期刊中说，这本书在大众中的反响“让人难以置信。因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或《周六评论》这三家做书评的媒体，从未评论过这本书”，但它却“每天卖出 1,000 本，并且现在已经是第 11 次印刷了”。^[45]

1950 和 1960 年代的反共热潮，把斯考森和他的书推上了巅峰。接下来的五年让斯考森精疲力竭。他平均每年要发表 400 场演讲。有时一天就要做 6 场，创下了个人纪录。和在 FBI 时相比，他的演讲强度翻了一番还多。

在巡回演讲的同时，斯考森还要不断收集数据来更新这本书，以跟上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一年内，他把共产党的活动和企图，提炼成“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收录在 1961 年 3 月出版的第八版中。两年后，美国政府把这 45 个目标载入了国会记录。^[46] 尽管诋毁他的人认为这毫无意义，但此举确实赋予了这 45 个目标不朽的预言性，至今互联网上仍有几十万篇相关的文章和评论。

人们还把这本书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主要城市都卖得很好。书的部分内容还以各种语言出现在世界各地。

随着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人们纷纷探究斯考森的专业背景。他的资历也被夸大了。有人开始吹嘘他是“胡佛的顶级助手”以及“FBI 的共产党问题顶尖专家”。但斯考森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还耗费心神去纠正这些说法。

“冷战时期的《圣经》”

在 1958 年《裸体的共产党》出版不久，FBI 就决定正式审查这本书。局里的国内情报部门想看看这本书是如何描述 FBI 的，以及斯考森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这个主题。结果，他们只发现了一些“不影响整体效果”的小错误，整体的评价很正面。

他们在审查报告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为日益增多的反共书籍增色不少。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还涵盖了共产主义的多个维度，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其领袖生平、暴行和谬论，并提出了从现在到 1970 年这段关键时期，如何抗击共产主义的策略。”^[47]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对这本书兴趣浓厚。斯考森曾给 CIA 局长杜勒斯写过一封介绍新书的信，收到来自局长代理助理豪尔顿（Paul W. Howerton）的回信。

豪尔顿在 1958 年 9 月写道：“我们对这本书非常熟悉，实际上我们早在 5 月就订购它了。局内的普通图书馆和培训图书馆，都收录了这本书。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当我想借一本书重温时，发现书都让同事们借光了。”

1986 年，在豪尔顿回信近 30 年后，斯考森接到私人邀请，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 CIA 总部大楼。他先参观了主图书馆，然后被引到一间门上标有“历史情报收藏”的小房间。里面书籍琳琅满目，从地面至天花板，摆了好几百本。大多为英文书，还有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和现代希伯来文书。

这些书包括克兰西（Tom Clancy）、弗莱明（Ian Fleming）等几十人的间谍小说，还有战术手册、情报工作手册，以及国内外的间谍技巧书籍，大多为第一版，许多还附有作者签名。然后，图书管理员请斯考森注意靠墙角的书架，上面摆着三本《裸体的共产党》，其中一本是西班牙文版。

图书管理员对他说：“这是我们冷战时期的《圣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帮助理解敌人的资料。我们情报部门人手一本，都已翻阅得破旧不堪，就像这几本一样。您能在这几本书上亲笔签名吗？”^[48]

好莱坞万人反共集会

美国 1950~1960 年代的反共热潮，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是在煽动美国人的热情，而是对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领袖不断嘲讽和威胁的回应。

哈佛大学的自由派教授麦吉尔（Lisa McGirr）后来说，在共产主义出现之前，保守派团体是分散和脱节的。正是共产主义这个巨大的共同敌人，在战后把他们从极端到温和的不同观点，凝聚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那么，在 1950 年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麦吉尔介绍说：“母亲、牙医、商人和军火工程师，互相交换时事通讯和书籍，例如《裸体的共产党》，来警告共产主义的危险。”^[49]

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行动，是 1961 年 10 月 16 日晚的一场反共集会。主题是好莱坞反击共产主义。超过 1.5 万人涌入好莱坞的露天剧场。大约 400 至 600 万人在电视上观看了集会。

这次集会，是斯考森和影星哈维兰参与组织的。^[50]她的 40 位演员和制片人同行都获邀参加，名单堪称好莱坞名人录：韦恩（John Wayne）带领大家做效忠宣誓；还有史都华（Jimmy Stewart）、布伦南（Walter Brennan）、里特（Tex Ritter）、达内尔（Linda

Darnell)、墨菲 (George Murphy)、哈德森 (Rock Hudson)、纳尔逊夫妇 (Ozzie & Harriet Nelson)、奥哈拉 (Maureen O'Hara)、普莱斯 (Vincent Price)、科尔 (Nat King Cole)、迪士尼 (Walt Disney)、福特 (John Ford)、罗杰斯 (Roy Rogers)、埃文斯 (Dale Evans)、迪福尔 (Don De Fore)、里根、奥布莱恩 (Pat O'Brien)、海恩斯 (Connie Haines)、罗素 (Jane Russell)、史塔克 (Robert Stack)、参议员多德 (Sen. Thomas J. Dodd)、舒尔茨 (Fred Schwartz) 博士、伯根 (Edgar Bergen)、埃布森 (Buddy Ebsen)、罗梅罗 (Cesar Romero)、布恩 (Pat Boone) 等等。

活动的演讲嘉宾都是当时反共的领军人物，当然也包括斯考森。《洛杉矶镜报》的报道反映了斯考森的强大影响力。

记者写道：“在长达 4 小时的集会中，热情的观众多次起立鼓掌。而大部分的掌声都给了斯考森，这位前 FBI 特工提出了反击共产主义的五点计划。”^[51]

斯考森对观众的热情回应感到非常兴奋：“当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如何做来击败共产主义’时，全体起立鼓掌。这让我很激动，因为这些建议，正是我们的左翼教授一直批评的。他们说，人们永远不会接受它们。”^[52]

好莱坞露天剧场的集会结束后，采访和演讲的请求纷至沓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考森在全国各地奔波，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有几百次，有时还会乘直升机前往。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场馆发表演讲，场场都座无虚席。

到1962年2月，好莱坞露天剧场集会已经多次重播，电视观众达到2,000多万人次。美国人觉醒并站了起来。

就在同一年，《裸体的共产党》销量突破了百万册大关，并持续热销。直到196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反共运动的降温，销量才有所下降。

FBI 前同事的奇怪说法

不知什么原因，斯考森的一些 FBI 前同事，对他书籍的成功和日益增高的人气，开始持负面态度。有人认为，斯考森想利用以前和 FBI 的关系，从反共运动中谋取私利。

例如，斯考森的好友沙利文，竟然把斯考森描述成了极端分子。1963年1月，沙利文在一份备忘录中，加入了前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将沃德（Chester Ward）的贬损之词。这位上将说自己见过斯考森，认为他是“反共无原则的敲诈之徒”，“痴迷钱财，只为

个人私利”。^[53]

在随后的备忘录中，其他持类似观点的 FBI 官员，没有提到沃德上将这个批评来源，只是简单地说斯考森“被说成是敲诈之徒”、“痴迷钱财”等等，好像这种描述，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除了这些假标签，琼斯（M. A. Jones）又补充了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斯考森“正在不择手段地利用反共主题……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以前和 FBI 的关系，来提升自己反共作家和演讲家的地位。”^[54]

在沙利文、琼斯、德洛奇（Mr. DeLoach）、贝尔蒙特（A. H. Belmont）、瓦纳尔（W. R. Wanall）等人的备忘录中，经常这样提到斯考森：“近年来，他和诸如约翰·博齐协会（John Birch Society, JBS）这样的极右翼团体关系密切。”还经常提到其他右翼人物的名字，如舒尔茨和斯穆特（Dan Smoot），每次提到都带有轻蔑的语气。^[55]

后来，斯考森听说了这些事情。于是他写信给胡佛局长：“在过去几年里，我的每一场公开演讲都有录音，足以证明我和这些批评我的人一样反对极端主义。尽管如此，他们仍在不断使用不诚实和不准确的描述，企图把《裸体的共产党》和我，塑造成激进极端主义

支持者。”^[56]

约翰·博齐协会是怎么回事呢？斯考森在华盛顿特区的好友本森（Ezra Taft Benson），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长，帮他在白宫、国务院、国会和其它联邦机构，分发过《裸体的共产党》。他们两位都是约翰·博齐协会的早期支持者，但并没有持续下去。

斯考森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加入。但我写过《共产党对约翰·博齐协会的攻击》，因为这个组织致力于追踪并曝光我们社会中的颠覆分子，因此遭到了诽谤和攻击。”^[57]

过了一段时间，斯考森和本森都不得不和约翰·博齐协会保持距离。斯考森说：“（约翰·博齐协会）逐渐变得有些极端，例如发起针对首席大法官的弹劾运动。他们涉足政治领域太深了。我退了下来。我一直也不是他们的成员。只不过在共产党试图摧毁他们时，我确实为他们辩护过。”^[58]

被打上约翰·博齐协会的标签，是否会受到伤害？斯考森说，“人们无知的程度，决定了伤害的程度。他们不按照我们的建议去了解情况，而是去散布流言蜚语。”^[59]

被抹黑的警察局长

1957 年，斯考森获得胡佛推荐和盐湖城邀请，出任警察局长，重建警局。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斯考森把警局打造成了专业精干的机构。这项新职务拖慢了《裸体的共产党》写作进度，但他仍然熬夜笔耕不辍，以确保白天能全力以赴，尽到局长职责。他深受警局同事和市民欢迎，犯罪率显著下降，卖淫业被清除。《时代周刊》评价他们为模范警队。^[60] 警察管理指南刊物《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邀请斯考森撰写月度专栏，向全国推广他的成功政策。

这时，新当选的李市长（J. Bracken Lee）上台了。他出人意料地承诺，要解僱斯考森，为盐湖城“松绑”。

李市长不喜欢斯考森严格执法，尤其是查禁脱衣舞俱乐部和赌博。为了找到斯考森的污点，李市长联系 FBI，想拿到诋毁斯考森的材料，以证明解僱的合理性。他失望地发现，斯考森在 FBI 的评价很高，而且是为了帮助杨百翰大学自愿离职的。^[61]

无奈之下，李市长编造了其它指控，并施加压力，在市政委员会以 3 比 2 多数票解僱了斯考森。

解僱事件引发了市民的强烈不满，反响甚至传到了华盛顿特区。^[62] 全国各地的斯考森支持者纷纷打电话或

写信，抗议李市长的愚蠢决定。^[63]

李市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把斯考森抹黑成“一流的骗子”，“说得天花乱坠”，“滥用和挪用公款”，是个“挥霍无度的公务员”，“滥用市政人员来写《裸体的共产党》”。^[64] 他还诽谤斯考森是“刚出头的希特勒”，像“盖世太保”一样管理盐湖城警察局。^[65]

李市长后来又补充说：“他让所有人都怕他，这让我很担心。”^[66] 到2008年，由于斯考森新书《飞跃五千年》和《缔造美国》（The Making of America）的畅销，这些不实之词又被旧话重提。

事实证明，李市长所有财务不当的指控都站不住脚。警官和职员的个人证词、官方的会计记录都证明是他错了。他甚至不愿意签署有关的法律申诉书。^[67] 但解僱一事木已成舟。

就在斯考森被解僱不久，警局同事们向他送上了一份签名的告别宣言。他们还冒着激怒市长的风险，在《警察互助杂志》（Police Mutual Aid Magazine）和《硝烟》（Gunsmoke）杂志发表评论，赞扬斯考森“以无与伦比的正直和执行力，让我们警局赢得了全国认可”。^[68]

在出版《裸体的共产党》过程中，斯考森经历了高

潮和低谷，而他始终坚韧不拔。就在被解除警察局长职务几周后，他开始专注于写作另一本书，并启动了巡回演讲。

斯考森和 FBI 的朋友们保持良好关系，主动联络，分享信息。那些在他家乡和大学公开攻击他的人，仍然会收到他赠送的新书和附带的友好便条。他向他们保证并无恶意，希望继续做朋友。

50 周年和 60 周年再热卖

在 1980 年代里根当政时期，如果人们被问到是否读过或听说过这本书，几乎每个人都会点点头，表示对内容很熟悉。^[69]到了 1990 年代末，斯考森的著作被誉为伟大的美国经典。他被左派视为右派。这一殊荣，是美国史学家顿悟的一部分。在几十年的进步主义浪潮过后，美国的史学家突然意识到，美国历史确实有保守的一面。而这一面催生了“里根革命”和最好的美国传统文化。

在《裸体的共产党》出版 50 周年和 60 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再次高涨，销量火爆。

《裸体的共产党：揭露共产主义并恢复自由》（The Naked Communist: Exposing Communism and

Restoring Freedom) 是这本书的 60 周年纪念版，也是 51 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在保持了原书犀利风格的同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

自《共产党的 45 个目标》发表近 60 年后，除了一个目标外，其余目标均已实现或部分实现。这些内容在新增章节有专门阐述。

自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轰然解体。中共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世界领袖。这几十年的世界反共运动史，依然波澜壮阔，扣人心弦。方伟撰写了这段历史，作为这本 2025 中文版的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

《裸体的社会主义者》

2006 年，斯考森去世，留下了一本尚未写完的书，名为《裸体的社会主义者》。此后由我接棒，终于在 2014 年把它完成。书中阐述了《美国宪法》如何清除社会主义的七大支柱；还清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运作机制，以及它从过去到现在，如何利用五花八门的名字，侵蚀美国人的自由和文明。

保罗·斯考森

2025 年 5 月 28 日更新

共产哲学篇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党宣言》



序章 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如果一个人正在改造人类，企图把人类都变成自己的模样，那真是一幕令人恐怖的景象。然而，这正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全力以赴的终极目标。不过，他并不想让别人和他平起平坐，恰恰相反，他想打造的是一个人形巨像——自己是其缔造者和大脑，其他人则只能充当它的耳目、手脚和喉舌。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俯瞰着这个世界，期待着有朝一日，整个人类社会都将被他强力改造，以完美实现他的梦想。

要实现这个梦想，马克思必须做两件事：

首先，要彻底消灭异议，颠覆所有政府、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他写道：“那时，我将跨越断壁残垣，像创世主一样独步天下！”

其次，他还要改造出一个新人种——只要主子一发出指令，他们就立刻行动。新人种不再仰赖自由意志、伦理道德或良知的指引。马克思或许没意识到，他试图改造的新人种，其思维方式和罪犯一样。

自古以来，改造出这样的人种一直是权欲熏心者的

梦想。尼姆罗德（Nimrod）最早提出这一构想，柏拉图将其完善，圣西门（Saint Simon）进而发展，马克思又把它具体化了。

现在，这种罪犯式的人种，早已横行于地球之上，企图征服国家和大陆，改写法律和国界，决定战争或和平。他们是“马克思的子民”（Homo Marxian），俗称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 Man）或者共产党。他们明确宣称，将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共产党之所以让人类既恐惧又困惑，是因为其罪犯思维和行事方式完全出乎正常人的预料。



一位正在盘算如何把别人财产窃为己有的罪犯。示意图。

(Mini tocker/Shutterstock)

例如，一位好心人邀请一位职业罪犯到家里共进晚

餐。可是这位贼眉鼠眼的客人，完全无视主人的友谊和热情，只在乎各式美味佳餚、昂贵的银器和晶莹的酒杯。不仅如此，他还会在心里想：这位主人不但心肠软弱，而且脑子也笨。最后他认定：像这样傻乎乎的人，根本不配享有这么多好东西。于是，他会整晚盘算，如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墙而入，偷走主人的所有财宝。

对于熟悉共产党高层百年历史的人来说，这种罪犯思维和行径早已屡见不鲜。在二战期间，苏联厚颜无耻地利用美国的友善和慷慨，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共产党不按正理出牌，这使得所有与之共事的人都觉得难以捉摸。其实，看透他们并不难。因为共产党已经把它的价值观拉至自然界最低——他们完全遵照丛林法则而活着，自私自利的算计非常缜密。无论是面对和平还是危机，他们的反应始终出自动物的自保本能，所以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共产党自认为是尘世的产物，所以没有其他角色——他认为自己没有灵魂，更不可能有让灵魂不朽的方法；他认为不存在创世主，人类只不过是在自然界偶然而生。人生在世，也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

由于不讲道德，共产党处理问题总是直截了当。“自保”是他们行动的唯一理由。至于别人的做事动机，他

们一律解释为“自私”或“愚蠢”。对于他们来说，签署53项条约，随后就违反其中51项，这并不是背信弃义，而是战略所需；为蒙蔽别人心智而掩盖真相，也并不属于欺诈，而是必要的治国之方；所有无底线的权宜之计，也皆非邪恶。人类维系和谐关系的所有荣誉和伦理，他们完全弃之不顾。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实，共产党情感脆弱，可能是人类中最缺乏安全感的。因为他们自认为只是宇宙的偶然产物，只有贪婪地把万事万物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才能感到安全。他们不仅要征服人类，还要征服物质、空间、乃至宇宙中的一切力量，以便重塑梦想中的秩序。他们说，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人类是唯一有智慧、能创造性思考的幸运生物，而共产党又是最先进的人种，所以他们必须承担至高无上的责任。于是，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告——共产党将成为地球乃至宇宙的终极主宰和神灵。

这种狂妄的理论席卷了全球。许多非共产党人被这种浪潮席卷，任由自己随波逐流，前往一个人造的“神圣”乐土。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冒着生命危险回归现实，并且带回了同样的警世故事：共产党的行为和丛林生物毫无二致——看待别人的眼光，总是充满恐惧和怀疑；对待问题的反应，犹如面

临生死存亡。它虽然渴望统治人类，却对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不屑一顾。这些昔日“朝圣者”见证：共产党在逆天而行，让人类自相残杀。

时至今日，人类已发现自己身陷危机，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共产党的出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科技进步终于使人类衣食无忧，他们却用武力威胁这些伟大成就；所有民族都期盼和平与繁荣，他们却非得要掌控人类的命运；人类已经能够超音速旅行，在各民族和文化间密切交流，他们却执意筑起铜墙铁壁，以便其在里面为所欲为。

不仅如此，共产党毫不掩饰其野心——统治世界。由于当年他们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鲸吞全人类，只好逐步蚕食。我们稍后将看到，他们早已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征服时间表”，并且一直在执着地按时间表有序推进。他们预言说，自由世界已经“时日无多”了。

面对这种两难窘境，尚未屈服而又忐忑不安的人类，只有三条路可选：

1. 乖乖投降。
2. 尝试与之共存。
3. 消灭这个嚣张的恶霸。

在作者看来，毋庸置疑，自由之士最终必走第三条路。这是生存法则指引的唯一出路。任何一位感受过自由在血脉中悸动的人，都不会把投降视为解脱之道；而任何看透“与之共存”幌子后面致命阴谋的人，绝不会把它视为长久之计。

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办？

作者克里昂·斯考森当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发现，原来研究共产党的专家们，早已掌握了消除他们确切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自由之士及时行动，完全可以不必发生大战就能达成目标！这本书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任由共产党在地球上扎根，人类无异于自掘坟墓。

历史已经给出充分明确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必须集结一切合法力量，铲除这个阻挠人类发展的绊脚石。无论是为了全人类，还是为了共产党人，我们都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改造实验的牺牲品，已经身陷反人类的恶性循环。只要自由之士在世界仍居多数，就有望打破这个循环。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由之士必须睿智地凝聚在一起，充满活力，并且力量要足够强大。

在本书最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些对策。如能及时实施，即可在全球清除共产党。这些对策，来自于对马克

思的历史、哲学和终极目标的深刻洞察，以及和共产党打交道时遭遇的惨痛教训。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站出来，在全球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共联盟。那么人类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庆祝这个伟大成就：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享有自由！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始祖

在本章中，我们先深入了解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另一位是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我们尝试从共产党人的视角来描绘他们的人生轨迹——不是很多教科书中描绘的那种文雅而有远见的社会改革家，而是如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所见：双拳紧握、权欲熏心的革命家。

本章虽然简短，但包含了足够细节，便于想了解共产主义的读者搞懂以下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称其始祖为“天才”，却又承认他“独裁、易怒、好斗”？

马克思受过良好教育吗？他是哪国人？他的主要著作是在哪儿完成的？

为什么马克思从未有过稳定的职业，或可靠的生计？

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哪些不同？

他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哪六大目标？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推翻上帝”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他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资本论》将颠覆世界？

马克思两次试图建立组织，推动世界性革命，为什么都失败了？

* * * * *

1853 年，伦敦。

在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冒着蒙蒙细雨，站在伦敦贫民窟的一间破旧小屋前。他敲了敲门。一会儿，门开了，主人请他进屋。里面烟雾弥漫，呛得他不断咳嗽流泪。透过烟雾，他终于看到了主人的模样——一位身材魁梧、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男子，用一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向他问好，还递上一根烟斗，请他坐到一把破旧的椅子上。

若非早有耳闻，这位官员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胡须男竟有博士学位；更难以想象，刚刚把孩子们赶往里屋的妻子，竟是德国贵族之后。但事实确是如此。这里正是马克思博士和太太的栖身之所。

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位被迫流亡的政治犯。他被赶出了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英国给予他和其他欧洲革命

家庇护，马克思对此心存感激。此后，英国就成了他革命事业的终生基地。

官员在这个特定日子来访，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恐慌。这只不过是英国政府对政治流亡者的例行检查。这位官员不但没有敌意，反而觉得马克思夫妇奇怪而且很有趣。他们可以在杂乱无比的家庭环境，怡然自得地谈论全球议题。这位官员在后来的报告中，描述了他对马克思夫妇的困惑：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差的社区，因此房租低廉。他住两间房，临街的房间是客厅，卧室在后面。两个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或像样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到处都很凌乱。客厅中间有一张铺着油布的老式大桌子。上面堆满了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杂物、他妻子的针线篮、破杯子、脏勺子、刀叉、台灯、墨水瓶、玻璃杯、荷兰烟斗、烟灰……混杂在一起。但这一切，不会让马克思夫妇感到有丝毫尴尬。他们热情好客，并向你提供烟斗、烟草和其它东西。随后，一场机智有趣的聊天开始了，令人忽略了家中的一切缺陷。”^[70]

至此，我们认识了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舞台上一位最具戏剧性的人物——马克思。他死后的影响力比在世时更大。传记作家们努力揭开马克思一生的谜团。有时，

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但是，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易怒、好斗的独裁者，一个和全世界都有仇的人，并且总是在担忧自己能否继续维持优越的地位。”^[71]

这种自相矛盾而又极为偏激的性格，在马克思动荡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少年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市（Treves）。他的祖先足以使他颜面有光——无论是父亲家族，还是母亲家族，历代都是杰出的学者和令人尊敬的犹太教拉比。然而，到了马克思的父亲这代，却选择了和过去的信仰和职业一刀两段。他带着家人离开犹太教堂，加入了新教，并努力获得了律师执照。此时的马克思只有六岁，家族的宗教传统就这样被颠覆了。一些传记作家认为，这次突变，是他后来反对宗教的深层原因。

在小学时，马克思便展现出杰出的学习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也显露出一种将困扰他终生的特质——不善于交朋友。翻遍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我们很少见到他回忆快乐的童年时光。传记作家说，他过于紧张、好

斗、患得患失，而且控制欲强，这导致他没什么朋友。不过，马克思并非无情之辈，他对爱的渴望情真意切。在他 17 岁步入大学殿堂之后写给父母的信中，偶尔会流露出极为细腻、女性般的情感。下面就是一例：

“希望笼罩在我们家中的阴霾，能够逐渐消散；希望我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泪水交融；也许在陪伴你们时，我能够表达出深厚的感情和无法估量的爱；希望我永远深爱的父亲，能理解我的感情经历了多少风雨，从而原谅我。因为在您看来，当我的心灵饱受磨难而无法言语时，我的心一定常常误入歧途。盼您早日康复，希望我能够紧紧拥抱您，向您倾诉我的全部感受。永远爱您的儿子，卡尔。”

这番话一定会让老马克思困惑不已。他身为父亲，却始终无法在劝说和批评儿子时，不让儿子大发雷霆。在马克思的信中，经常提到和父母的激烈争吵；而他的父母则在信中，埋怨他以自我为中心，不为家人着想，只顾着不断要钱，却对大多数来信不理不睬，非常没礼貌。

马克思的人生蓝图

1835 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 法学院。第一学年对他来说真是狂躁不安。他先是加入一个酒吧俱乐部，不仅弄得债台高筑，还因夜间酗酒滋事，差点让学校开除，把他父母吓坏了；他的学业也不尽人意，还一度威胁说，不想当律师，而是要成为一名诗人。

1836 年夏天，他又和人决斗，眼睛受了伤。最终，波恩大学觉得，让马克思转学才是上上之策。老马克思欣然应允。于是，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继续学业。

正是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的智力开始转化为行动力，他的人生蓝图也逐渐清晰。虽然他表面上遵从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但这只是他狂热探索哲学的伪装。当父亲一去世，马克思立即公开宣布，他将追求学术生涯，渴望成为某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德谟克利特和伊比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倾向于伊比鸠鲁的唯物论，因为它认为物质存在能动性。马克思觉得，如果物质自有动力，那么宇宙就不再需要创世主、设计者或支配力量。于是，马克思的反宗教情结，开始在他的论文中得以彰显——他用普罗米修斯的呐喊作为座右铭：“总而

言之，我憎恨一切神灵！”在这段思想萌芽期，马克思心怀三大目标：渴望发现一种自然哲学；渴望彻底否定一切宗教；渴望赢得威斯特华伦男爵千金燕妮的芳心。

在此期间，马克思投身于一个左翼学派，他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当时，他们倾尽全力要彻底摧毁基督教。1835年，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出版了《耶稣的一生》，他认为福音书并非历史文献，而是早期基督徒集体幻想出来的神话。这一说法震惊了整个德国。

1840年，马克思的亲密伙伴鲍尔（Bruno Bauer）以《对观福音书的历史批判》为题，在著作中宣称福音书是伪造的，耶稣从未存在过，是个虚构人物，因此基督教是一场骗局。

接下来，鲍尔和马克思大胆决定——出版无神论期刊。不过，因缺乏经费，这个计划夭折了。

1841年，反基督教运动又多了一位能言善辩的支持者。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他不仅嘲讽基督教，还提出了人类拥有宇宙中最高智慧的观点。这个奇思臆想让马克思深深着迷。他把相同的观点写入博士论文，直言不讳地说：“人类的自我意识才是最高的神性！”

由于政府对这场反基督教运动的态度严厉，马克思判断，把论文提交给柏林大学的风险太大。在鲍尔的建议下，他转往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不久之后，他想成为德国大学哲学教授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马克思和鲍尔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由于充满革命色彩而受到严厉处分。政府在查明作者身份之后，波恩大学立即开除了鲍尔。马克思也被告知，绝不允许他在德国任何大学任教。

此时，革命的烈焰已经在马克思心中熊熊燃烧。他决心发起一场运动来彻底重塑世界。但他深知，要完成这件大事，必须得到威斯特华伦男爵千金燕妮的陪伴。这位美丽又惹人喜爱的德国贵族之女住在马克思的家乡。七年来，他们一直书信不断。他在信中表白说：如果她愿意嫁给他，她将成为革命者的妻子。他写道：“燕妮！如果我们的灵魂能紧密结合，我将轻蔑地向世界发起挑战，跨越残垣断壁，成为创世主！”^[72]

1843年6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新郎当时处于失业状态。燕妮很快就发现，这将成为他们婚姻生活的永久特征。马克思从未想过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如果换作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燕妮依然对马克思忠心耿耿。

婚后，他们享受了五个月的蜜月时光，之后便前往巴黎。马克思期望在那里参与创办革命刊物《法德年鉴》。不过，这份刊物在创刊后就关门大吉了。在随后的十五个月里，马克思则沉浸在“学习和写作”的愉悦时光里。

这成为了此后马克思毕生的生活状态。在他的家人忍饥挨饿之际，人们会发现，他却正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有趣却毫无报酬的高等数学。伏尔泰嘲讽说，有种男人没能力管家，因此便隐居阁楼，在那里指点江山。马克思似乎就是如此。他虽然看似四体不勤，但如果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其实可以干大量的脑力活儿；可要是他没兴趣，那就别指望他干啥。马克思的这种性格，使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过一份专业工作或可靠的生计。

一位对马克思抱有好感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普通的工作令他厌烦；传统的职业让他丧失了幽默感；即便囊中羞涩，衬衫也已典当，他仍在自命不凡地审视世界……他的一生都囊中羞涩，对养家糊口无能得令人啼笑皆非；他的财务陷入困境，总是债务缠身，债主们紧追不舍……他的一半家当总是在当铺里；他总是资不抵债，破产成了常态；恩格斯给他几千块钱，一到他手中，就像雪花融化般消失了。”^[73]

这段描述提到了马克思的唯一密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马、恩的奇特关系

在许多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都截然相反。他身材瘦高，酷爱运动，活泼乐观，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于德国巴门，父亲是一个纺织品制造商，在德国巴门和英国曼彻斯特都拥有大型工厂。恩格斯从小就对父亲的严厉管教心生不满，因此他对纺织业和其相关的一切都深恶痛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而然地和工业无产阶级站在了一起。

身为资产阶级商人之子，年轻的恩格斯所受的教育却少得可怜，至少他没有受过任何大学教育。但是，他通过勤奋和天赋，弥补了正规教育的不足。他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并可以为这两种语言的自由派杂志投稿。

尽管传记作家笔下的恩格斯精力充沛、魅力十足，个人特质和忧郁多疑的马克思迥然不同，但是两人的思想发展轨迹却如出一辙。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与父亲激烈争吵，读施特劳斯的《耶稣的一生》，与同一批激进左翼的黑格尔门徒们志同道合，成为愤世嫉俗的不可

知论者，对工业革命的自由经济丧失信心，坚信共产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真正希望。

恩格斯对马克思仰慕已久，但一直无缘相见。1844年8月，他专程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两人一见如故。短短十天之后，两人都觉得，在一起共事是命中注定。正是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把恩格斯从一个共产主义梦想家，改造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让恩格斯相信，欧文或圣西门的空想，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希望，而必须搞一场激烈的革命，来颠覆这个世界。恩格斯心悦诚服地返回了德国。

半年后，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一书，召唤那些愿意完全放弃和平改革幻想的共产党人，断绝和慈善事业、乌托邦主义或基督教道德的所有联系。革命的红旗已经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诩为革命的旗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奇特关系之所以快速升温，是因为恩格斯觉得，和马克思这样的“天才”交往是一种殊荣。不仅如此，他还把给予马克思金钱支持视为一种荣耀。在马克思被法国驱逐不久，恩格斯就把自己手里所有现金都汇给他，并承诺还会给他更多援助：“请把当心安理得的事，我会把很快就能收到的英文稿

费交给您，这将是最大的荣幸。我现在不缺钱，因为我爸爸必须给我生活费。我们不能让那些狗东西幸灾乐祸，看着您因其恶行陷入财务窘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盟友关系，使他们有勇气发起共产国际联盟，以推动暴力革命。他们打算把德法两国工人，作为这个新政治机器的骨干，但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法国工人中待了几个月后，恩格斯斥责他们“更喜欢做最荒谬的白日梦，更愿意用和平方式来获得普世的幸福”。他告诉马克思，法国根本不存在革命的火种。两人自建革命组织的计划由此失败。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弦更张，决定接管一个现有的组织。

1847年8月，他们成功地掌控了布鲁塞尔的工人教育协会。这马上为他们在欧洲改革派中赢得了名声，并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英国扩展影响力。此时，两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是英国而非欧洲大陆，将成为他们革命事业的基地。

《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间，从伦敦传来消息，正义联盟（后来叫共产党联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布鲁塞尔的共产组织代表参加他们的第二次大会。两人此行实际

上掌控了大会。他们通宵达旦地制定计划，在会议上运用策略，使得大会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随后，他们受命撰写一份向全世界发布的原则宣言。回到布鲁塞尔后，他们立即着手写作。马克思在宣言中，倾注了他的革命激情，向全世界宣布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新纲领：

1. 推翻资本主义；
2. 消灭私有财产；
3. 摧毁社会基本单位——家庭；
4. 废除所有阶级；
5. 颠覆所有政府；

6. 在一个没有国家和阶级、财产共有的世界上，建立共产新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将采取的革命途径：

“总之，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颠覆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法国“二月革命”

红色革命的星火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要快。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墨迹还未干透,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资产阶级对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怨恨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一场暴动,国王路易被赶出了法国。在随即成立的临时政府中,就有共产党联盟的成员。他们迅速把马克思召到巴黎。于是,马克思带着共产党联盟的全部授权,踌躇满志地在巴黎建立国际总部,策划在其它国家发起革命。

马克思发现,临时政府中的激进派,为法国暴动的成功而陶醉,他们决定向邻国派遣“军团”,在每个国家发起暴动,使红色革命的星火形成燎原之势。尽管这正是马克思多年来倡导之事,但他突然意识到,当下如此行动可能会适得其反,很可能使他们在邻国失去民众支持。可是,这个计划还是启动了,第一批军团开赴德国。马克思也跟随前往,开始发行德文革命刊物《莱茵报》。

不久,革命领袖们就发现,在宣传方面马克思却是个累赘。当他奉命前往莱茵河流域,和共产党联盟同志一起发动工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应邀在德国民主大会上演讲,原本是个极为难得的好机会,却被他搞砸了。舒尔茨(Carl Schurz)说:“我曾满心期待,

想从这位名人口中听到睿智之语。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马克思的话虽然有份量、逻辑清晰。但他那不可一世的傲慢却令人难以忍受。他绝不会考虑任何不同意见，公然蔑视所有和他唱反调的人。那些被他傲慢态度伤害了的人，转而支持所有和他不同的意见……他不但没赢得新的支持者，反而把那些潜在支持者都赶跑了。”^[74]

在德国的革命从一开始便力不从心。到了 1849 年 5 月 16 日，就声名狼藉地失败了。德国当局限令马克思在 24 小时内离境。他在匆忙间借来资金，用红墨印刷了最后一期报纸，便匆匆离开，到法国避难。

然而，法国也并非马克思的避风港。当他身无分文、精疲力竭地来到巴黎，却发现共产主义在新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国民议会早已落入君主派手中。

于是，马克思只得抛下妻儿，尽快逃离法国。由于缺钱，家人后来才跟上他。他决定长期流亡伦敦。

共产党联盟的终结

马克思把家人安顿在伦敦贫民窟的一间廉价公寓。他对家人的生活条件很满意，所以立即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煽动革命上。尽管马克思干劲十足，结果却又适得其反。他的煽动精神似乎总是在党内制造分裂和争吵，不

久，他就和同志们断绝了关系。为了不再受他影响，共产党联盟中央委员会搬到了德国科隆。

到了 1852 年，德国所有共产党领袖因颠覆活动被判重刑。马克思竭尽全力营救疏远他的这些同志。他收集资料、招募证人，并提出各种自认为有利的法律依据。尽管如此，共产领袖们仍然被判有罪。这为共产党联盟敲响了丧钟。

马克思一家的悲惨生活

从那时起，马克思一家就在伦敦饱受贫困之苦。马克思在此时的书信中，流露出奇怪的情感。一方面，他对妻儿的生活深表关切。他在一封信中对恩格斯倾诉，说妻子在夜里哭泣的情形，让他实在难以忍受；而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轻描淡写地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是如何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以便找出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

1852 年，马克思的小女儿弗朗西斯卡（Francisca）夭折了；两年后，他的小儿子埃德加（Edgar）离世；又过了两年，他的一个孩子在分娩时死亡。

马克思太太在信中的几段话，显示了她对丈夫惊人的忠诚。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在忍饥挨饿中死去。而

他们的父亲，却仍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

“让我描述日常一天的真实情况。因为这里僱奶妈的费用昂贵，尽管乳房和背部疼痛难忍，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哺乳。但是，这个小生命从母乳中汲取了太多忧愁，使他疼痛不已，日夜不安。自从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最多也就睡两三个小时。最近，他又开始剧烈抽搐，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发病时，他使劲吸吮，弄得我的乳头流血，血经常淌入他的小嘴里。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坐着，房东太太突然来了。因为我们没法马上还清五英镑房租，两个中介就闯进家门，扣押了我们的所有家当——被褥、衣服……连婴儿的摇篮和女孩的玩具也不放过，孩子们因此嚎啕大哭。他们还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搬走（幸运的是，他们并未这样做）。如果真搬走的话，我就只能在冰冷的地板上，和冻僵了的孩子们挤在一起……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离开。外面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四处找房，但当他一提到有四个孩子，就没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还是一位朋友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还清了欠款，并很快卖掉了床和被褥，以便结清药剂师、面包师和送奶人的帐。”^[75]

随着这样的岁月流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往来信件

多达几百封，几乎每封信都提到了钱。在恩格斯的信中通常都有这样的话：“随信附上一张五英镑的邮政汇票。”而在马克思的信中，则充斥恼羞成怒的段落：“我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不会支付任何让她付款的帐单。”“我们家，已经十天无人问津了。”“你肯定会认同，我已经深陷小资产阶级的困境，无力自拔了。”

在马克思一家的悲惨生活中，曾经闪现过一道意外的曙光。就在恩格斯无力解囊相助的一个艰难时期，马克思去了一趟荷兰。在那里，一位富裕的叔叔慷慨地赠给他 160 英镑。这笔钱足以让马克思还清债务，摆脱困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腰包难得鼓起来的马克思，却决定到德国游览一番。他先是到特里尔探望母亲，然后去了柏林，和老朋友们饮酒作乐，拍照留念，俨然一位休闲绅士。两个月后，他尽兴而归。马克思太太热切地欢迎丈夫游历归来，心想终于可以还清债务，置办衣物和家具，住上好一点的房子了。然而，她惊愕地发现，160 英镑已经所剩无几。

第一国际

1862 年，伦敦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以展

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工业成就。博览会的发起人期望营造友善的国际氛围，因此邀请所有国家不仅要提交展品，还要派本国工人代表参加，和世界各国工友交流思想，表达善意。

自 1860 年以来，英国工人领袖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认为这是组建国际工人组织的绝佳时机。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和意大利、德国、法国、波兰和荷兰的同行们结成了盟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以在伦敦建立国际总部。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一位名叫埃卡留斯（Eccarius）的裁缝，他曾是马克思在共产党联盟的得力助手。新运动刚一有起色，他就力邀马克思参与其中。

这次，马克思从共产党联盟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学会了适度的克制。这个新组织叫做国际工人协会，也叫第一国际。只要马克思能克制自己，他就能够在各国工人领袖中发挥巨大影响力。通过幕后的精心策划，马克思几乎能够使自己的所有方案都获得采纳，其他人的更温和方案都被淘汰。不过，这一切运作，对马克思来说都显得过于委婉和不自然。他向恩格斯承认，为了和谐相处，他不得不做出妥协：

“我的方案全部被小组委员会采纳了。唯一的条件是，我得在规则序言中加入‘责任’和‘权利’的这两

个词汇；还要谈到真理、道德和正义——但这些都被我巧妙安排，不会带来任何损害。在觉醒运动允许我们畅所欲言之前，我们还需耐心等待。我们必须实质强大，形式温和。”^[76]

尽管马克思决心表现温和，但没过多久，他的真实性情就原形毕露了。他开始关心两件事：第一，打造一个由纪律严明的革命者组成的强硬核心，煽动各国主要产业工人的革命意愿；第二，清除任何可能威胁他在新运动领袖地位的人。他开始酝酿一场党内清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门徒似乎都清楚，这两人清洗党内同志可是毫不留情。最先领教他们手腕的，是德国工人领袖施韦策（Herr von Schweitzer）。他们大肆宣扬说，施韦策是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走狗。尽管这纯属捏造，但是施韦策的声誉已经完全被马克思毁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指控为依据，把施韦策说成是共产事业的叛徒。

另一位遭到清洗的党内栋梁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他是第一个对共产革命感兴趣的俄国人。他从俄国监狱逃出来，在日内瓦定居。巴枯宁热衷于宣传马克思的教义，以至于在工人运动中，一些人开始追随他。这可是个致命的问题，马克思立即着手清洗他。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对付施韦策的同样手段，指控巴枯宁是俄国君主的间谍。这一度给巴枯宁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紧接着，他们又造谣说：巴枯宁贪污了25,000 法郎。最后，马克思把巴枯宁成功赶出了第一国际。马克思自认为，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挑战他领袖地位的人。

马克思未料到的是，尽管巴枯宁饱受屈辱，却仍然忠于他的教义，甚至还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了俄文，从而播下种子，最终使俄国沦为共产极权统治的第一个国家。

然而，由于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清洗第一国际中的所有敌人，造成了强烈的猜忌和分裂，最终导致第一国际彻底解体。实际上，就在赶走巴枯宁不久，第一国际便走向了末路。英国的工会逐渐放弃国际革命事业，欧洲大陆的工人组织，也开始无视第一国际的指挥。

1873 年 9 月 8 日，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了最后一届代表大会。马克思发现，最终同意出席的十三名代表，实际上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此时，第一国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马克思幻想著书改变世界

马克思致力于把第一国际打造成一个宏大的世界运

动。他渴望把自己冥思苦想的理论付诸实践。几年来，他倾心投入的两大计划——第一国际和他的著作，耗尽了他的体力，使他肝病复发。没过多久，他又全身长满了脓疮。病痛一直令他余生饱受折磨。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诉了自己所受的痛苦和挫折：

“在彻夜无眠之后，却发现胸前又长了两颗大疮，把我恶心透了。”他后来提到：“我现在就像一匹拉车的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工作。脓疮只是让我身体局部难受，并不影响我用大脑思考。”在一次重病发作之后，他写道：“这次真的很严重，家人却浑然不知。如果再发作三四次，我就没命了。我已经非常消瘦，虚弱无比，四肢无力，唯独大脑还算清醒……虽然坐起来没问题，但躺着的时候，我还能时不时地做我的研究工作。”^[77]

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工作”，指的是研究和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他深信，只有劳工大众拥有了关于历史、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共产革命才能成功。他写《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为暴力推翻现有秩序找到理论依据。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为您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理论。

在 1865 年间，马克思竭力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便交付印刷。他告诉恩格斯，他想“尽快完成，因为

这件事已变成了我的一场噩梦”。他偶尔会因病休息一段时间。最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这本该死的书，终于在12月底完成了。”恩格斯安慰他说，对这本书的等待，对他来说同样是一场煎熬。他写道：“手稿付印那天，我将一醉方休！”

实际上，直到1867年3月，修订工作才最终完成。马克思前往德国，用他的母语出版了这本书。

但是，《资本论》问世后，并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愿一炮打响。对于劳工大众来说，它的理论晦涩难懂；而对于知识分子革命派来说，又缺乏说服力。要让《资本论》成为他们抨击现存秩序的主要借口，还得靠下一代。

濒临崩溃的最后岁月

到了1875年，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几乎没有什么如意的事。第一国际已经瓦解了；《资本论》第一卷也在欧洲大陆的书店里积满了灰尘。

马克思继续写了后两卷，但他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把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出版。

马克思的晚年是孤独无助的。由于共产事业屡遭失

败，他转向了家人的怀抱，而且总能得到妻子燕妮的安慰。但马克思子女的成长过程，却伤痕累累。马克思干涉女儿埃莉诺（Eleanor）的恋爱，但她仍选择和艾威林（Edward Aveling）结为夫妻，却又在一段悲惨的婚姻生活之后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劳拉，嫁给了一个叛逆的医生，后来夫妻俩双双自杀。

到了 1878 年，马克思几乎放弃了他的共产事业。他的自信已被击碎。劳工领袖不理他，改革派嘲笑他。在国内外，都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儿。

1881 年 12 月 2 日，除恩格斯之外的唯一知音——妻子燕妮离世，这位温柔的贵族伴侣死于癌症。马克思几乎崩溃了。13 个月后，马克思最宠爱的女儿珍妮（Jenny）也突然离世。

据恩格斯说，此后的马克思已行将就木。他只比女儿珍妮多活了两个月。1883 年 3 月 14 日下午 2 点 45 分，马克思独自坐在椅子上去世，终年 64 岁。

三天后，六七个人随着马克思的灵柩，来到了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在那里，他的唯一挚友恩格斯宣读了悼词。这是马克思生前最想听到的赞美之词，却一生未能如愿，他在死后终于得到了。

马克思的悲剧人生

马克思动荡不安的共产革命生涯就这样划上了句号。无论用哪种标准来看，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可悲的，充斥着炽热的野心和不断的挫败。无论是敌是友，都认为马克思的人生悲剧或许是出于某种惊人的理由。他在所倡导的任何计划中，总是本能地埋下自毁的种子。



在乌克兰的去共产化过程中，马克思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雕像被扔到林中的垃圾场。（Rustamank/Shutterstock）

马克思的作品简直数不胜数——从厚重复杂的著作，到大量尖刻狂热的书信。我们在翻阅时很容易有这种感受：马克思把自己品性的精髓，深植于共产主义理论之中；他对政治权威的怨恨，化做了推动世界革命的怒吼；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无能，化做了对它的愤怒

谴责，并预言它必将毁灭。

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逼着他幻想出一套解释历史的学说，宣称“进步”不可避免，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他对宗教、道德和竞争的憎恶，使他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神和道德，也没有竞争、阶级和国家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只需各尽所能，就能尽情各取所需，丰衣足食。

马克思和他的理论结晶——共产主义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只能从远处看，甚至连朋友也不例外。传记作者常常把马克思分裂为两个形象。从远处看，他们会觉得他的理论看似不错；但近距离接触之后，却发现马克思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巴枯宁既夸赞马克思是“当代最卓越的经济和社会学天才”，又评价马克思“已经自负到了疯狂的地步”。

“马克思爱他自己，远胜于爱他的朋友和信徒。对他虚荣心的最轻微冒犯，都足以摧毁友情；谁要敢怠慢他，他绝不会宽恕；你必须把他奉为神明，他才会爱你；你最起码要怕他，他才会容忍你。他喜欢小人物、奴才和马屁精围着他转。尽管在马克思的亲信中，也有些杰出人物。但总体来说，他的亲信圈里不但缺乏兄弟般的坦诚，反而充斥着阴谋诡计和手腕。因为各怀私心，所以只不过是彼此争斗和妥协之间暂时保持平衡；一旦

虚荣心作祟，立马就情断义绝。所以人人提心吊胆，唯恐成为牺牲品。这不过是个相互吹捧的小圈子。马克思虽然负责分派荣誉，却总是背信弃义、狡诈恶毒，暗中煽动迫害被他猜忌、或对他不够崇拜的信徒。一旦他发动迫害，其卑鄙无耻程度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马克思经常对其信徒猛烈抨击，这来自于他对自创理论的绝对自负。他视之为无懈可击的真理。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经常用排山倒海般的咆哮来压倒反对者。

他对信徒们高喊：“历史进程在你们这边，资本主义是由历史进程孕育，也将在历史进程中走向灭亡。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推手。他们随资本主义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必然随这个制度一起退场。你们，无产者，用你们的劳动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活力，用你们的成果维持着这个社会。但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两者隐含着本质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落幕，社会主义的序幕将拉开。你们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只需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你们需要的只是意志！历史已为你们铺就了一条简单易行之路。你们无需孕育新思想，无需制定计划，无需发现新国度，也无需‘固执己见，预言未来’。你们只需完成赋予你们的使命。你们完成使命的手段，就在有目

的、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中。而阶级斗争最终将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

在马克思弥留之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因为自己竭力推动却最终失败的共产革命而被人铭记。西欧已经把暴力革命视为 19 世纪社会改革的过往篇章，却没想到，一个东欧沉睡的巨人将被马克思的革命号角惊醒。这个巨人，正是俄国。

在研究俄国革命之前，我们必须先大致梳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其信徒的理论遗产。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俄国革命和此后共产运动的答案。

第二章 共产主义的“魔力”

“为什么一位科学家或高学历的人，会倾心于共产主义？”在过去 70 年里，每当有共产间谍案曝光，美国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共产主义之所以吸引某些知识分子，是因为它远不止于暴力革命和共产经济学，还包含了一套“自然哲学”，似乎解释了万物的起源和发展——生命、行星、星系乃至人类智慧，有时很能迷惑人。所以，我们就在本章深入探讨它们。

共产主义的梦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至今仍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许多事情，更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梦想。简而言之，他们承诺满足人类的两大需求：普世的和平与繁荣。

这个梦想，对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来说的确有点魔力。无论是囊中羞涩的工人，还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或是躲在书房的政经理论家，都可能想来听一听。说不定，真有一种社会制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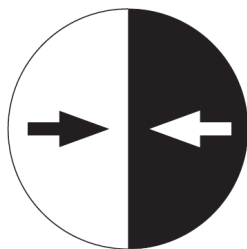
可是，一旦开始探究如何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就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一方坚持说，尽管共产主义使人类自相残杀，但仍值得一试。如果真能换来永久和平，多一场战争又何妨？另一方则说，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怎么看都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它不但要摧毁人类千百年的文明成果，还要消灭人类的所有美好品质。最终，不仅不能实现和平和繁荣，还会使人类走向毁灭。

那么，共产主义到底是基于什么理念呢？他们说：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从原子到太阳系，从植物到动物，从人类意识到智慧，再到生命的各个方面，最根本的解释就是物质。因此，如果能洞悉物质的奥秘，便能掌握宇宙的真理和人类的方向。^[78]而试图完整解释这套理念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唯物辩证法三定律。

“对立统一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他们观察到，万物都是对立元素的结合或统一。^[79]电流蕴含着正、负电荷；原子由质子和电子这对对立力量结合而成；人类也是对立特质的统一体——利己和利他，勇敢和懦弱，阳刚和阴柔。万物的这种对立统一，使其自发运行，为运动和改变提供

了永恒动力。



这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哲学家麦克法登（Charles J. McFadden）博士分析说，既然这两种对立元素会发生冲突，那么它们本身必然是有动能的。换句话说，“对立统一律”并没有解开万物动能之谜，反而是以对立元素自有动能为前提的！^[80]

麦克法登博士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两个没有能量的元素没法发生冲突和运动。这就好比一千个死掉的资本家，和一百万个死掉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生阶级斗争。”

那么，万物的两种对立元素的动能到底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于内部还是外部？共产哲学家们就回答不上来了。

列宁和毛泽东又把这个所谓“定律”进一步“发展”，将其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并且直接应用到了人类社会。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也充满着对立（矛

盾)。其中，阶级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维持着统一；但是，矛盾只有通过双方斗争来解决。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双方此消彼长，直到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形成另外一个新事物为止。那么，共产党又是如何对待内部矛盾呢？也是要“通过批评和斗争来实现‘团结’”。^[81]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对立统一律”，强调的是矛盾和斗争，和对手的“统一”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就是消灭对手。它是一种斗争哲学。这就是共产党发动暴力革命夺权，并在夺权后仍镇压异议人士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们用常识、常理稍加思考，也能发现这个定律的荒谬性。一个家庭的组成，多半不是因为夫妻对立，而是因为合得来。当然，两人脾气秉性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难免会发生矛盾。但婚姻的长久和幸福，靠的是互相沟通、包容和关爱，而不是靠你争我斗。社会上的劳资双方也一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法治和自由市场等手段，实现双方共存与共赢，为什么一定要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意是，万物确实存在着阴阳这两种对立的

特性，但二者只有相互交融，才能达到谐和的理想状态。我们从下面的太极图中可以看出来，阴阳这两种对立因素，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道家的太极图。白色代表阳，黑色代表阴。（公有领域）

显而易见，阶级斗争不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反而是走向毁灭的加速器。尽管如此，共产哲学家又从这个定律引出了第二个定律。

“否定之否定律”

接下来，共产哲学家又推断，万物都包含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这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肯定因素决定事物的性质，而否定因素会在斗争中逐渐占上风，否定旧事物，产生新事物。然后，新事物再被否定，再产生更新的事物。在此过程中，事物经过两次否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了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律”。^[82]

恩格斯以大麦为例：大麦种子发芽后死亡（否定），长成大麦；大麦成熟结出许多新种子后，又会死亡（再否定）。他认为，自然界就是这样发展的。^[83]

共产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先否定原始公有制，实行私有制，再到否定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84]

这个定律看似有点道理，但是仍然经不住推敲。麦克法登博士说，世间万物的发展并不总是靠死亡（否定），而是自有其生命规律，就是不断自我繁衍的。这个“定律”只是对世间现象的肤浅描述，其实什么也解释不了。^[85]

我们都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谚语。如果折1根柳枝插到地上，在适宜的气候下就会长成一颗柳树；然后再重复1次，就又多了1个柳树。而原来的两颗柳树并没有因折枝而死，但柳树确实“发展”了，从1棵变成了3棵。

再如，母鸡在活着的时候，就在不断下蛋、孵小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确实也“发展”了。如果母鸡因下蛋而死（否定），没法孵小鸡，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了。另外，科学家们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有98%已经灭绝。^[86]这说明旧的生命虽去，新的生命却未必来。

恩格斯对此深感无奈。他也承认“自然界中存在着

规律、秩序、因果关系和必然性。”^[87] 但是，他仍不承认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的设计，只是说本该如此。^[88] 然后就缩回去，藏在虚无飘渺的说辞后面。人们越发觉得他的理论晦涩难懂。

毛泽东常说的“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甚至“大乱才能大治”，就来自于这个定律。但是，我们从毛泽东自己的实践结果来看，破了“旧”未必就能立“新”；“新”的也未必就比“旧”的好；“大乱”也并没有实现“大治”。

假设这个定律真的是普世真理，在马克思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不是应该再出现否定它的、更高级的私有制社会吗？那么，他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是人类的终极理想社会了。因此，这个“定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89]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看待万物发展就非常透彻。我们仍用常识、常理，以家庭为例。夫妻两人都期望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怎么做才好呢？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才是最好的治家之道。没有必要通过不断否定来发展。家庭如此，国家亦然。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意是，宇宙按照规律运行，产生了阴阳，阴阳相合，又产生了万事万物。^[90] 孔子也在《中庸》里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可以运行不息，万物就能生长发育了。两位圣贤都认为，万事万物只有“和”才能发展，与这个“定律”的“否定”思维是截然相反的。

在用“否定之否定律”解释了万物的发展之后，共产哲学家又开始大胆地解释宇宙万物的来源了。

“质量互变律”

共产哲学家进一步认为，事物的不断量变最终会导致质变，孕育出崭新的事物。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一切事物都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再从质变到量变的交替发展演变过程。这就是“质量互变律”。

他们常举水的例子：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下降到 0° C 就会变成冰，加热到 100° C 时会变成蒸气。他们认为，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91] 但是，自然科学家说这只是“相变”——水的形态变了，从液体变成了固体或气体，而水的本质——分子结构（H₂O）并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把这一现象解释为质变是不准确的。

不过，共产哲学家确实很钟爱分子结构的变化。他们常以甲烷为例：“化学证明，甲烷是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现在，如果我们在甲烷中再加入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只是已有两种元素数量的增加），就会得到全新的化学物质——乙烷；如果在乙烷中再加入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就得到全新的化学物质——丙烷；再加入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就得到了第四种化学物质——丁烷；继续加入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就得到了第五种化学物质——戊烷。”^[92]

这个例子看似很贴切，其实是在玩“偷换概念”——把“化学反应”偷换成了“内部原子数量的增加”。要想把甲烷变成乙烷，必须在正确的条件和路径下，发生分子重组的化学反应才行。像搭积木一样塞进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是不可能发生“质变”的。

这就像我们盖房。如果没有建筑公司按照建筑学原理精心设计和施工，即便我们把砖头、木料堆积如山，也变不成房子。砖头、木料对于盖房固然必不可少，但建筑学原理、精心设计和施工更为重要，这就是盖房子的规律。同理，甲烷、乙烷、丙烷、丁烷和戊烷，也都有自己的分子生成规律，是不可以忽略掉的。

我们进一步思考，如果万事万物都有其生成的规律，那谁又是它们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呢？是否

有超越万事万物的高级智慧生命？我们这样一思考，共产党就害怕。共产哲学家们绞尽脑汁也要把这个关键问题抹去。否则，他们的理论基础——无神论和进化论就坍塌了。

最让共产哲学家们头大的，是自然科学家们的“灾变论”。其代表人物之一，是比恩格斯早还出生 50 多年的法国科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他研究发现，地球表层经常发生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如海陆升降、水灾、火山爆发、地震等等，导致许多生物毁灭。之后，其它地方的生物迁移到这里繁衍生息。再后来，又发生大的天灾，如此循环不已。所以，在不同的地层就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化石。这些灾变并没有所谓的“量变”过程。很多学者认为，这类研究直接否定了“质量互变律”。

恩格斯对此无力辩解，他能做的就是给居维叶扣帽子：“（居维叶的理论）实质上是反动的……使神迹成为了自然界的根本杠杆。”^[93]

除了影响地球表层的“灾变”，生物学家们还发现了没有量变过程的基因突变。共产哲学家们只好狡辩说：在发生突变之前的稳定状态“就相当于量变状态”。^[94]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

客观地说，很多事物确实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现象。只是共产哲学家们以偏概全，把这样的现象拔高成了绝对真理——“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就难免碰壁了。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极其复杂，有很多事物之外的因素在影响甚至左右着事物的进程，根本无法用简单、机械的“质量互变律”解释清楚。

例如我们做事，很多时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即便我们尽力而为（量变），也未必能获得满意的结果（质变），有时可能半途而废，有时可能功亏一篑。也有很多时候，突然就有一个结果出现了，却和我们此前的努力毫无关系。

中国自古至今，做事都讲“天时、地利、人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意思是，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努力谋划，但能否做成还得看天意。如果把“质量互变律”当成绝对真理，很可能会误事。

不过，马克思和其他共产哲学家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揭示了“物种起源”，还为生命的奥秘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答案。

“生命、意识和心灵起源说”

共产哲学家们认为，生命现象就是某次质变的产物。恩格斯说，物质的复杂化学结构一直演化到蛋白体，而生命就是由蛋白体产生的。蛋白体是自然界中的高级运动形式。^[95]

恩格斯断定，只要生命自发地从蛋白体中产生，就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某次质变中，意识偶然出现了，生物开始感知到外界信息；然后，又出现更高层次的生命，能整理这些感知，建立联想。于是，心灵作为一种有智慧的物质特性出现了。不过，仍然是物质为主，心灵为次，没有物质就没有心灵。因此，也就没有灵魂、不朽和神。恩格斯自夸说，他们在发现这三个定律之后，就彻底抹去了创世主的最后一丝痕迹。^[96]

至于人类，他们则认为是一种“高级动物”，都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但是，因为人类偶然幸运地拥有了最高智慧，于是，就成为了宇宙中的“真神”。这正是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唯一的上帝就是人类自己。”

既然人类拥有最高智慧，改造世界自然就成了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马克思认为这项重任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只有它，才能真正理解社会 and 经济发展。

尽管马克思信心满满，但是他的共产哲学的基

础——无神论和进化论却一直备受质疑。研究进化论的学者们常说：“大自然不可能偶然孕育出眼睛这样的复杂器官——成千上万的微小组织，完全按视觉所需精妙的组合在一起，比人造的照相机还要复杂得多。这种概率微乎其微。”

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一想到眼睛的精妙，就觉得震撼，因为他的进化论根本解释不了。所以，他在《物种起源》中写道：“如果假定眼睛能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我坦白承认，这种说法似乎是极其荒谬的。”^[97]

学者们还说：“眼睛只不过是人体中的众多精密器官之一。自然界同样难以偶然孕育出其它器官和腺体。不仅如此，所有这些精妙的器官和腺体，又构成了完美运行的人体。而人类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无数物种之一，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精妙绝伦的结构。”

其实，达尔文早就意识到，随着未来科学的发展，他的假说很有可能站不住脚。他忧心忡忡地在《物种起源》里说：“倘若能证明，有任何复杂器官不是经过无数渐进且微小的变异而形成的，那我的学说就要完全破产了。”^[98]

在进化论假说诞生的年代，人们对生命体的微观复杂结构一无所知，以为细胞里就是像胶冻一样的简单物质。到了1950年代之后，科学家们对生命的探索深入到了分子层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微观世界。

科学家们发现，细胞里充满了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机器”，所有的功能都由特定的“分子机器”来执行，其效能远远超出人类设计的同类机器。例如，一些细菌至少有一条鞭毛，用来带动细菌在液体中游动。科学家们把鞭毛的结构放大5万倍后，发现这个鞭毛就是一台精密的“分子机器”——有定子、转子、U型接口，传动轴和推进器，甚至还有前进和后退两个挡位，和摩托艇上的发动机结构惊人地相似。

科学家们由衷地赞叹说，这台“分子机器”是宇宙中效率最高的机器，它能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运转。尽管运转速度如此之快，但它只需1/4圈的时间就可以停下来，然后马上继续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反转。除此之外，这架分子机器的另一端还连接着一个信号传感器，用来接收外界的反馈信号，以便调整运动状态。科学家们认为，它是一种“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只要缺少一个零件，机器就失去了功能。

我们都知道，人类要想制造一台摩托艇发动机，需要精密的设计、零件制造和组装。如果我们只把原材料

堆在一起，仅仅依靠风力、阳光、雷电等随机的自然因素，无论过多少年，我们都不可能得到一台发动机。最大的可能，是得到一堆锈迹斑斑的废铜烂铁。

但是，按照进化论假说，这台比摩托艇发动机先进很多倍的“分子机器”，不用按照既定原理设计、制造和组装，只要在自然界让分子们随机碰撞就可以产生，这怎么可能呢？^[99]

100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考古学等各领域学者，都发现进化假说漏洞百出，不断提出质疑。牛津大学生化学家柴恩教授（Ernst Chain）曾因发现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疗效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进化论是“没有证据且与事实不符的假设”。^[100]

著名物理学家牛顿（Isaac Newton）说，太阳系的行星在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卫星在轨道上环绕着地球运行。我们无法想象如何产生这么多有规律的运动。这个由太阳、行星等组成的最美丽系统，只能是通过高级智慧生命——创世主的精心设计才能实现。^[101]

因此，建立在无神论和进化论基础上的共产哲学和他们发现的所谓“定律”，其实都是沙滩上的大厦，是不堪一击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此打

住，而是决心把它推而广之，运用到人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们对历史、经济、政治、道德等各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行动计划。然后，追随他们的共产领袖们，又把这套“行动计划”强加给了人类。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解释，又是如何做的。

第三章

共产主义的计划和预言

相对于共产哲学而言，共产党的行动计划更为人熟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在工业革命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生产力快速提升带来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当时的经济动荡，致使他们对所处的时代强烈不满，并由此得出结论——生产方式残酷无情地主导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对国家制度、个人财产、道德和宗教等做出了解释，并制定了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还附带着对历史进程做出了几个预言。下面，我们就这些话题逐一探讨。

“生产方式会产生相应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说：“如果人类的生产力达到特定的发展状态……相应的文明社会就会自然产生，就会有特定的政治制度，这是文明社会的官方表现。”^[102]

假如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同一种生产方式，就应该产生相同的国家制度。但我们回顾一下古希

腊和古罗马历史，这两个国家都是奴隶制经济。可结果却和马克思理论恰恰相反——尽管生产方式没变，国家制度却变来变去。

在古希腊的城邦小国雅典，国家制度先是世袭君主制；接着换成贵族共和制，再换到民主共和制；然后又变成了三十个僭主的专制统治；最后又恢复成民主制度。

在罗马，国家制度先从选举君主制，接下来也是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然后又变成凯撒时代的绝对君主制。这些都是历史上生产方式不变，而国家制度却不断变化的典型事例。

反过来讲，如果生产方式变了，国家制度也未必随之改变。以美国为例，建国 240 多年来的国家制度就基本没变过。



美国使用黑人奴隶的烟草种植园。Richard H. Laurie
1821 年创作的版画。（公有领域）

美国在建国初期，南方是奴隶制经济，北方是工业经济；后来南方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变了，国家制度却依然如故。

马克思还认为，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如果生产方式变了，法律自然也会随之而变。这个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尽管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却普遍遵循着比工业革命还早几百年的法律体系，只是做了些微调而已。

例如英国，在封建社会确立了普通法；在封建社会结束后又强化了普通法；到工业革命后再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废除了奴隶制之后，也没有推翻国家和各州的基本法律框架。

这说明，人类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创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关系不大。这就好比共产主义者说一道美食只取决于灶台的火——有什么样的火就有什么样的食物，似乎有点道理，但显然还缺了很多东西。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共产党崇尚无神论，因此传统宗教就是共产党的天敌。由于信仰的强大力量，人们拒绝共产党的压迫，也

不会奉命撒谎、偷窃和伤害无辜，更不会参与共产党的种族灭绝罪行。坚定的信仰就像一堵墙，抵挡着共产党的行动计划。因此，共产党把宗教抹黑成“人民的鸦片”，欲除之而后快，^[103]

有人问马克思：“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推翻上帝，摧毁资本主义！”斯大林杀气腾腾地说：“我们镇压了那些反动教士吗？没错，我们镇压了。遗憾的是，这些教士还没有被彻底消灭。”^[104]

前苏联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说得更加露骨：“我们憎恨基督徒和基督教。即便是最优秀的基督徒，也应视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基督教的博爱阻碍了革命的发展。抛弃对邻居的爱！我们要的是仇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征服整个宇宙！”^[105]

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领袖们在否定了传统正教的神之后，却热衷于神化自己，让信徒高举语录，竖起雕像，向自己顶礼膜拜。

“传统道德都是阶级道德”

共产领袖们对待传统道德的态度，与对待宗教差不多。他们认定，西方的《十诫》等传统道德规范，就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权和有产阶级。

例如，他们说，《十诫》要求“不可偷窃”、“不可贪婪”，就是统治阶级想让被剥削者尊重他们的财产；要求“孝敬父母”，是因为早期希伯来人把孩子当成父母的个人财产；“不可杀人”，是因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身体当成个人财产，应该和其它财产一样受到保护；“不可奸淫”、“不可贪恋邻居之妻”，则是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是丈夫的“个人财产”。



摩西十诫雕像。(Waupee08/Shutterstock)

因此，他们把这些传统道德规范都称为“阶级道德”，视为共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摧毁。恩格斯说：“我们反对任何强加给我们道德教条的企图。”^[106]“不可偷窃这条诫命，会因此成为永恒的道德规范吗？绝对不会。”^[107]

共产党在俄国掌权后，很快就禁止女性成为“个人财产”，但结果是把女性地位贬到了最低。萨拉洛夫苏维埃颁布的一项法令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 1919 年 3 月 1 日开始，废除对 17 岁至 32 岁女性的所有权……根据本法令，不能再把任何女性视为个人财产，所有女性都将成为国家财产……所有这些女性，必须在本法令发布后三天内，亲自到指定地点报到，并提供所有必要信息……”

“任何希望使用国有化女性的男子，必须持职业工会的行政委员会或工农兵苏维埃签发的证明，证明其属于工人阶级……每位工人须上交其工资的 2% 到基金；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男性公民，如果能支付相当于 250 法国法郎的款项，也可享有同样权利……本法令宣布成为国家财产的所有女性，将从公共基金获得相当于 575 法国法郎的月工资……”^[108]

揭示女性在共产党道德观下如何获得“解放”的，还有另一份文件。一名苏联官员在文件中说：“不存在女性被男性侵犯的问题。谁要说侵犯不对，谁就是在否定十月共产革命；谁为受侵犯的女性辩护，谁就暴露了自己是资产阶级和个人财产权的拥护者。”^[109]

这种逻辑令人瞠目结舌。但在共产党的道德观里却

完全说得通。列宁是这样总结的：“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110]说白了，凡是有利于实现共产党目标的，在道德上就是好的；反之，在道德上就是坏的。

一位美国共产党人说：“对共产党而言，目的决定手段。只要有效，它才不管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它知道，现行的法律和道德规则，都是它的死敌制定的。因此，只要它力所能及又符合目的，它就会无视资本主义的合法、公平、正义等理念，发展出比资本主义敌人更强大的力量。”^[111]

共产党一旦掌权成为统治阶级，就会强迫人民接受它的道德观，而且不许质疑、不容挑战。因此，共产党的道德才是不折不扣的“阶级道德”。

“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过去所有社会都是由对立阶级组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断推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阶级斗争。

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推翻了奴隶主，建立起封建社会；然后，农民又推翻了封建领主，建立起资本主

义社会。因此他们说：“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2]

学者们认为，这个理论违背了历史上显而易见的事实。例如，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古代文明的衰落和覆灭，就和奴隶反抗奴隶主毫无关系：

“那时的大多数奴隶都顺从、卑微而又无助，偶尔有抱怨或反抗，都会遭到残酷镇压。那些可不是马克思想像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过渡到封建制度。恩格斯自己也说过，在罗马帝国末期，奴隶又少又贵，依赖奴隶劳动的大型庄园无利可图。而自耕农和佃农的小规模耕作却比较赚钱。总之，‘奴隶制的消亡，是因为它不再赚钱了’。然后，蛮族入侵，罗马灭亡，确立了封建制。这是低等文明征服高等文明的结果，并不是依靠所谓的阶级斗争来推动。”^[113]

历史文化学者章天亮教授说，中国的改朝换代，也都不是由于农民造反。例如周朝灭商朝，造反的是诸侯国周；秦国灭周朝，元朝灭宋朝，清朝灭明朝，也是一国灭另一国；隋朝取代北周、唐朝取代隋朝、宋朝取代后周等等，都是权臣篡位模式。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都是前朝的王公贵族，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首领。历史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虽然出身农民，但他号召人们造反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

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却带有浓重的民族解放色彩，也不能都归于阶级斗争。^[114]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断言，阶级斗争必然会带来进步。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几百年一直都停滞不前？例如，印度、中国、埃及、阿拉伯和东亚地区。而且，历史上也有很多例证，一个国家在达到巅峰之后，往往会走向衰落，丧失其文化和经济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历史的解读错得离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也都没有应验。

“资本主义两阶级对立不可避免”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必然会激烈对立。于是，共产党绞尽脑汁煽动工人造反。它说，既然是工人的劳动生产了商品，就应该得到商品的全部利润。所以，工人阶级应该起来夺取工厂。

但批评者问：“资本家的投资，难道不应该得到一些利润吗？如果没有他大笔冒险投资，哪里会有工厂和就业机会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某些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财富，是因为他们此前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应该夺回来。批评者又问：“既然赚的利润应该全归

工人，如果工厂赔钱，是否也该由工人赔呢？”共产党又回答不上来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劳资之间博弈的往往是双赢——工人不但没有成为资本家的敌人，反而更公平地分享了资本主义果实，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强大购买力，又保障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运行。

为什么劳资双方会双赢？早在马克思出生之前，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在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双方是自愿交易，就是一桩双赢的买卖。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举例来说。假设你是一个程序员，到一家高科技公司应聘。这家公司根据你的学历和工作经验，答应给你年薪 10 万美金。如果你嫌少，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最终，双方也许能谈出一个都能接受的待遇。如果谈不成也没关系，没人强迫你必须在这家公司干。你完全可以扭头就走，再找几家公司接着谈，直到你找到待遇满意的公司为止。无论你最终和哪家公司谈成，你们都是双赢的——你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公司招到了满意的员工。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公平竞争。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同行的公司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你和

其他程序员也是竞争关系。如果你是这家公司必需的人才，他们唯恐你被同行公司抢走，肯定愿意给你一个业内最合理的待遇，想方设法把你留下；反过来讲，如果他们觉得你期望的待遇太高，宁可让你走人也不答应，那么，很可能他们给你的待遇已经是业内最高了。如果你不接受，他们有把握以这个待遇，招聘到和你同样水平的其他程序员。

马克思不但没有好好读亚当·斯密的书，反而挑拨离间，煽动工人把公司老板的财产都抢过来。如果他们不愿意给，就把他们杀掉，这是多么荒唐的理论？

只有在非自由市场国家，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劳工才会丧失谈判的权利，被任意盘剥。而这正是共产国家的真实写照。整个国家只有一个老板——共产党，它给你任何待遇你都得接受。只要你稍有异议，就会受到惩罚，甚至有性命之忧。毛泽东就曾说过：“要让知识分子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不但这么说，还真的这么做了，上千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强迫劳动改造甚至枪毙。^[115]

“用生产资料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马克思的一生穷困潦倒。他认为无产阶级和他的处

境差不多。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无产阶级是指没有生产资料（如土地、房产和资本等），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工人。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116]因此，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就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唯一区别。这种区分非常不科学。

例如，在美国，有些人尽管没有生产资料，但每月工资就能赚上万美元，日子过得挺好；而有些人只靠生产资料生活（例如，出租房产赚取租金），每月只能收入 2,500 美元，生活得很拮据；还有很多工人家庭用积蓄投资股市（成为上市公司的小股东），增加了一些收入。如果硬要说前者是无产阶级，后两者是剥削和压迫前者的资产阶级，不是很可笑吗？

“无产阶级将沦为绝大多数”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预测，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场逐渐趋于垄断，所有财富将落入少数人手中；再加上科技进步，机器越来越高效，工人将会大量失业。他们为了竞争工作岗位，工资会越来越低。最后，中产阶级将被迫沦为悲惨的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社会将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科技进

步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削减的还要多；工人的工资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在非经济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已接近了充分就业的经济梦想；中产阶级一直在壮大，无论是人数、占人口的比例，还是拥有的财富，都呈现出增长趋势。^[117]

由于财富的广泛分配，无产阶级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可能连马克思都没法承认他们还是一个阶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使大多数人沦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国家！

“共产党未来无需使用暴力”

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列宁解释说，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系统使用暴力。但我们坚信，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对暴力的需求将消失，人们将习惯于在没有暴力和征服的情况下，遵守在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则。”^[118]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论，如果一个人的外部环境变了，人的内心就会随之而变。可是，外在环境只能影响人，并不能改变人的本质。例如，人会笑，会吃喝，会养儿育女，能建立人脉和探索未知，还会享受拥有和分享的快乐，有个人表达或自主决定的愿望，以及改善境遇的雄心和超越

他人的动机。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共产理论严重违背人性。无论共产党使用多少暴力，都无法让人们心甘情愿地遵守它制定的生存基本规则。一旦共产政权显露败象，人们就会奋起反抗。

纵观苏联、中国和古巴等共产政权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共产党在对地主和资产阶级施加暴力之后，同样会把暴力施加到无产阶级和工农阶级的头上。只要共产政权存在，其暴力统治就会一直持续。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资将极大丰富，可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中心仓库根据需求储备和分配产品；在便利的地点也会提供充足的服务。所以，根本不需要市场、货币和价格。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社会将塑造出新型人类。每个人都必须忘记技能的差异，放弃多劳多得的愿望。大家都在最适合的工作中各尽所能，都可以获得按需分配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梦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列宁说，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全世界建立。到了那时，我

们“终于可以谈论自由了！”^[119]

一位老师问他的学生们，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口号怎么看。学生们都觉得满不错的。老师说，他要做个试验，看看在学校实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门课的及格分数是 75 分。我们来做一个按需分配：你如果得了 95 分，我就会扣掉 20 分，给只考了 55 分的学生；如果你得了 90 分，我就会扣掉 15 分，给只得了 60 分的学生。这样，大家就都通过考试了。”

班上勤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马上就提出了抗议。但成绩较差或不太用功的学生，却觉得主意不错。最后，老师解释说：

“我相信，从长远来看，你们都不会喜欢这种制度……首先，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校总是少数——很快就会失去学习的动力。如果你努力得来的成绩被‘权威’拿走给了别人，为什么还要努力考高分呢？其次，平庸的学生——在学校是大多数——也会觉得没必要努力学习。这种情况会持续，直到优秀学生的水平沦落到和别人一样，再没有多余的分数可以转给别人。为了让大家能考试过关，‘权威’就只能对所有人实行强制和惩罚了。到了那时候，你们肯定都会怨声载道，却不明白为什么变成了这样。”^[120]

在“按需分配”的学校，学生们不愿意“各尽所能”，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在共产制度下，有多少人愿意长期吃苦受累却一无所获呢？或许时常偷个懒更划算。经历过共产中国农村和工厂吃大锅饭的朋友们，对此一定深有体会。

这位老师说的“权威”，在现实社会中显然就是共产党。尽管它靠暴力强迫，仍然无法让人们各尽所能，整个社会的产出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共产领袖们深感无奈地说，只要人们不“各尽所能”，就无法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必须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人们也就只能继续沦为共产暴政下的奴隶了。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按需分配”是否靠谱。人的需求不断变化，很难精确统计。以汽车为例，到底要生产多少辆，才能满足 10 亿人的需求？另外，如果可以开宝马，谁还要捷达？如果全世界只生产一种车型，让你没得挑，那还叫“极大丰富”吗？这个世界会多乏味啊？

而且，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当新车问世时，谁还会要旧车？如果人们得不到想要的好车、新车，肯定会心生不满。那么，是否还得用共产暴政来镇压？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也没有

自由市场的共产主义世界，谁能掌握人们的所有需求？谁来管理生产？谁负责分配产品和服务？如何保证分配得公平合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又如何保证管理者“大公无私”，不会贪污腐败？如果你的所有需求都仰赖管理者分配，就等于小命始终攥在人家手心里，自由又从何谈起？无论管理机构的规模多么庞大，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共产主义社会，类似的问题肯定会堆积如山。所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等众多共产领袖，都已经在自己国家极其认真地尝试过了。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尝试，就会把国家变成人间地狱。

马克思的“毁灭性思维”

在探讨了共产主义的这些谬论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毁灭性的——凡是妨碍他实现共产主义梦想的事物，一概用暴力消灭。

例如：如果他认定是个人财产权导致了贫富分化，好吧，那就剥夺个人财产权；工资不平等？那就废除工资；竞争造成了垄断？那就消除竞争；传统道德、信仰和共产主义对立？那就铲除它们；地主、资本家反对共

产主义？那就消灭他们。最终，共产党将用暴力革命摧毁整个世界。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只能在剩下的灰燼中“开启”了。

这还不算，在共产主义梦想实现之前，共产领袖们还要求人类忍受奴工劳改营、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忍受丧失信仰、言论和集会等所有自由；同时，还必须忍受只能勉强糊口的经济制度。

自从共产党第一次夺取政权，向世界展示他们可能创造的奇迹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三分之一的人类见证了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残暴和邪恶。

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共产主义让人类道德沦丧、自相残杀是逆天而行。它不但没有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反而把人类带进了苦难的深渊。更可怕的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如果人类丧失了正确的信仰和道德，不知道是非善恶，败坏到无可救药的时候，肉体 and 灵魂都将被神彻底消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

为了更深入了解共产党，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苏共篇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
是人们试图把它变成天堂。

—F. 荷尔德林 (F. Hölderlin)



第四章 俄共起家三领袖

本章讲述的故事，都是共产党人所熟悉的。他们常常用对这些故事的解读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也会很有帮助。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

1885年，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参赞怀特（Andrew D. White），在结束他的任期之后，描述了俄国当时的情况：“整个政府系统是世界最残暴的。一个文明社会如此堕落，人民受到如此摧残，官僚系统如此无耻，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121]

怀特说这番话时，俄国人口略多于7,000万。其中，4,600万人的实际身份是农奴。

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英国工人的处境，曾经愤怒地谴责。不过，英国人的生活状况却远远好于俄国人。

俄国的农民们饱受苦难。农奴不仅遭受剥削，饥寒交迫，还身处严酷的封建制度压迫之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抓捕，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军队

的凌辱也无处不在。农奴的人身、财产、子女，甚至是妻子，都可能随时遭到君主腐败官僚的任意蹂躏。

1861 到 1866 年间，俄国君主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几项法令，想废除农奴制。然而，农民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革命的萌芽正在形成。

1868 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巴枯宁翻译的《资本论》躲过了君主的审查，迅速在自由派和激进派中传播，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这意味着巴枯宁已经在俄国点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红色火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俄国的革命运动很快就成形了。到了 1880 年，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站稳脚跟。1881 年，民意党组织成员格里尼维茨基（Ignatius Grinevitsky），把炸弹扔进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马车，炸死了他。

这场成功的谋杀，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全面革命可能已迫在眉睫。远在伦敦、年事已高的马克思接到了俄国信徒的询问：如果俄国没经过他说的资本主义这一必要阶段，是否有可能发生革命？

马克思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最终，他认为俄罗斯“提供了有史以来，在任何国家都是最罕见和最合适的

机会，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暗示——俄国可能会迎来一场超前革命。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理论转变。他承认了自己此前预言的错误——革命将首先在德国和英国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他对朋友们大发感慨：“这真是命运的讽刺。我用德、法、英三种语言，和俄国人斗争了二十五年，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支持者。”

尽管马克思用言辞和文章不断辱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忠于他的理论，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巴枯宁就是一个例证。作为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推崇备至，以至于这两位理论家担心，他可能会夺走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所以，他们决定在政治上清除巴枯宁。

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巴枯宁依然重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回顾了马克思对他“疯狂的憎恨”之后，他总结说：“我已经对公共生活深感厌倦，已经受够了。经过一生的斗争，我已经疲惫不堪。让其他年轻人来接棒吧，我已经无力再战……所以，我选择退出，唯一的请求就是被当代人遗忘。”

1876年，巴枯宁去世了。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火种，传给了“年轻人”，他们开始崭露头角。

1870 年，列宁降生。到了 1879 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相继来到人间。其他人也将陆续到来。但是，这三位将成为接过巴枯宁火种的主要领袖，来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发动俄国革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专制政权。

列宁的早年生活

马克思绝不会想到，第一位共产独裁者会是像列宁这样的人。1870 年 4 月 22 日，列宁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他的祖先是来自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他的父亲是一名拥有世袭贵族头衔的国务委员。母亲是信奉路德教的德国人。列宁有一头红发，颧骨高耸，眼睛斜视。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但他以革命时的化名尼古拉·列宁而闻名于世。他在自由派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他父亲献身于人道主义理想，在 17 年间呕心沥血，建立了 450 所小学。到列宁 15 岁时，父亲去世了。不久之后，家中再遭厄运——他的哥哥被处以绞刑。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当时年近 21 岁。他早已放弃宗教信仰，痴迷于唯物哲学。他认为，俄国需要直接

和果断的行动来推动社会改革。

在圣彼得堡（后改为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现已恢复原名）大学就读期间，亚历山大和几名同伴合谋制作炸弹，用来炸死君主亚历山大三世。炸弹由炸药和浸有马钱子毒的弹丸组成，藏在了一本伪装的医学词典中。警方在他们即将行刺之前发现了这一阴谋，迅速逮捕了整个团伙。亚历山大被很快审判和定罪。1887年5月，圣彼得堡报纸公布，列宁的哥哥被送上了绞刑架。

这场风波过后，刚满17岁的列宁重返书桌，开始钻研马克思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著作。和他哥哥一样，列宁在两三年前就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逐渐接受马克思对生命愤世嫉俗的解释。哥哥之死，坚定了他尽快成为激进革命者的决心。

为了获得专业资格，列宁深入学习了法律。在母亲的帮助下，他获准参加圣彼得堡大学的期末考试，并在124位学生中名列第一。之后，列宁本想干法律这一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几乎输掉了所有官司。于是他只好放弃，一生再也没有回头。

在1891年至1892年间，俄国爆发了饥荒和霍乱疫情。著名作家和慈善家托尔斯泰（Tolstoy）和列宁住在同一个地区。他组织了几百个食物施舍点，还分发种

子和马匹来抚慰贫困农民。

但列宁对此不屑一顾。他既不帮助建立食物施舍点，也不参加救济委员会。后来，有人指控他借助饥荒加剧人民的苦难，以便煽动他们的革命斗志。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主义理念在列宁心里已经生根发芽，使他成为了一个毫不妥协的革命者。

此后不久，列宁移居圣彼得堡。23岁的他急于投身革命，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战斗联盟。但在1895年，他患上了严重胃病，不得不前往瑞士，住进一家特殊疗养院。在西欧期间，他联络上了流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领袖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长期相处，这让列宁受宠若惊。这位俄国激进分子中的大人物，和新人列宁分享了他的暴力革命和推翻君主的计划。他也对列宁印象深刻，决定让他返回俄国召集马克思主义者，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模式，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他还指派列宁出版革命期刊。

列宁把这项任务视为命中注定的英雄使命。回国后，他组织罢工，训练新人，制定政治策略，撰写煽动性文章。然而，就在这场充满幻想的运动中，一位警方卧底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列宁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他只能

无奈地接受这个苦涩的结局。

列宁抵达西伯利亚后不久，就和马克思的女信徒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重逢。他们早在 1894 年就相识了。她应列宁的请求获准前来，条件是她必须和列宁举行婚礼，合法地结合。

这违背了他们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废除家庭。但为了能在一起生活，他们还是同意了。列宁终于有了同样献身革命的伴侣。他们没有孩子。身边人说，他们故意不要孩子，是觉得自己的使命不能有这种拖累。

列宁在西伯利亚专心读书，用秘密墨水写了大量信件，完善了新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并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到 1900 年获释时，列宁已经成为一个谨慎、精于盘算、擅用阴谋的革命家。他立即前往德国慕尼黑，创办了报纸《火花》，然后再偷偷运回俄国。

就这样，列宁夫妻在西欧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会秘密回国。他们生活简朴，行李轻便，似乎在等待历史的召唤，让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某个角色。

布尔什维克的来历

1903 年，列宁夫妻在伦敦建立总部。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继承马克思的事业。此时马克思已去世十七年，他们常去马克思墓地“朝圣”。

当年 7 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43 名代表来自俄国和西欧流亡团体。列宁作为大会主席，起初的态度还算温和、公正。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他惊恐地发现，大会正朝着和平社会主义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向发展。列宁立即召集朋友和追随者，并在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分裂了大会——是应该仅限于列宁主张的激进革命家？还是应该扩大到任何同情运动的人？

在这场角力中，列宁暂时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所以他把支持者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把反对者称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个“多数派”名号有着明显的宣传优势。这再次证明，列宁会不遗余力地利用任何手段来推进他的政治策略。

然而，列宁在这次大会的胜利很短暂。几个团体联手反对他。他很快就成了大多数议题上的少数派。尽管如此，列宁依然称他的追随者为“布尔什维克”，他的反对者是“孟什维克”。

“雏鹰”托洛茨基

在当时反对列宁的阵营中，有一位23岁的狂热青年，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会在未来和列宁成为盟友。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他。

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背景非常相似。他们都出身于富裕家庭，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对现状不满，因而投身于革命，而且都在西伯利亚服过刑。

托洛茨基原名叫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他父亲为逃避俄国君主的反犹太运动，从城市逃到了黑海附近的农业区，那里的宗教更为宽容。然而，随着家境日渐富裕，他们也逐渐脱离犹太教堂，不再遵循安息日的传统。最后，他的父亲公开宣布，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托洛茨基接受了父亲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在他外出求学期间，这些思想很快就结出了果实。在毕业之前，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唯物论者，明显流露出激进的政治倾向。尽管他父亲对此非常不满，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每当他放假回家，父子俩总是激烈争吵。几年后，他已经和家人彻底疏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克思主义呈现在托洛茨基面前，他会很自然地接受。一位比他大六岁的迷人女子向

他传授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成为了他的妻子。她叫利沃芙娜（Alexandra Lvovna）。

托洛茨基在 19 岁那年，和利沃芙娜一起组织南俄工人联盟。他还负责印刷一份非法报纸。不出所料，这很快导致他被捕。在随后的 3 个月里，他被单独关押，在不同的监狱辗转，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利沃芙娜会合。他们都被判处在这个寒冷、贫瘠、人烟稀少的地区服刑 4 年。在此期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1902 年，托洛茨基藏在农民的干草车里，成功越狱。在到达西伯利亚铁路后，他用一个假身份证件伪装成了“托洛茨基”——这是一个已故狱卒的名字！此后，这个名字将伴随他一生。在几位马克思主义同志的协助下，他前往伦敦，参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不久之后，他的妻儿也来和他团聚。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见如故。列宁称赞托洛茨基是一位有罕见才能的革命家。作为回报，托洛茨基则建议列宁担任大会主席。然而，他在大会期间发现，列宁的冷酷和尖刻宛如蓝色刀锋，这让他很不安；一些党内最资深同志因为反对列宁，也被列宁无情地开除，这也让他很震惊。（此时托洛茨基对同志的温情关怀，和他后来在 1917～1922 年间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段时间，他无情地清算了许多他认为偏离共产政策的同志。）

事实上，托洛茨基在 1903 年暂时反对列宁，并没有妨碍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成为了一名作家和公众演讲家，在西欧出名比列宁还要早。有人称他是一位英俊、傲慢、反社会的知识分子。有时，他会因为穿着讲究而令同志不满。他那向下翘的鼻子和小胡子，为他赢得了“雏鹰”的绰号。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俄国革命运动快速发展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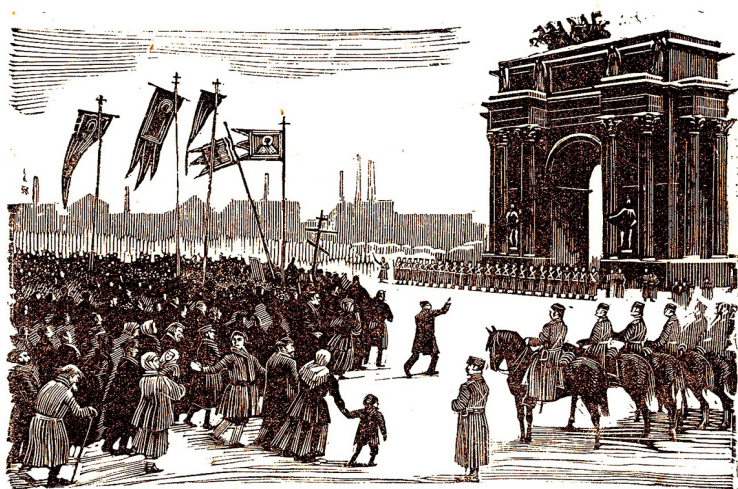
1905 年俄国革命风云

到了 1903 年，俄国政局已经如火药桶般一触即发。尼古拉二世没有意识到，他将成为末代君主。作为一名统治者，他的软弱无能令人吃惊。年轻时的他和蔼可亲，俄国的自由派曾对他抱以期望，在登基后推行国家亟需的改革，使俄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然而，他们的期望化为了泡影。尼古拉二世对外延续了他父亲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内加强了他遭暗杀祖父的铁腕手段。

1903 年，尼古拉二世还为了满足自己的扩张野心，把俄国卷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对日战争，并很快就尝到了战败的屈辱。

这场持续两年多的俄日战争，在临近尾声时，俄国

人民承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已经使帝国四分五裂。政府官员遭到暗杀，大规模示威活动不断，最终还导致了一场超过 250 万人的大罢工。尼古拉二世动用了所有手段镇压起义。但大规模逮捕、监禁和处决，都不能阻止起义的浪潮。全国上下民情汹涌，从银行家到农民，从教授到文盲，人们一同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905 年 1 月 9 日，抗议民众来到圣彼得堡纳尔瓦门前。
雕刻作品。（公有领域）

君主的愚蠢政策，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冬宫大屠杀便是其中一例。这场惨剧发生在 1905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一位名叫加蓬（George Gapon）的神父，带领几千名手无寸铁的工人游行，向冬宫行进。他们高举着尼古拉二世的巨幅画像，并齐声高唱“上帝保佑君主”。

这一幕颇为怪异，因为工人们的贫穷形象和冬宫的富丽堂皇形成了鲜明对比。冬宫是一座能够容纳 6,500 多名宾客的奢华建筑。

他们想和平地递交一份请愿书，希望改善劳动环境。然而，君主并没有出面接见他们。相反，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大批军队包围了。起初，工人们心里忐忑不安，但没有人命令他们解散，这让他们稍感安心。

突然，一句沙哑而急促的命令打破了宁静。军队随即向人群开火。密集的扫射把前排人群打倒，其他游行者恐慌中互相踩踏，仓皇逃生。军队不断射击，直到人群被完全驱散。大约有 500 人当场丧生，3,000 人受伤。这一事件在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被称为“血腥星期日”。

冬宫大屠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俄国各地。人民本已对俄日战争的负担怨声载道，这场屠杀成了全面起义的导火索。起初，只有少数人暴力反抗，主要是通过罢工来瘫痪俄国的战时经济。几个月内，俄国的经济就完全停摆了——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报纸停刊，日用品和燃料没人运输，新收的粮食在码头烂掉。这是尼古拉二世即位后第一次感到惊恐不安。他决定不再和日本开战，倾听人民的诉求。这些诉求包括四个方面：

1. 保障个人权利，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

自由，以及组建工会的权利。

2. 各阶层人民有权投票选举杜马（人民议会）。

3. 未经杜马同意，君主颁布的任何法律将自动废除。

4. 杜马有权裁定君主颁布的诏书是否合法。

这些要求写进了《十月宣言》。宣言明确民众无意颠覆君主，只要求建立一个类似英国的有限君主制。这种妥协让马克思主义者又气又急，他们希望继续革命，直至君主无条件投降。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建立共产政权。

托洛茨基在起义爆发后，立即匆匆回国。他站在庆祝君主接受宣言的人群面前，撕毁了宣言副本，告诉他们，这是对革命的背叛。他马上和其他同伙大量组建苏维埃（工会中的工人议会），想把革命的火焰重新煽动起来。

直到当年11月，列宁才回到俄国。他决定和托洛茨基一起推动“第二次革命”。但不到两个月，这次革命就被瓦解了。托洛茨基被捕，列宁连夜逃往了安全地区。

至此，历时十四个月的革命运动终于结束。前十二个月是全民起义，后两个月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军

队出动了超过 2,500 次。在人民和军队的战斗中，有 1.4 万人丧生，约 1 千人被处决，2 万人受伤，7 万人被捕。

托洛茨基在革命最后阶段的领导角色，使他受到了俄国法庭重判。他因革命暴力罪，被无限期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并没有去，而是在严冬时节大胆潜逃了。在乘坐鹿雪橇行驶了 430 英里之后，又骑马穿越了乌拉尔山脉，逃到了芬兰，在那里和列宁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会合。

在芬兰期间，托洛茨基提出了“永久革命”理论，主张共产党人应该不断攻击所有现存政府，直至推翻它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使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此时，布尔什维克运动正处于最低谷。领袖们没能实现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承诺。他们在《十月宣言》之后的行动让尼古拉二世感到愤怒，以至于他几乎废除了《十月宣言》。他允许人民选举杜马，却又设法剥夺了杜马的所有实权。人民明白被骗了，但如果不发动另一场革命，就难以兑现《宣言》，可这又似乎遥不可及。尽管仍有个别团体在煽动反对君主，但大多数革命者（如布尔什维克领袖），都被迫流亡西欧了。

为了重振布尔什维克日渐式微的影响力，列宁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位新的革命人物，他就是斯大林，是外高加索一个布尔什维克小团体派来的代表。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列宁一眼就相中了他，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来自农民阶级，做事粗暴、执着、冷酷无情。列宁对他刮目相看，招揽为己所用。

就这样，在俄国革命运动中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斯大林其人

斯大林原名朱加什维利（Djugashvili）。1879年12月21日，他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城戈里出生。他的父亲是个鞋匠，因酗酒过度而早亡。当时斯大林只有11岁。此后，斯大林的母亲洗衣、擦地、缝纫、烘烤，以赚取足够的钱供斯大林上学。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神父，所以他被送到附近的第比利斯（Tiflis）神学院学习。

在神学院里，斯大林发现了许多秘密社团。它们热衷于传播费尔巴哈、鲍威尔（Bauer）的无神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不久，他就确信自己更喜欢革命而不是宗教。因此，他也积极参与了秘密社团的

活动。近3年后，1899年5月，斯大林因缺乏宗教使命感被神学院开除。

步入社会后，斯大林全身心投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他组织罢工，举办非法五一庆典，后来逃到巴统（Batumi），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劳工领袖。斯大林最终被捕，在狱中服刑到1903年，又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

在西伯利亚期间，斯大林听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了。他几乎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年，他成功逃离西伯利亚，回到了家乡第比利斯，成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05年的革命中，他在格鲁吉亚发起了一场未遂革命。随后，他赴芬兰开会，见到了列宁。

从那时起，斯大林就成为了列宁的得力助手，并对他深表敬仰。不久之后，斯大林对共产事业的激情就强烈地展现出来了。

第比利斯爆炸抢劫案

1907年夏天，斯大林在柏林和列宁秘密开会。之后，他回到第比利斯，组织了一次抢劫。这可不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式冒险，而是完全不顾家乡父老死活的重大黑

帮行动。

就在运钞车队从邮局赶往国家银行第比利斯分行时，突然，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了拉车的马匹和几位路人，另有 50 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扔炸弹的人趁着混乱，从车上抢走了装有 34.1 万卢布（约 17 万美元）的钱袋，然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这桩罪行完全漠视人命，以至于俄国当局在国内外努力追查线索，以确定罪犯身份。最后，在斯大林的一位亲信手中发现了这笔钱。此人名叫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他在 1933 年奉斯大林之命赴美，寻求承认苏联）。当时，他正和同伙在巴黎，企图把卢布换成法郎，然后再汇给列宁，结果被法国警方逮捕。俄国当局最终查清了犯罪细节，并披露了罪犯姓名。尽管如此，斯大林依然逍遥法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斯大林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

从 1907 到 1913 年，斯大林一直在卖力地工作。他不只是一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者”，而且精通宣传、政治斗争、大众传播、煽动劳工和罢工策略。他在巴库（Baku）这个工业区获得了重要经验，负责组织成千上万的油井和炼油厂工人。为此，他建立了合法、半合

法和非法的三重组织体系。忠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伙从上到下完全主导的强大工业苏维埃，完全控制了这个大型工业中心的工人。

因为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斯大林的演讲一直不够出色，但在此期间，他已成为一名杰出的革命作家。他曾在第比利斯编辑《时代》报纸，言辞犀利地批评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内部都引起了轰动。1910年，他移居圣彼得堡，为《社会民主党人》、《星报》和《真理报》撰稿。在这些刊物上，他的笔名斯大林（俄语意为钢铁人）渐渐为人熟知。

1912年，列宁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建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改称俄国共产党），斯大林因此得到重用。列宁任命他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

然而，就在第二年，斯大林的事业中断了——他再次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于斯大林而言，这已是家常便饭。自1903年起，他已经被捕八次，被流放七次，其中逃脱了六次。但这次被捕，他可是难以逃脱，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最偏远地区。

随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并不急于逃跑。他告诉朋友们，自己打算在西伯利亚放松下来享受“假期”。因为如果逃跑，很可能导致被征召入伍，

他对服兵役可是一点也不感兴趣。

尼古拉二世王朝气数已尽

1914 年，欧洲列强纷纷炫耀武力，任何外交失误都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战争。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是在当年 6 月 28 日，一名塞尔维亚秘密组织成员，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

奥匈帝国一直想借机吞并塞尔维亚，于是军队开始行动。这触怒了俄国君主尼古拉二世，因为塞尔维亚也在他的征服清单上，于是他向奥匈帝国宣战；而德国为了保护奥匈帝国，也向俄国宣战；当时的法国是俄国盟友，德国也以此为由向法国宣战；而英国又是法国的盟友，因此也加入了战争。就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尼古拉二世而言，这次世界大战并非意外。多年来，他一直在忙于打造强大的军队，为战争做准备。然而，俄国人民可并不这么想。

近十年来，俄国人民和尼古拉二世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为他一直没兑现在 1905 年《十月宣言》中承诺的宪政。当然，在世界大战爆发时，人民受到了外国威胁，会本能地保卫国家。尼古拉二世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他相信人民会在战争期间忠实地支持自己。

没过几个月，战争的压力就显现出来了；到了 1915 年，俄国民间已经怨声四起；到 1916 年，尼古拉二世的战争机器已经濒临崩溃。在 3 年间，俄国已经征召了超过 1,300 万士兵，其中约 200 万人阵亡，400 万人受伤，250 万人被俘。在长达 24 个月的时间里，前线一直噩耗不断：俄军被赶出了加利西亚、俄属波兰、部分立陶宛、塞尔维亚和达达尼尔海峡。

在奥斯曼帝国参战之后，俄国的对外贸易骤减，而且也无法获得盟国的武器弹药。派往前线的后援部队往往装备简陋，其中一些人不得不从沿途死去的士兵身上捡来步枪。弹药匮乏常常迫使指挥官限制配给，每天每门炮不超过四发炮弹。俄军逃兵数量惊人。英国大使警告尼古拉二世，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整个东线可能会崩溃。

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也要造反。政府用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购买粮食，导致粮食短缺日益严重。在城市里，生活成本已经飙升到三倍，而工资只略有上升。

但是，尼古拉二世并没意识到有任何危机。他已经平息了 1905 年的革命，觉得自己仍然能如法炮制。为了证明自己信心十足，他宣布将亲赴前线，以鼓舞军心。

尼古拉二世似乎忘记了昔日的教训——目前俄国人

民的困境已经和 1905 年革命前夕极其相似，即便他亲临战场也是徒劳；他没料到，他的王朝气数已尽——他将在几个月后失去王位，并在不久之后丢了性命。

第五章 苏联的共产暴政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此后的二十年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实践样板。共产党把它当作历史证据，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确可行。然而有趣的是，这段历史也同时揭示了许多有力的反共证据，我们把它们汇集在这里，供您自行评判。

1917 年俄國“二月革命”

1917 年 3 月 8 日（儒略历 2 月 23 日），俄国的革命热潮终于爆发，直扑尼古拉二世和他的政权，但暴力事件相对较少。民怨如此沸腾，以至于信号一发出，就有 25 万示威者出现在首都街头。示威民众控制了首都之后，革命之火便迅速蔓延到全国。

这场革命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美国刚刚参战；法、英、意三国已经筋疲力尽；西线在德国及其盟国的猛攻下岌岌可危。如果几百万俄军在东线一旦溃败，对协约国来说，就意味着大难临头。

对德国而言，俄国革命意义同样重大。德国君主知道，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德军在东方的大量兵力就可以转战西线。这将使他拥有巨大的优势，击溃一切抵抗力量。

但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从未打算让东线崩溃。他们反抗君主是为了拯救俄国，而不是毁灭俄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了一项全面计划，准备建立民主宪政，并积极推动战争进程。这使协约国重新燃起了希望。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立即承认了这个新政权。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也和俄国人民一道，乐见这颗自由新星冉冉升起。

至于尼古拉二世，他实在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革命之初，他断然否认他的政府已经解体。民众刚开始示威时，他解散了杜马，并命令军队驱散示威人群。然而，不到一周，他的大臣们就劝他退位，因为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最后，在将军们的敦促下，他黯然交出了王权。

随后，他和家人被软禁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新名）郊外的宫殿里。尽管人民在他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苦难，但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杀死他们，而是想在战争条件允许时，把他们一家尽快送往英国。

在解决了尼古拉二世的问题后，临时政府迅速开展了两大任务：一是推动全面的国内改革，二是重振俄国的军事实力。前线的士兵们很快展现出新的战斗力。短短一个月，国内改革也已取得显著成果。有史以来，俄国人民第一次拥有民主政府来治理国家。参与起义的列维夫亲王（Prince Lvov）满怀自信地宣布：“我们应该认为自己是最幸福之人，因为我们这代人正处在我国历史上的最快乐时期。”

列宁和德国人暗通款曲

至此，我们知道了一个重要而且有趣的历史事实——尼古拉二世退位和建立俄国临时民主政府，根本就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无关！这场革命，是由1905年反君主起义的同一批人发起的。他们代表了俄国的精英——自由派贵族、知识分子、商人、几百万农民和工人。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却都不在场。列宁流亡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斯大林还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布尔什维克永远也无法宣称，自己为1917年3月推翻君主的革命立过什么功劳。

临时政府实行了宽容政策，允许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回国，所有在西伯利亚的政治犯都被释放。当英国人得知列宁获准回国时，他们警告自己的俄国盟友，

此举可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列宁之所以顺利返俄，全赖德国人的帮助。

德国人支持列宁的理由很明显：他们很担心俄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正在寻找机会，在俄国临时政府内部制造混乱和分裂。德国人在瑞士和列宁简短交谈之后，他们确信，列宁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人选。所以，他们护送列宁夫妻和一些俄国流亡者穿越德国，进入瑞典。对列宁来说，从那里前往俄国首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当列宁抵达彼得格勒时，被当成了革命的盟友，受到群众欢迎。军方帮他登上了一辆装甲车的车顶。下面很多民众满怀期待，等待着他对于革命成功的赞颂。然而，列宁一开口却是犀利的批判，那些煽动言辞，简直就是一份新的宣战书！

列宁严厉谴责临时政府说，不该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应该建立共产主义专政。他呼吁开展斗争，夺取地主庄园，立即把俄国人民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之下。他还谴责任何继续战争的努力，表示应该立即与德国和谈（他后来被指控想让俄国退出战争，是要报答德国人的恩惠）。

短短几周内，整个俄国都能听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宣传，他们重复着列宁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纲领；从西

伯利亚回来的斯大林，在新的共产党报纸上发表文章，煽动反对“二月革命”；托洛茨基也从纽约回国，用他雄辩的口才，鼓动工会和军队颠覆临时政府。“和平、土地和面包”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口号。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番宣传确有诱人之处。

布尔什维克暴力夺权

临时政府警告人民，不要被布尔什维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但由于无法满足人民过于急切的改革要求，政府的威信开始下降，警告自然也就失去了份量。在1917年7月，农民、工人和军队的暴动再次爆发。列宁判断，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认为，俄军主力正在前线拼命阻击德军，要战胜由老人和男孩组成的后方部队并不难。然而，列宁还是失算了。当他率领布尔什维克部队出击时，临时政府不仅镇压了叛乱，还迫使列宁逃往芬兰以求保命。

从那时起，列宁行事更为谨慎。他让手下组织新的革命力量，自己则在国外遥控。托洛茨基就是他手下的干将之一，他现在已经公开认同布尔什维克，并迅速升任二号人物。他的任务是在工会、陆军、海军和农民中组织武装造反的红军。

10月初，列宁觉得已经足够安全，可以回国了。11月7日，他决定发动全面革命，推翻临时政府。他命令托洛茨基率红军向冬宫开火，并夺取政府的其它所有要塞。在猛烈攻势下，这些地点很快沦陷，临时政府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被俘虏。这就是共产党作家所说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序幕。

在随后短短几周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暴力夺取了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政权。由于正规军无法救援临时政府，民众发现自己也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可此时他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到了12月中旬，布尔什维克镇压了最后的反抗力量。人们终于明白，他们的自由梦想已经化为了泡影。

俄国人民投票拒绝共产党

在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已经定好11月25日为全国选举日，目的是成立人民议会。当初布尔什维克也曾大声疾呼要求这次选举。所以，尽管现在列宁亟需巩固权力，他也不敢延后选举。于是，选举如期进行了。

选举结果对列宁来说是一场灾难，超过75%的选民投票反对他。这显然意味着人民代表将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然而，到1918年1月18日这些代表开会时，

列宁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要求人民议会，把他们的立法权全部移交给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然后投票解散议会。这个要求显然是非法的，而且荒唐至极，代表们当然不会接受。于是，列宁动用了他的“杀手锏”。

第二天清晨，武装卫兵闯入会场，命令代表们散会。代表们看到步枪林立，知道别无选择，只好黯然退场。

这次非法政变，为俄国民主敲响了丧钟。不过，列宁也知道，这种蛮横的权宜之计为他的敌人提供了攻击的把柄。所以列宁决定，今后所有由红军发动的政变，都要营造出遵循民主程序的假象。然而，目前的灾难已成定局。共产党推翻了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代议制政府，人民很快就亲身体验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

臭名昭著的停战条约

列宁掌权之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俄国退出战争。这不仅是为了履行对德国的承诺，他还有一个更阴险的盘算。他认为，战争的压力，将可能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引发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他希望让俄国摆脱冲突，为扮演“共产主义祖国”的角色做好准备。这会让他有机会巩固权力，然后指导饱受战乱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革命，以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要让俄国退出战争并非易事。几个月来，俄军在德军的优势兵力面前节节败退。当列宁最终向列强提出停战、要求和平谈判时，他被当成了战败国的领袖。由于德国向俄国提出的条件太过分，列宁犹豫不决。为了逼他就范，德军深入俄国境内，甚至威胁到彼得格勒的核心地带。列宁急忙迁都到莫斯科，并向俄国过去的资本主义盟友——法国、英国和美国求援。这对一位共产革命家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

更让列宁感到羞辱的是，这些国家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因为他把俄军撤出战争，破坏了协约国防线的平衡。现在，这些国家正忙于准备抵挡德国春季的全面进攻，既无心也无力帮助列宁摆脱自食其果的困境。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赌徒，列宁评估了自己的生存机会，决定迫使自己的政党支持他，接受同盟国的蛮横要求。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执委会纪律严明，一些成员也对此表示反对。但列宁最终还是以 7 比 4 通过了这一提案。

1918 年 3 月 3 日，俄国和同盟国缔结了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 - 里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

Litovsk)。列宁接受的条件是，割让俄国耕地 126.7 万平方英里、26% 的铁路、33% 的工厂、75% 的煤矿和铁矿，其中还包括 6,200 万人口。此外，列宁还承诺将支付 15 亿美元的赔款！

这场使俄国付出 850 万人伤亡代价的战争，就此划上了句号。

在俄国启动共产暴政

随着俄国退出战争，列宁信心满满地要把俄国经济纳入共产主义理论的轨道。他没收了所有私人工业，把它们转为政府经营；君主、贵族和教会的土地，连同种地用的牲畜和农具，也全部没收。

然后，他又废除了工资，改为用实物支付，这让俄国退回到低效原始的易货方式；他还下令，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按阶级分配。例如，工人或士兵可以分到 35 磅面包，而非工人（如经理）只能分到 12 磅；列宁还规定，所有劳动力都必须动员起来，技术人员被迫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何工作；零售商品的销售也被政府接管。

至于农民，列宁把没收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但要求他们不得僱用任何帮手，也不得出售任何农产品。所有产品都必须交给政府。此外，这些土地不得出售、租赁

或抵押。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

但是从一开始，俄国人民就对这种共产“新秩序”反应冷淡。由于缺乏激励，农场和工厂的产量萎缩成“涓涓细流”：工厂的产能，迅速下降到了战前的13%，农民的产出也锐减了一半；黑市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兴起；工人们经常从工厂偷窃货物，用来换取农民私下扣留的粮食；没过多久，农民藏匿的粮食，就超过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俄国经济的崩溃让共产领袖恼羞成怒。他们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恐怖手段迫使人民提高产量。这引发了反抗。

1918年夏天，一场激烈的内战爆发了。反共的俄国白军发誓要消灭红军，解放俄国人民。西方盟国虽然自身处境艰难，还是对反抗表达了支持，并提供物资、装备，甚至还派出了可调用的部队，帮助俄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暴政。

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于是，他决定从三个不同的战线同时反击。为了抵抗白军，他授权托洛茨基强行征兵，使红军最终规模达到了五百万人；为了镇压民众对共产党的反感和拒绝工作的

态度，他成立了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它可以调查、逮捕、判决和处决嫌疑人。根据官方数据，在内战期间，有数以万计的人倒在了契卡行刑队的枪口下；为防止出现新的君主政党，列宁还对尼古拉二世家族下了狠手。1918年7月16日，他在叶卡捷琳堡枪杀了尼古拉二世夫妇、他们的子女和所有随从，并且彻底毁尸灭迹。

六周后，白军的猛烈攻击差点要了列宁的命。共产党的新贵们在防卫脆弱的时候遭到了伏击，契卡首领被射杀，列宁也身负重伤。出于报复，契卡立即处决了五百人。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对俄国局势影响不大。内战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共产党加倍努力，要让俄国迈向共产主义。

列宁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这些苏维埃又向首都最高苏维埃派出代表。列宁通过这个由共产党主导的渠道推行他的政策。而支撑苏维埃的，则是红军的铁腕和契卡的恐怖。

然而，尽管采取了所有的胁迫手段，列宁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可能战败。虽然美、英、法和日本，依据国际联盟的“民族自决”政策撤出了军队和物资，让他暂时

鼓起了勇气，但白军的顽强抵抗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由于共产政权统治下的经济效率极低，俄国的粮仓——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农作物又全面歉收，导致了一场大饥荒。作家巴萨奇斯（Nikolaus Basaeches）描述道：“饥荒地区的景象，那些饥寒交迫、惨遭蹂躏的人们，令人难以忘怀。人吃人的现象很普遍。绝望的人们蹒跚而行，憔悴不堪，好像棕色的木乃伊……当这些饥民成群结队袭击一个毫无准备的村庄时，他们会屠杀每一个活人。”

成群的孤儿像饿狼一样，在城市和乡村游荡。据估计，1922 年有超过 3,300 万俄国人挨饿，其中五百万人饿死。美国民众对这场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深感震惊。他们纷纷为胡佛委员会捐款，救济了一千多万俄国饥民。

共产主义梦想破灭

就在这场饥荒发生之前，列宁已经被迫承认，他给俄国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共产革命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而是一场血腥的内战。2,800 万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列宁强加给人民的共产政策，也并没有像马克思承诺的那样实现增产，反而使产量下降到即便在正常时期，也无法让一半人获得温饱。

在这样的困境和事实面前，列宁不得不认输，决定退一步。为了保住政权，1921年，他宣布将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恢复了工资制度，货币流通马上取代了以物易物；他还允许开办私营企业，以取代政府的贸易中心。不到一年时间，四分之三的零售业务，又回到了私人手中；他甚至鼓励农民租更多土地和僱工，这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他还向农民承诺，他们可以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大部分粮食，以鼓励个人的积极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政府强行征收。

几个月后，共产经济导致的贫困已经有所改善，饥荒得以缓解。供求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个人主动创业，满足人们需求。城市街道和商店也不再萧条，逐渐恢复了相对繁荣的景象。

斯大林上台掌权

不过，列宁没能看到“新经济政策”的效果。他在1922年第一次中风，1924年1月20日去世。在1922年末，俄国已经和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组成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党继续掌权。

就在列宁觉得自己大限将至时，他对斯大林可能成为继任者深感不安。多年来，列宁一直利用斯大林执行最残酷的任务。他担心斯大林用同样手段接管共产党。

1923年12月25日，列宁躺在病床上，半身不遂而且没法说话。他向政治局（共产党最高领导委员会，也是苏联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写下了以下戏剧性的呼吁：

“斯大林过于粗野，这在我们共产党内尚可容忍，但担任总书记职位就完全不合适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办法别让斯大林上台，而是任命一个在各方面都和斯大林不同的人。也就是说，要让更有耐心、更忠诚、更礼貌、更关怀同志、不那么反复无常的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些看似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我认为，从防止分裂的角度来看，以及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来看……就不是小事，很可能是决定结果的大事。”

时间证明了列宁的预言。斯大林后来的一句话，揭示了他对生命的态度：“选好要杀的人，精心策划，毫不留情地复仇，然后安然入睡……世上没有比这更甜蜜的事了。”

到1927年，列宁担心的事情，已经被斯大林实现了。他在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彻底胜利——不

仅击败了托洛茨基，还铲除了所有强大的政敌，开始对苏联实施铁腕统治。现在，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满足野心——第二次推行共产主义。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年，苏共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消灭“新经济政策”时期商人和农民的独立和创造的繁荣。个人财产被再次普遍没收，秘密警察又开始大批处决反抗民众。斯大林决心立即把国家经济转到共产主义理论框架之内，并向世界证明其生产与分配能力，能超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在短短几周之内，“新经济政策”下的相对繁荣和富裕便荡然无存。配给制成为了唯一选择。人们不得不重新吃上令人憎恨的“饥饿面包”，那是革命的产物——用桦树皮做的。

五年计划的核心，是工农业的集体化。斯大林料到富农们（俄文音译为库拉克人）一定会反抗，因此他下令对富农阶层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一些富农毁掉财产，烧毁房屋，宰杀牲畜，逃往高加索山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途中被捕或死亡。官方报告说，在顿河流域的某地区，反抗的村庄被炮火夷为平地，有五万名村民被

杀死，无论男女老幼。剩下的两千人被迁往中亚。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被转为了集体农场。

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还包括摧毁宗教的共产主义行动。到 1930 年，共产党建立的激进无神论者联盟，活跃成员已达 250 万人；教堂和主教座堂变成了世俗建筑；禁止过圣诞节，买卖圣诞树属于刑事犯罪；星期日不再是礼拜日；工人必须轮流休假，以确保能够每周七天、日夜不停地生产。

斯大林还尝试按照恩格斯的建议拆散家庭。在他的铁腕统治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都付诸实践了。

到 1930 年，斯大林开始察觉，他可能已经把人民逼到了绝境。因此，他摆出了对受苦受难民众深切同情的样子，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政府官员——是他们热衷于超额完成任务，向人民，尤其是农民强加不合理的要求，就好像是他才得知人民的悲惨遭遇。然而，就在他公开为自己撇清罪责之后，仍然继续推行铁腕政策，使局势变得前所未有的恐怖。

苏共陷入严重危机

到 1932 年，苏共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人民饱受饥荒、大规模处决、消灭富农阶级、全面打压私营企业、流放

到西伯利亚，以及长期关押到劳改营等苦难。这些反人类罪行的规模，都可以和纳粹后来在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贝尔森（Belsen）集中营的暴行相提并论。

在斯大林的一部传记中，作家巴塞切斯（Nikolaus Basseches）说，1932年，共产领袖们已经很清楚，他们非推翻斯大林不可，否则将面临革命，甚至连军队都酝酿着造反。政治局在12月秘密开会，斯大林提出了一些方案，想进一步镇压人民。但这次，连那些受他提拔的官员也投票反对他。据说，斯大林对这次遭遇反对声浪感到震惊，以至于他向莫洛托夫透露，或许他应该承认失败并辞职。但莫洛托夫劝他再坚持一下，看看是否会有转机。

美国落入斯大林的圈套

莫洛托夫说的没错，国际局势的变化，还真的为斯大林解了围。首先是德国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33年1月上台。希特勒强烈的反共态度，让许多苏联人相信，苏联和德国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战争。对希特勒的警惕，让他们淡忘了对斯大林的怨恨；斯大林得到的第二个助力是，世界资本主义领袖美国，承认了他的共产政权。这是一个独特而又关键的转折。

过去 16 年间，美国一直拒绝承认苏联。在此期间，美国历届国务卿都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原因。例如 1923 年，国务卿休斯（Charles E. Hughes）就说：“美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是真挚的，因此我们强烈希望不做任何事（如承认苏联），来为苏共的暴政背书，阻碍苏联人民重获自由的进程。”

这近年来的类似声明，让斯大林心里很清楚，如果想让美国承认苏俄政权，就必须对共产主义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知道必须得接受哪些条件。因此，就在 1933 年，斯大林派他的老战友利特维诺夫前往华盛顿谈判，期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利特维诺夫在书面声明中承诺，从今以后，苏共不会干涉美国内政；不会宣传或煽动推翻美国政府；也不会允许在苏联境内成立想推翻美国政府的任何团体。

看到苏共官员的这些郑重承诺，似乎苏共要放弃共产国际（推动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和世界革命了。于是在 1933 年底，美国承认了苏联。从此，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从对抗变成了共存。

但是，过了不到 10 个月，美国官员就发现上当受骗了。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从莫斯科发来报告说，苏共官员仍然在频繁谈论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正筹备在苏联举行第七次会议。

这违反了斯大林的承诺。

于是，美国向利特维诺夫提出了强烈抗议。可他只是耸耸肩敷衍说，苏共对共产国际绝对没有任何义务。很明显，苏联的局势已发生变化。斯大林对自己的独裁统治又感到安全了。骗美国承认苏联的目的已然达成，斯大林的诺言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就在最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美国和其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到了谴责。他们公开鼓吹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事实上（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就在斯大林承诺不干涉美国内政的同时，苏共情报人员正在华盛顿，忙着在各政府部门精心构建间谍网。

有政治权威人士认为，美国本应在发现苏共公然违背承诺的那一刻，就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然而，这一幕并未上演。当时的外交战略家建议，对待苏共应有大人之风，不用计较他们的过错。他们还自圆其说地辩解说，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派驻大使就近监视。正是基于这一建议，美国的共存政策又降了一格。

苏共官员对违背诺言麻木不仁，美国的外交官却对其侮辱卑躬屈膝。这极大地提升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看到，苏联民众的不满迹象已经消失。他觉得可以再次强硬起来了。但是，共产党高层内部的仇恨依旧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为了党的利益，斯大林必须下台。于是，他们暗地里把除掉斯大林的最佳办法结合起来，决定先从斯大林的身边人下手，然后发动政变。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基洛夫（Sergei Kirov）。他是斯大林的亲信，已被政治局正式指定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到了暗杀。这一事件深深震撼了斯大林。他很清楚敌人在打什么主意，所以发起了凶狠强力的反击——公布了从各地挑选出的1,000多人名单，并立即枪决。

随后，斯大林指挥秘密警察在党内深挖，不放过一条线索，挖地三尺也要查出谋杀基洛夫的幕后元凶。其实这并不难。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党员也知道，有大人物参与了这场政变。为了自保，他们很快就招供了。斯大林下令逮捕所有嫌疑人和他们的亲友、同伙，以及有联络的人。

在斯大林著名的大清洗审判中，高级官员被公开示众，数以万计的官员被秘密处决。斯大林的昔日革命同

志们为了家人的安危，极力贬低自己，承认了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即便如此，也换不来斯大林的丝毫宽恕。

作家巴塞切斯说，那些被公开定罪者和他们的亲友，涵盖了“不只是党的前高层……还包括至少十几位在职政府官员；军队最高指挥官、参谋长、几乎所有军队指挥官、大量高级军官；警察首脑和高层警官；外交部副部长和外交部几乎所有外交人员；几乎所有苏联驻外大使和官员；还有高级法官和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官员。”



库拉帕蒂（Kurapaty）是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区的一片林区。

在大清洗期间，苏联秘密警察在这里处决了大批人。

(Barney.DC/Shutterstock)

就连当时的美国共产间谍钱伯斯，也质疑苏联发生的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他后来写道：“大清洗实质

上是一场血腥屠杀……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精心策划和实施的屠杀。死亡人数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从 1935 年至 1938 年，持续了大约 3 年。”

大清洗的最后是处决刽子手。自古以来，政治强人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利用精挑细选的追随者去谋杀，然后再把凶手除掉以掩盖罪行。

斯大林也是这么做的。他挑选了一个名叫叶绍夫（Yeshov）的有病态人格的家伙，来组建秘密警察机构执行大清洗，并把一些法官拉入这个阴谋之中。这些警察和法官都认为，自己得到了斯大林的宠爱和信任，并且忠实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直到他们被关进肮脏的牢房或站在行刑队前时，才恍然大悟——斯大林的所谓宠爱和信任，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苏联各地的几百名秘密警察头目、劳改营负责人和审判法官，最终都落得和受害者同样的下场。

心智失常的叶绍夫，不仅对斯大林的敌人施暴，就连他们的妻儿也不放过。即便如此，他也遭遇了灭顶之灾，被卷入最后的恐怖罗网，和他的手下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共产党尽享胜利果实

斯大林一旦摆脱了政治危机，就马上创建共产党特权制度，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此之前，共产党只承认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斯大林决定承认一个新阶级——共产党官僚阶层，并特许他们在封闭的配给中心购物。那里储备了大量普通工人无法得到的商品。斯大林还为他任命的官员提供了住房、奢侈品、特殊假期和子女的特殊教育机会。这是斯大林巩固权力，确保党员对他绝对忠诚的新策略。

在 1936 年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的新《宪法》中，斯大林还为官僚阶层提供了保障。《宪法》保护他们的职业财产，不能剥夺他们的工资、消费品、住房和存款，甚至还允许他们把这些财产传承。于是，官僚阶层得以积累大量财产，并且传给指定的受益人，无论亲疏，数额不限。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宣传一直在强烈谴责传承遗产。

斯大林态度的转变，还体现在他推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系列“改革”——支付储蓄利息，发行带利息的债券，把扩大工资差距合法化。例如，一位工人每月工资只有 100 卢布，而一位官员却可以月收入 6,000 卢布！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揭示了苏联共产党的真相——

昨日的“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权力。他们的政策简单易懂：共产党永久掌权，尽享胜利果实。

到了 1938 年，斯大林已经对自己的地位无比自信。他宣布，苏共政权在国内已经没有敌人，不再需要恐怖行动来镇压了。不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怖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至此，苏联正式宣称自己是世界强国。并将进入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新阶段——向全球毫不动摇地推广共产主义。

第六章

颠覆美国的共产运动

俄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历程，我们已经回顾到了1938年。为了深入理解其后的发展，我们必须先知道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脉络。

长久以来，征服美国一直是共产党战略的核心：“我们将首先征服东欧，然后是亚洲大陆。最后，我们将包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我们不需要攻击它，它会像熟透了的果实一样落入我们手中。”这清楚地揭示了共产党从内部颠覆美国的计划。

我们很难体会到，共产领袖看到他们美国计划的进展会如何得意忘形。以下问题的答案，将为您揭示原因：

拥抱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是否忽略了殖民先辈的郑重警告？为什么说殖民先辈是在“最佳条件”下实践共产主义，结果又如何？

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如何在美国迅速传播？第一波共产暴力行动的规模有多大？

在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的宣誓证词中，美国共产革命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钱伯斯能详细揭露美国共产党的内幕？1932年6月，钱伯斯被要求为共产党员身份付出什么代价？他的小女儿是如何影响他放弃共产主义的？

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的背景是什么？她是如何成为一名陌生男共产党员“妻子”的？

那些充当苏共间谍的美国共产党员，又是如何成功洗脱罪名的？

有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冒着坐牢蒙羞的风险，窃取美国机密或执行其它苏共命令。当苏共领袖审视他们的名单时，会有什么反应？

殖民先辈的共产主义尝试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段被人遗忘的教训——在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前，美国的殖民先辈们曾尝试过共产主义。

1620年，当一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时，他们已经决定建立共产主义殖民地。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似乎具备了最佳的建立条件。首先，他们与世隔绝，为了

生存不得不全力以赴；其次，他们是一群经过挑选、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有合作精神和手足情谊。于是，他们满怀希望地开启了共产社会。

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总督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精彩的记录。他写道：

“人们发现，这个社区……滋生了许多混乱和不满，阻碍了许多对他们有益和令人安逸的工作。那些体力最好、最适合劳作的年轻人抱怨说，他们耗费心力为别人的妻儿奔忙，却没有半点回报。体魄强健或能力出众的人，在分配食物和衣物时，没能比身体虚弱和只承担少量劳动的人更多，因此他们觉得不公平……那些男人的妻子们，被要求为其他男性服务，例如为他们洗衣做饭等。她们觉得这是一种奴役，而她们的丈夫对此也难以接受。”（请注意，即使有基督教的手足情谊，共产主义也只能在建立暴政的情况下实行。）

不过，如果共产主义真能高效生产，这些殖民者就会继续忍受下去。布拉德福德总督担心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产量如此之低，以至于殖民者都要挨饿了。他接着写道：

“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我让步了，同意每个人为自己种植玉米，自食其力……就这样，按照人

数比例，给每个家庭分配了一块土地。”

一旦每个家庭得到了土地和玉米，他们就必须负责种植、耕作和收获，否则就要自食其果。总督希望人们继续像朋友一样聚居在一起，但集体生产将由个人自由生产取而代之。一年后，总督写道：

“这一举措效果显著。因为人人都勤奋起来，种的玉米比原来多得多……现在，妇女们都愿意下地干活，她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种玉米。而在以前，她们都会以身体虚弱无力为由拒绝。如果强迫她们干活，就会被她们视为残暴的压迫。”

殖民先辈们发现了人类的一大秘密：一个人逼自己去做事，要比别人逼他去做事成就要大得多。布拉德福德总督在反思这段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经过几年的试验证实，这种共产制度，即便是用在虔诚自律的人身上，也足以表明柏拉图和其他古人的自负是何等荒谬……他们以为，剥夺个人财产，实行共有制，就能带来幸福和繁荣，仿佛他们比上帝更有智慧。”^[122]

很显然，布拉德福德总督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违背自然规律和上帝的律法。尽管如此，有

些人可能仍心有疑惑。他们曾听说，共产主义为实践基督教的教义提供了理想的途径。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为您探讨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这些殖民先辈们尝试共产主义之后，最终选择了放弃，转而采用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在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制度被描述为冷酷无情、自私自利。但经济学家指出，它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演变之后，迄今为止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最多的财富，并且比现代人尝试过的任何制度，都分配得更加公平。^[123] 资本主义一直在自我完善，以适应高科技社会的需求，至今仍在进行中。

美国共产党的建立

1917年11月，在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左翼人士对此特别感兴趣。多年来，他们一直想让联邦政府接管主要产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和平立法改革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了。

他们突然听说，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迅速掌权，并在一夜之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

们把它视为美国的发展蓝图，立即决定成立共产党，利用暴力革命，尽早建立美国共产政权。一位名叫里德（John Reed）的记者，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他当时刚从俄国回来，对世界共产革命充满了热情。

他们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应邀在 1919 年 3 月派代表前往俄国，帮助组建第三国际（仿效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以推动世界革命）。回国后，他们开始着手推动美国的共产运动。

里德利用《纽约共产党人》专栏，煽动工人暴动。美国共产党的队伍，因为昔日“世界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成员的加入而壮大。他们提议，使用自己在一战期间采用的破坏和暴力技巧。

俄国共产党派遣官方代表马丁斯（C. A. Martens）来帮助策划全面的行动方案，使美国共产党人更受鼓舞。他带来了大量资金，用于在美国工会和军队内部建立秘密组织。马丁斯向所有人保证，他从莫斯科来的使命，是解放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的工人。

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派代表前往俄国，以获准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作为俄共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后来，又去掉了“劳工”一词，称为“美

国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的官员签署了《入党二十一条》。1952年，在美共被要求登记为苏联代理人时，这些条件令他们尴尬万分。

以下是《入党二十一条》中的典型承诺：

“美国共产党必须实施明确的宣传计划，阻止向苏联的敌人运输战争物资。”

“美国共产党的行动计划，必须得到共产国际定期大会的批准。”

“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对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党派（包括美国共产党），都具有约束力。”

“传播共产主义理念是一项使命，特别要求在军队中开展积极和系统的宣传。即便有特殊法律禁止，也应秘密进行。”

“每一个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必须系统地、坚持不懈地在工会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正是诸如此类的承诺，促使美国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U.S.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在经过长时间的听证之后，在 1953 年发表了如下声明：

“根据全部记录，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被告（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成员，把对苏共的忠诚和义务，置于对美国的忠诚之上。”^[124]

共产暴力首袭美国

从1919年4月28日开始，在寄给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霍姆斯（Holmes）法官、银行家摩根（J. P. Morgan）、实业家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知名人士的邮件中，发现了36枚炸弹。其中1枚炸弹，被送到了哈德威克（Thomas W. Hardwick）参议员的家中。他一直努力阻止布尔什维克移民美国。他的一位女仆打开了包裹，炸弹炸飞了她的双手。

1920年9月16日，一辆马车载着一枚大型炸弹，来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纽约市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交界处，停在了摩根公司的三层石灰岩大楼对面。

突然，马车中一声巨响，蓝白色的火焰冲天而起。这枚炸弹破坏力极大，当场造成3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爆炸摧毁了摩根办公室内部，震碎了周围几条街区的窗户，一枚铁弹丸飞进了公平大厦三十四层的一扇窗户。

这些谋杀和暴力行为，在美国各地引起了对布尔什

维克的极度愤慨。有时被激怒的公民也会以暴制暴。司法部长逮捕了许多人，最后，一整船的外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领袖被驱逐出境。他们乘坐布福德号，途经芬兰返回俄国，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高德曼（Emma Goldman）。25年前，她的无政府主义演讲，曾诱使左尔戈斯（Leon Czolgosz）刺杀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此时她并不知道，在24个月后，自己会抛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到了1940年，她余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死在美国。

美共领袖福斯特

在美共领袖中，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最为大众熟知。他是美共创始人之一，被指派接管美国工会，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莫斯科。红色国际工会（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从苏联政府收到了一百万美元，用于在其它国家的工会中传播共产主义。

在一战停战后不久，福斯特的事业就进入了劳工战线。当时的工人们，已经因战争影响而处于躁动状态。福斯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几个重要行业发起了罢工，即使在和他无关的罢工中，他也常常被认为“功不可没”。许多人在无意之中，把他们支持劳工的同情心和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煤矿工人积极投票，支持煤炭行业国有化，人们认为是受到了福斯特的影响。而钢铁行业罢工，似乎也被贴上了类似的标签。作为罢工的煽动者，福斯特起到的作用十分明显。许多人觉得，煤矿和钢铁工人有不少正当罢工理由。对他们来说，福斯特和他的共产党同伙趁机混入工人运动似乎并不要紧。

但是，福斯特从未真正掩饰过他的终极目标——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把美国劳工（以及其他所有美国人）纳入类似苏联的共产极权统治之下。事实上，福斯特已经自视为未来的独裁者。他曾两次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还写过一本名为《走向苏维埃美国》的书，讲述共产党将如何接管美国。

当美国国会委员会让他宣誓回答有关共产党的问题时，他表现得非常坦率：

主席：“我国的共产党主张世界革命吗？”

福斯特：“是的。”

主席：“他们（共产党）主张在美国革命吗？”

福斯特：“我已明确说过，共产党倡导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主席：“那么，我国的共产党是否反对我们的共和

政体？”

福斯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如此。”

主席：“你们的主张，是用苏维埃政权取代我们的共和政体？”

福斯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主席：“那么，如果我理解的没错，我国的工人阶级把苏联当成自己的国家，对吗？”

福斯特：“更进步的工人确实是这么想的。”

主席：“他们把苏维埃旗帜视为自己的旗帜？”

福斯特：“无论是我国工人还是全球工人，他们唯一的旗帜就是红旗。”

主席：“如果必须在红旗和美国国旗之间选择，我想你会选择红旗，对吧？”

福斯特：“我已经给出了回答。”

主席说：“福斯特先生，如果这个问题让你尴尬，我不会强迫你回答。”

福斯特回应：“我一点也不尴尬。我说得很清楚：红旗是代表革命阶级的旗帜，而我们正是其中一员。”^[125]

从1921年到1924年，美国共产党人为了避免被捕，转为地下活动。当战时紧急法案被废除后，美共领袖们又逐渐浮出水面，继续开展颠覆美国政府的行动。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美国社会并没特别关注安全问题。那是一个追求时尚、轻浮和战后狂欢的年代。国家的繁荣景象令人陶醉，人们根本没心思担忧几个狂人想统治世界。渐渐地，共产党这个词开始变得遥不可及。人们甚至把过去扔炸弹、罢工、逮捕和驱逐的岁月，调侃为红色大恐慌时期。

然而，正是在对共产党毫无警惕的人群中，悄然孕育着颠覆美国的危机。美国正在一种不成熟的理智主义氛围中变得老于世故；丑闻的喧嚣和骷髅的嘎嘎声，撼动了立国的根基，一个大胆指责的时代已然来临。

当时，很少人意识到，美国正在走向经济和精神的崩溃，这将引发一场知识分子的反叛。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将得以进入美国各个阶层，包括美国政府的高级职位。

这就引出了钱伯斯的故事。他在此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作为苏共间谍头目，他的阴谋活动达到了最高级别。正因为如此，他揭露的信息，足以让我们看到一幅在1925至1938年间，共产党在美国发展的全景。

钱伯斯亲历的美国共产运动

我们在了解钱伯斯投身共产主义的经历之后，就会发现一种演变模式。这是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相当多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走过的路。

钱伯斯在离纽约郊区不远的长岛长大。父亲是一位报纸插图画家，对家庭漠不关心；母亲曾是一名演员，过于慈爱而又专横；还有精神失常的祖母和一个他不太喜欢的弟弟。

钱伯斯和他的弟弟，在战后的动荡时期长大成人。和那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是缺失的。钱伯斯的弟弟在大学毕业后变得愤世嫉俗和绝望，沦为了酒鬼，最后自杀身亡。一家人似乎都陷入了毫无希望的混乱生活状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钱伯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当我（一战后不久）进入大学时，我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是保守的，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宗教体验。当我离开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我不再是一个保守派，也没有宗教信仰。我曾在学校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个无神论小剧本。同年，我前往欧洲，亲眼见证了德国在战败后的狂躁不安。后来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是自费。1925 年，我自愿退学，决心加入共产党。因为我认为，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走向末路，只有动手术才能拯救人类的残局，而共产党正是历史的外科医生。”^[126]

就这样，钱伯斯全心投入了共产党的事业。他成为《纺织工人》杂志的编辑；为《每日工人报》撰稿；娶了一位共产党员“妻子”；还学会了工会暴力罢工的战术。他写道，在那段时期，“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在某些罢工中，雇用歹徒对付皮草老板。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带着罢工队伍闯入店铺，在顷刻之间，就用锋利的皮草刀，把价值几千美元的貂皮切成了碎片。”^[127]

他打算把共产党纲领作为自己的永久生活模式。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共产党员“妻子”就离他而去了。钱伯斯觉得，在下次（1931年）结婚时，还是到市政厅办理正式的“资产阶级婚姻”更合自己的心意。

在此阶段，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有其它的领悟能力。这些能力将最终引领他摆脱共产主义，并且成为了《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年薪高达3万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几十万美元）！

1928年，钱伯斯目睹了美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大清洗。多年来，美共一直由“美国列宁”鲁森伯格（Charles E. Ruthenberg）控制。鲁森伯格猝死后，党内出现了疯狂的权力争夺。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最终夺权。

福斯特则代表了一个小而喧闹的派系。但很快，洛夫斯通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站在了斯大林最强大的国内对手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一边。布哈林的政治主张，没有斯大林那么暴力。

洛夫斯通和福斯特被召往莫斯科。当两人回来时，洛夫斯通已经崩溃了。他被斯大林认定为叛徒，并被开除出党。斯大林指定福斯特为接班人。下一步，就是迫使所有美共党员支持福斯特的激进计划，否则就会被开除党籍。

大多数美共党员收到莫斯科的新信号之后，立即转向，宣誓效忠福斯特。但钱伯斯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斯大林强迫美共党员追随他们投票反对的领袖，就像一位法西斯独裁者。他因此停止了党内活动。

此后的两年时间，钱伯斯选择留在党外。但他并没有被开除，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也没改变，只是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然而，大萧条改变了整个局势。钱伯斯对失业者的同情再次把他引向了美国共产党。他从各种迹象来看，预言已久的美国资本主义崩溃似乎已经到来了。

在当时的氛围影响下，钱伯斯创作了短篇小说《你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吗？》（Can You Make Out Their Voices?），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篇作品被改编成

戏剧，还以小册子形式发行，被莫斯科称赞为“卓越的革命文学”。不久，钱伯斯又成为了美共的宠儿，就仿佛他从没离开过一样。

1932年6月，美共要求钱伯斯为党员身份付出全部代价——提名他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为了妻子，钱伯斯想逃避这个差事。但一名纽约中央委员会成员告诉他：“你别无选择。”

钱伯斯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苏共间谍网的铁腕纪律之下。由于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信仰，钱伯斯盲目服从指令，成为了阴谋活动的高手。他精通秘密会议、撰写机密文件、甩开追踪者，不信任任何人，随时待命，以响应上级的召唤。

不久之后，钱伯斯被指派为苏共在华盛顿最重要间谍小组的主要联络人。钱伯斯曾说，和他交往的几位间谍，后来都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高官：

1. 希斯（Alger Hiss）。钱伯斯说，他和希斯私交很好。希斯最初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加入了参议院调查军火业的特别委员会。他还在司法部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国务院。在那里，他步步高升，很快就担任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他曾在雅尔塔担任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并担任创建联合国的国际大会秘书长。

2. 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也是摩根索计划的撰稿人。

3. 阿伯特（John J. Abt），曾在农业部、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任职，最后成为总检察长特别助理，负责审判部门。

4. 柯林斯（Henry H. Collins），曾在国家工业复兴署（NRA）、农业部、劳工部和国务院任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晋升为陆军少校，1948 年成为美国苏联研究所的执行董事。这个机构，被司法部长称为共产党的前线组织。

5. 克拉默（Charles Kramer），曾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和价格管理办公室任职。1943 年，加入了参议院战时动员小组委员会。

6. 威特（Nathan Witt），曾在农业部任职，后担任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秘书。

7. 瓦尔（Harold Ware），曾任职农业部。

8. 佩罗（Victor Perlo），曾任职价格管理办公室、战争生产委员会和财政部。

9. 瓦德利（Henry Julian Wadleigh），曾是财政部的重要官员。

钱伯斯在作证时说，他通过这些内线，拿到了大量政府机密文件，需要两到三名摄影师的不懈努力，才能拍摄成缩微胶卷，再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希斯是他的头号情报来源，每天晚上都会带一个公文包回家，里面装满了国务院材料。其中一些档案，会制成缩微胶卷。其它的则由希斯打印或手写摘要。这些文件后来经过认证笔迹，成为著名的“南瓜档案”，希斯因此被判犯有伪证罪。

在钱伯斯的晚年，有人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上当受骗，从事颠覆祖国的活动时，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一旦信仰了共产主义，就会认为从事间谍活动是道德之举，是为人类的未来福祉而承担的责任。

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美国人参与苏共指挥间谍活动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直到进入 1950 年代才逐渐广为人知。目前已经出版的多本书籍，完整的总结了从联邦调查局、法院和国会发掘的相关证据。

钱伯斯的顿悟和叛逃

1938 年，钱伯斯作为苏共信使和联络员，正值“事业”的巅峰。可是他却发现，自己的“唯物”理念突然

崩溃了。

一天早上，钱伯斯在给小女儿喂奶时，突然领悟到，人体和人格的精密和复杂性，远非偶然的累积所能解释的。那一瞬间，正是钱伯斯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的开端。

起初，他心烦意乱，想把这个新的念头抛诸脑后。但随着他开放自己的思维，去观察周围的证据时，他终于坚信，他生活在一个由最高智慧创造和守护的宇宙中，这个宇宙设计得精妙绝伦，令人惊叹。因此，就像当初共产哲学吸引他入党一样，信仰的崩塌也让他决心脱离共产党。几个月后，他终于挣脱束缚，逃出了苏共间谍网。

钱伯斯说，当他下决心之后，想尽办法劝好友希斯和他一起离开。可是，希斯不仅拒绝，还对他想影响自己大发雷霆。

通过观察他人的命运，钱伯斯已经预见到，脱离共产间谍网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他所经历的身心折磨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迄今为止，要想寻找讲述前共产党员苦难往事的最佳著作，非钱伯斯自传《证人》莫属。有一段时间，他因担心苏共特工暗杀，在工作时身边总放着一把枪。还有一次，他甚至想到自杀，以免揭露那些昔日好友的秘密。



1948 年的钱伯斯。（公有领域）

钱伯斯的真情实感，我们只有在完整读过原著之后，才可能充分理解。对我们来说，只需知道最重要的一点——直到钱伯斯决心全盘吐露真情之前，对于苏共已在美国各阶层建立了庞大间谍网，美国民众几乎一无所知。尽管联邦调查局多年来一直悉心收集有关情报，并向政府官员发出警告，但这种不幸的状况依然存在。

本特利接替钱伯斯

钱伯斯并不知道，在他脱离苏共间谍系统之后，会有一位女士来填补他的空缺。她就是本特利。

本特利的祖先是美国新英格兰人，她曾就读于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然后又到意大利游学了一年。

在本特利 1934 年回到美国时，发现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决定学习商业课程。于是，她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在那里，许多人都对她表示友善和同情。过了很久，她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共产党员。当他们向她解释共产主义时，她觉得似乎很有道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共产主义比美国资本主义要好得多（当时美国正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困境）。就这样，本特利加入了共产党。她以一个二十多岁女孩的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她相信，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本特利曾在纽约福利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同时，她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共产小组的财务秘书。她还参加了共产工人学校，并用不同的假名加入了许多掩护组织，以至于有一次她去参加会议，却忘记了自己该用哪个假名！

不久，本特利就吸引了苏共间谍机构领导人的关注。就在不知不觉中，她被小心翼翼地转到了苏共的间谍网。

接下来，本特利先后为三个人工作。最后被分配给一位名叫“提米”（Timmy）的资深共产党员。结果，她爱上了提米。

有一天，提米对她说：“我们没有权利拥有这份感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依靠，对外界守口如瓶。你必须完全信任我，不要过问我的身份、住处或职业。”

就这样，本特利成了共产党员的妻子。后来才知道，他叫戈洛斯（Jacob Golos），是苏共秘密警察在美国的最高头目。在他的训练下，本特利成为了她后来所说的“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

1940年5月，本特利得知，在墨西哥发生了针对托洛茨基的暗杀未遂事件，他的贴身保镖中枪身亡。多年来，斯大林一直试图消灭他的老对手。本特利从戈洛斯的蛛丝马迹判断，她的共产党伴侣参与了这场阴谋。几个月后，一名刺客成功接近托洛茨基，用登山杖打碎了他的脑袋。

从1941年起，本特利就被苏共间谍机构指派，从华盛顿的联络人那里收集情报。她透露，自己最初是西尔弗马斯特（Gregory Silvermaster）间谍小组的联络员，他们从五角大楼和其它高度机密部门的内线获取情报。在她的间谍生涯结束前，她已经接手了钱伯斯以前的所有联系人，而且还有更多。

有时也会险些酿成大祸，例如西尔弗马斯特在库里（Lauchlin Currie，白宫行政助理）的帮助下，进入经济战争委员会工作不久后的遭遇。她透露，有人给西

尔弗马斯特看了一封陆军情报局长写给他上司的信。信中说，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掌握了他和共产党有联系的证据，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惊慌失措的西尔弗马斯特问本特利该怎么办。她给出的建议和给其他暴露的共产党员一样：“镇定自若，装出一副无辜受伤的样子：你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直为劳工权益而奋斗的‘进步人士’，团结你周围所有的‘自由派’朋友……如果有必要，以你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为由，聘请律师打官司。与此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事不了了之，可以利用库里、怀特（时任财政部高官）以及其他任何你认识和信任的人。”^[128]

共产党嫌犯在面对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时，为自己辩护都用这套共产党的老伎俩。熟悉的人会立即识破它。这套伎俩既天真又简单，却能够多年来迷惑和欺骗如此多的人，实在让美国蒙羞。但事实的确如此——和其它案例一样，本特利的建议，为西尔弗马斯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很快就获得了许多强大而且出人意料的支持。

经过3个月的反击，陆军副部长在听取各种说辞之后，认定对西尔弗马斯特不公，下令取消对他解职的要求。他被允许辞职，然后带着清白的记录，重回农业部担任原职。本特利最后说道：“在苏共秘密警察机构如释重负之后，我们又一切如常了。”

根据本特利的宣誓证词，她曾和三大间谍小组合作。第一个，就是钱伯斯此前联络的“韦尔小组”（Ware Cell）。其次是她负责的“西尔弗马斯特小组”和“佩罗小组”（Perlo Cell）。

她说，这三个间谍小组的任务，都是不断地向她提供情报，再传送到莫斯科。她披露了后两个间谍小组的所有成员和当时的职位：

西尔弗马斯特小组：

1. 西尔弗马斯特，曾任农业安全管理局劳工处长，曾短期被派往经济战争委员会工作。
2. 阿德勒（Solomam Adler），曾任财政部驻华代表。
3. 伯斯勒（Norman Bursler），曾任司法部特别助理。
4. 科伊（Frank Coe），曾任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主管助理、美国驻伦敦大使特别助理、经济战争委员会执行主任助理、对外经济管理局助理局长。
5. 戈尔德（William Gold，又名 Bela Gold），曾任农业部农业经济局计划调查处助理处长、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管理局经济计划办公

室主任。

6. 戈尔德太太 (Sonia Gold)，曾担任众议院州际移民特设委员会研究助理、就业安全局劳动力市场分析师；还曾任职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

7. 西尔弗曼 (Abraham George Silverman)，曾任美国铁路退休委员会研究暨信息服务局局长；还曾任职空军物资和服务处经济顾问兼分析和计划主管。

8. 泰勒 (William Taylor)，曾任职财政部。

9. 乌尔曼 (William Ludwig Ullmann)，曾任职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空军物资和服务处。

佩罗小组：

1. 佩罗 (Victor Perlo)，曾担任价格管理办公室研究科长；在战时生产委员会工作，处理制造军用飞机的问题；他也和西尔弗马斯特小组有关。^[129]

2. 菲茨杰拉德 (Edward J. Fitzgerald)，曾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

3. 格拉瑟 (Harold Glasser)，曾在财政部工作，后被借调到厄瓜多尔政府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在北非阿尔及尔担任北非事务委员会顾问。

4. 克莱默（Charles Kramer），曾任职于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价格管理办公室、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经济学家。他也和韦尔小组有关。

5. 莱辛斯基（Solomon Leshinsky），曾任职美国善后救济署。

6. 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曾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统计处、研究和统计局、工具部门、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国内外商业局。

7. 罗森伯格（Allan Rosenberg），曾任职对外经济管理局。

8. 惠勒（Donald Niven Wheeler），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

此外，本特利还提到以下人士，尽管他们并不属于任何间谍小组，但是他们协助间谍从政府档案中窃取了情报：

1. 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urg），曾任职战争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管理局，是中国问题专家。

2. 葛列格（Joseph Gregg），曾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研究部助理。

3. 哈尔佩林（Maurice Halperin），曾担任战略

情报办公室研究分析处拉丁美洲分部主管；国务院拉丁美洲研究分析主管。

4. 约瑟夫 (J. Julius Joseph) ，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日本处。

5. 李 (Duncan Chaplin Lee) ，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担任负责人多诺万 (William J. Donovan) 将军的法律顾问。

6. 米勒 (Robert T. Miller) ，曾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政治研究主管；国务院近东事务信息服务委员会成员；国务院研究和出版司助理司长。

7. 帕克 (William Z. Park) ，曾任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

8. 雷德蒙特 (Bernard Redmont) ，曾任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

9. 坦尼 (Helen Tenney) ，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西班牙语处。

本特利提供的这些名单，揭示了在她担任苏共间谍和联络人期间，苏共间谍组织如何在华盛顿窃取了大量的破坏性情报。

直到1944年，本特利一直在为苏共忠诚效力。然而，

在1943年感恩节前夕，戈洛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给她带来了巨大打击。在去世之前，戈洛斯向她揭露，他的苏共上司如何冷酷无情，强迫他去做一些就连他这种“久经考验”、良心麻木的人都感到恶心的事。

戈洛斯死后，本特利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了。当她得知美国共产领袖布劳德（Earl Browder）同意把一群在华盛顿的美国共产党员，交给一帮最肆无忌惮的苏共间谍时，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布劳德告诉她：“别天真了。你知道在关键时刻，我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我希望能在这件事上绕开他们，但没有成功。”

“但葛列格是你的老朋友。”本特利提到小组的一名成员。

“那又怎样？”布劳德回答道。“他是可以牺牲掉的。”

不久之后，本特利见到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苏共高官，让她很惊讶。这位官员说，苏共授予了她最高荣誉——红星勋章。但她不仅没被这份荣誉打动，反而对这位高官的为人很反感。从那时起，她就知道苏共领袖绝对没有能力建设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不管她给他们传递了多少情报。

本特利的共产主义理想遭到最后重击，是由于苏联

人试图强迫她出卖一位女友。这位女友因为高官提供不道德娱乐而被通缉。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本特利质问自己：“我们这些当初雄心勃勃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人，现在都怎么了？”她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内心深处的真相：“我们已经腐化堕落，被一台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机器摧毁了。”

几周后，本特利踏进了联邦调查局的大门，决心尽其所能向她的祖国赎罪。

从不同角度来看，这既是胜利也是悲剧。对她个人而言是胜利，这是她正视自己的良心和国家的机会。但在 1948 年，她在国会委员会上宣誓作证时，这一切差点变成了悲剧。

许多共产党媒体和所谓的“自由派”团体纷纷指控她，把她说成道德败坏者，精神变态的骗子，精神错乱的受害者等等，不一而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许多证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场喧嚣才终于平息。

本特利和钱伯斯都曾作证说，他们代表了美国一个人数虽少但极其危险的群体。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因为思想误入歧途而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先是信仰共产主义；然后渴望采取行动；接着是直面共产党实际运作的残酷现

实；最终觉醒，决心抛弃共产主义幻想，并在外面与之对抗。

幸运的是，美国那些昔日曾为共产事业奋斗的党员们，在觉醒回归之后，通常比当初离开时更加忠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仍然有少数人拒绝睁开眼睛、打开耳朵，了解已经揭露出来的真相。这群没有回归的人，仍在夜以继日地为“共产事业”而“献身”。

第七章 斯大林 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在美国的共产间谍网日趋完善之时，世界各地也在建立类似的颠覆网络。很快，斯大林就发现，西方强国的机密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手中。他就像一位职业赌徒，坐在牌桌前，摸清了其他玩家手中的底牌，然后仔细谋划着自己的战略。

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正是在这种极有利条件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叛逃的苏共情报官员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苏共领袖煽动和利用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将在本章了解：

1933 年，斯大林为什么想和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

斯大林为什么要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为什么让全球共产党人大吃一惊？

当希特勒撕毁条约并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是否猝

不及防？

在纳粹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月，美国态度如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这种态度？

1942年，一位美国总统顾问说：“后世子孙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从这句话中，您会得出什么结论？盟军领袖是否真正了解共产党的战略？

共产领袖是如何利用《租借法案》窃取原子弹秘密的？

美国和共产政权共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哪四个阶段？是基于什么假设，使得苏联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合作伙伴”？

您如何解释，《联合国宪章》采用的是1936年《苏联宪法》的格式？希斯成为《宪章》起草会议的秘书长，这背后有什么深意？

当二战结束之后，共产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时，他们的领袖持什么态度？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有人说，共产党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的重

要推手。在 1918 年德国一战失败投降之后，共产党就想接管德国。为应对这个威胁，反共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它们组成了一个紧急联盟，成功阻止了共产党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加入了强烈反共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1921 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党领袖。

希特勒组织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冲锋队，来报复日益激增的共产党暴力。他训练冲锋队街头格斗和暴动，并且用暴力攻击压制政敌。到 1923 年，冲锋队的人数已达到一万人。希特勒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够强大，想夺取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控制权。但这次暴动以失败告终，他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希特勒开始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全面战争的渴望。他不仅极力反共，还主张彻底违反《凡尔赛条约》，为恢复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而战。

他还计划建立一个北欧大帝国，囊括欧洲所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我的奋斗》不仅对德国的邻国们构成了威胁，也包括了苏联。因为希特勒宣布，德国的征服之路，最终将进入乌克兰肥沃的土地和俄罗斯富饶的油田。

后来，斯大林眼看着希特勒用强硬手腕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发现这位纳粹独裁者是一位和自己相似的强大对手——精明、冷酷，做事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用暴力清洗异己；使用宣传欺骗手段；为了自己掌权，即便牺牲几百万人生命也在所不惜。唯物论在德国和苏联，结出了相似的果实——尽管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名号不同，但手段和目标都差不多。

这或许可以解释，就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为什么斯大林要和希特勒秘密谈判达成私人协议。斯大林的间谍头目克里维茨基（W.G. Krivitsky）将军提供了这段历史细节。^[130]当斯大林的友好姿态被希特勒拒绝时，斯大林知道，他只能把这位德国元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敌人来对待了。

于是，斯大林急忙争取民主国家的同情。他要把苏共的政策和这些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挂上钩，他称之为“人民阵线”。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他指示忠诚的各国共产党人，要和任何反对希特勒及其盟友的政治团体结盟。这也包括共产党以前攻击过的右翼政党。

从结果来看，人民阵线是共产战略家们最成功的策略，让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保守、最受尊敬的政治团体公开往来。

斯大林引发了二战

1938 年，希特勒决定占领奥地利全境，来试探西方盟国的反应。斯大林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希特勒发现，入侵并没有带来严重后果。于是，他准备进一步吞并边境附近地区。他在慕尼黑威胁说，除非英法两国让他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区，否则他将对欧洲发动闪电战。在英法默许之后，他迅速占领了这个勇敢小国的几乎全部领土。

1939 年，希特勒又夺取了立陶宛的梅梅兰（Memelland）地区，接着准备进军波兰。不过，他此时犹豫了，因为苏联也想要波兰。事实上，苏联掌握着欧洲的均势平衡，除非希特勒确定苏联不会干涉，否则，他不敢冒然引发西方的全面战争。

因此，希特勒主动向斯大林提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让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竟然接受了！这意味着希特勒可以发动战争，而苏联保证不会干涉。

这让各国共产党人完全措手不及。因为多年来，共产党的宣传一直把斯大林描绘成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领军人物。

在美国，共产党媒体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他们的宣传方向转过来。钱伯斯说，美国共产党人无法理解，

斯大林为什么会向他的头号敌人屈服？直到钱伯斯和斯大林的间谍头目克里维茨基将军交谈时，才听到了官方的解释。

克里维茨基说，这个条约显示了斯大林的战略家天赋。斯大林知道这个条约会让希特勒在欧洲发起进攻。但他也知道，随着战争的发展，西方国家很可能会打得精疲力竭。到那时，苏联军队几乎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接管整个欧洲！

正如斯大林所料，希特勒迅速借助了斯大林的推力。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签署了条约。短短9天之后，9月1日，德国装甲部队就冲破了波兰英勇骑兵的防线，成千上万吨炸弹落在了波兰城市里。

英国和法国由于对波兰的承诺，而被迅速卷入了战争。这些国家无论是军备还是心理，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到一年，波兰就被德国和苏联瓜分，法国也被占领。不久之后，英国军队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撤出了欧洲大陆。接下来，纳粹军队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

斯大林认为，战争现在将转为英德两国的消耗战。因此他开始精心谋划下一步行动。此时，只有两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参战，那就是日本和美国。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促使日本军阀在太平洋发动攻势。他采用的手段，还是推动希特勒在欧洲肆意妄为的那一招——缔结条约。

当时，苏联是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的最大后患，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日本军阀立即准备发起进攻。

希特勒给斯大林的“惊喜”

斯大林现在打算静观其变，期待着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火中煎熬。他向苏军将领保证，最后加入战局的国家，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当然，这个国家一定是苏联。

然而，斯大林并不知道，希特勒一直在策划给共产苏联一个灾难性的“惊喜”。事实上，就在斯大林推动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时，希特勒正在秘密指示参谋部：“德军必须做好准备，用一场闪电战击垮苏联。”

1941年6月22日，这个巨大的意外灾难降临苏联。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121个师和3,000架飞机，沿着2,000英里战线，对苏联发起了攻击。早在多年前，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中预告了这一切。

这场突如其来的闪电战改写了世界历史。它打碎了

斯大林坐山观虎斗、静待从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这意味着苏联将在准备最不足的情况下仓皇迎战。

美国被迫卷入二战

在美国许多观察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突变，似乎对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利。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使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侵略国陷入了殊死搏斗。甚至连美国军方将领也认为，这可能会缓解未来世界的紧张局势。

但是，在短短 6 个月内，德军就占领了苏联 58 万平方英里的肥沃土地——这本是超过三分之一苏联人的家园。尽管苏联采取了“焦土政策”，但德军还是成功地从人民和土地中，榨取了他们所需的补给，使他们能够迅速向前推进，不必等待补给线的建立。很快，德国装甲部队就逼近到距莫斯科仅 60 英里。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宣布：“苏联已经崩溃，不会东山再起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世界各国震惊不已。因为纳粹帝国的版图，有可能从英国，一直延伸到美国阿拉斯加。美国人本能地开始为苏联加油鼓劲。这不仅是为了自身的重大利益，也是因为美国人有支持弱者的传统。

然而，就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这个命运多舛的星

期日清晨，日军对珍珠港的毁灭性袭击突如其来。美国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面对绝境，美国领袖急切地向四面八方寻求盟友。不要忘记，希特勒纳粹军队的铁蹄已经导致全世界人心惶惶。是纳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正在扑灭世界的文明之光。

所以，既然苏联已经赢得美国的同情，它在一夜之间变成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此时似乎已经不记得，正是由于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才使得希特勒在欧洲肆意妄为；又是它和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才促使日本军阀在太平洋地区横行霸道。

美国的共存政策进入第三阶段

到了1942年初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明显处于低谷，而轴心国又几乎摧毁了美国的所有传统盟友。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肯南（George F. Kennan）分析说，可能正是处于这种绝境，当时的美国外交战略家在和苏共打交道时，才会孤注一掷。

1933年，外交战略家们制定了对共产国家的“共存”政策；后来又决定自贬身价，忍受共产领袖的侮辱和背

信弃义；现在，他们决心更进一步，期望用无与伦比的慷慨，把共产领袖改变为美国式思维，消除他们对美国的任何疑虑，共同合作，赢得战争，维护战后的和平。他们认为，共产领袖将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相互理解，永久结盟，携手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大同世界”。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那真是外交天才的杰作。不幸的是，结果却正如许多军事家和情报机构主管所料：苏共利用它最想摧毁国家的财富和声望，一跃而成为了世界共产强权。

无论如何，这个计划还是启动了。我们唯有从这一视角，才能理解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对苏共的立场。

1942年6月初，苏共高官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秘密访问华盛顿，并且住进了白宫。他离开后，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向美国人民宣布新政策。

当年6月22日，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周年。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一场声援苏联的集会。一位政府高官宣布：“第二条战线？是的，如果有必要，还有第三条和第四条。我们决心在这场冲突中，和你们分享我们拥有的一切，并期待和你们共享胜利与和平之果。”随后，他又说了句可悲而又盲目乐观的话：“后世子孙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人民的不

屈不挠。”^[131]

斯大林对美国的慷慨毫不领情

美国的慷慨政策很快就显出成效。几十亿美元的对苏联《租借法案》获得了批准。在美国各军种收到的一些命令中，甚至可以看出，美国在故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43年1月1日，空军服务指挥部就收到这样一条令人震惊的命令：“苏联飞机的改装、装备和调度要放在首位，甚至优先于美国军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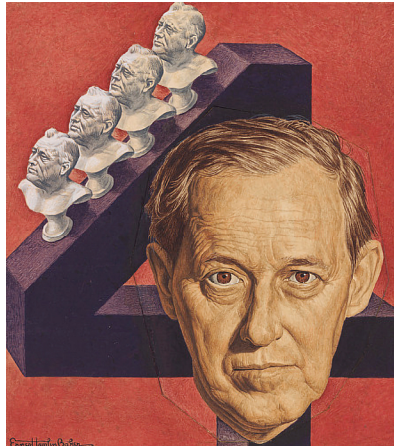
不过，美国国会对支持苏联的态度，并不像外交战略家那样热切。他们对《租借法案》做了严格限制：只能用于打击轴心国敌人的军事物资，明确禁止运送可能民用或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不是对苏联人民冷漠，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信念——美国的资源不能帮助共产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有朝一日苏联人民能重获自由，那才是提供帮助的恰当时机。在那之前，任何非军事援助都会加强共产党战后的极权统治。

尽管有这些法律限制，但主导实施《租借法案》的，并不是国会或军队将领，而是不受约束而又慷慨的外交官们。

例如，迪恩（John R. Deane）将军当时在莫斯科

担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他拒绝了苏共的请求，没给他们提供 25 台 200 马力的大型柴油船用发动机。因为此前给他们的发动机，已经在露天仓库中生锈了。很显然，他们只想在战后使用。而且，南太平洋的麦克阿瑟将军也急需这些发动机。

在听说迪恩将军的决定后，苏共向《租借法案》负责人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提出上诉，结果霍普金斯推翻了迪恩将军的决定。在随后的两年中，共有 1,305 台这种发动机被运往苏联，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三千多万美元的代价。



1945 年 1 月 22 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霍普金斯。此时罗斯福总统已开始第 4 个任期。霍普金斯担任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兼顾问、《租借法案》负责人。（公有领域）

在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后，海军官员获得了铜线订单

的最高优先权，准备用来修理战舰，却发现苏联人拥有更高的优先权。这些铜线显然是用于战后重建苏联城市的。由于给苏联人的铜线数量巨大，不得不先存放在纽约威斯特切斯特县（West chester County）一块占地 20 英亩的土地上。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些铜线才被运往苏联，用于修复他们的通信系统。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民才逐渐了解运往苏联的物资和财富的详细情况。已经公布的清单来自苏共官方记录，提供者是美国军官乔丹（George Racey Jordan）少校。他在蒙大拿州大瀑布空军基地工作，负责《租借法案》对苏联的物资供应。

根据苏联记录和对这些清单的分析，共产苏联共收到了价值超过 110 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尽管有法律限制，清单中还是包括了价值 30.4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明显没有获得《租借法案》的授权。

这些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商品包括：大量非军用化学品，大量的香烟、留声机唱片、化妆盒、乐谱、钢琴、古董家具、价值近 40 万美元的“小商品与廉价新奇玩意”、妇女首饰、家居用品、钓具、口红、香水、洋娃娃、银行保险柜、游乐场设备，以及许多其它非军用商品。

研究苏联二战史的学者指出，美国《租借法案》正

是在苏共岌岌可危时为它输了血。由于为延缓纳粹的进攻而实施的焦土策略，苏联损失了大部分农作物。即便有《租借法案》援助的粮食，苏军的军粮也只能勉强糊口。因此，如果没有《租借法案》的援助，苏联的抵抗很可能早就崩溃了。

此外，德国的占领切断了苏联人和许多主要工业中心的联系。被誉为“民主兵工厂”的美国，除了援助战机、弹药、化学品、工具、重型机械等之外，还为苏联提供了近 48 万辆汽车。这几乎占苏联前线车辆的一半。

关于共产党人的心理，有一个有趣的评价：美国人民给了共产苏联价值 110 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但是，美国却从未收到他们的官方感谢。斯大林的借口是，他的政府认为，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终止《租借法案》是错误的。他明确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人民觉得表达感激之情既不恰当，也不合理。

苏共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

在整个二战期间，苏共间谍紧盯着战争中的最重大突破——驾驭原子能。为了获得有关情报，他们双管齐下：一是通过间谍窃密，二是通过外交渠道。有一段时间，外交渠道颇有成效，不仅有原子能机密，还有所有军事

和工业信息。

乔丹少校首先在大瀑布空军基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苏联人离开美国时，都会随身携带大量廉价的黑色手提箱。他们以手提箱属于“外交行李”、可豁免检查的规定为由，拒绝乔丹查看。

一天晚上，驻基地的苏军指挥官近乎强迫乔丹前往大瀑布赴宴。他怀疑其中有诈，但还是接受了。大约午夜时分，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一架飞机刚刚着陆，苏联人将不等乔丹核发通关证，就要飞回苏联。

乔丹急忙赶回机场。果然，那架飞机上有 50 个黑色手提箱，由苏联武装警卫保护。乔丹命令一名士兵看住这些警卫。如果他们强行干扰他检查，就开枪射杀。

乔丹后来在国会委员会宣誓作证时说，他发现每个手提箱里都有一份关于美国工业、港口、军队、铁路、通信等方面的资料。

他在一个手提箱里发现了一封使用白宫信笺的信，署名是霍普金斯，收信人是苏共高层的三号人物。信中附有一张绝密的曼哈顿（原子能）项目地图，以及原子能实验的描述性资料！手提箱里还有一个文件夹上写着“希斯寄”。当时乔丹并不知道希斯是谁。文件夹里还有许多军事文件。另一个文件夹里是国务院的文件，其

中一些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来信，内容是对苏联局势的机密评估，以及对苏共官员的详细分析报告。现在，这些文件竟然要被秘密运回苏联。

当乔丹少校向华盛顿报告这起重大事件时，他却因耽搁飞机起飞受到了严厉批评！

1943年4月，苏共联络官告诉乔丹，有一批非常特殊的实验化学品将要运送。这位苏共官员给华盛顿的霍普金斯打了电话，然后把电话转给了乔丹。乔丹少校在作证时说，霍普金斯告诉他：“我不希望你和任何人讨论这件事，也不能记录在案。不要大张旗鼓，只需悄悄地尽快放行就好。”苏共官员后来对乔丹说，这批货物是“炸药”，而乔丹在这位官员的文件夹中看到了一条记录，上面写着“铀”。

从1943年6月10日起，这些货物分批抵达。据说，至少有1,465磅铀盐被运往苏联。专家推算，这些铀盐可提炼出6.25磅的可裂变U-235，比制造原子弹所需的量多出了两磅。

在1945年7月24日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向丘吉尔和斯大林宣布，美国终于研制出了一种高度机密的原子弹，这种原子弹，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力。美国国务卿拜恩斯（James F. Byrnes）注意到，斯大

林似乎对这一消息既不惊讶，也不感兴趣。

1949年9月23日，杜鲁门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比美方的预期提前了很多年！

二战的悲剧本不该发生

从历史上来看，苏联的防御总是强于进攻。在二战期间，即便希特勒认为苏联已被彻底击败，但苏联人民仍表现出惊人的抵抗意志。苏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共有70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250万被纳粹灭绝的苏联犹太人，以及150万被德军杀害的其他平民，大约300万人战死。另有300万到400万人被俘。伤残的人数至今没有公布。

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苏联城镇、7万个村庄、3.1万家工厂、8.4万所学校、4万英里铁路，还损失了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和2,000万头猪。这相当于苏联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

斯大林是否曾自我反省，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现在很多政治权威人士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居心叵测，故意在1939年和希特勒签约，希特勒就会因忌惮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被迫推迟对波兰的进攻。西方国家也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加强军力，恢复欧洲的力量平衡。那

么，这场难以想象的人类劫难，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的共存政策进入第四阶段

在二战期间，关于应该如何应对共产党，美国总统收到两种不同的解读和建议。一类顾问采用历史分析法，把共产党视为其自诩的世界革命者，认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就是预测他们未来行动的最佳参照；第二类顾问对共产党领袖的看法颇为理想化。他们希望人们忘记过去，把共产党的野蛮行径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并且可以通过耐心和宽容来感化。

在这第二类顾问中，不仅有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还有后来被揭露深度参与颠覆美国政府的间谍。^[132] 理想主义和阴谋颠覆的界限，历史学家们至今也很难分清。无论如何，正是这类人主导了租借计划，并且主导美国对苏外交政策长达 15 年。

这类总统顾问，对共产党的丝毫转变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例如，当共产国际在 1943 年 5 月 22 日宣布解散时，他们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共产领袖放弃征服世界无可争辩的证据。然而，其他人则怀疑这不过是一种宣传伎俩。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叛逃的前苏共密码员古岑科（Igor Gouzenko）证

实：“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或许是近年来共产党最大的一场闹剧。仅仅是取消了名称，目的是为了安抚民主国家的民众。实际上，共产国际依然存在并持续运作。因为苏共领导层从未放弃建立共产专政的野心。”^[133]

当美国总统所属政党的许多高级官员，都看出美国政策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立即向总统发出了警告。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是罗斯福总统好友，在1933年被任命为首位美国驻苏联大使。在二战期间，总统和他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布利特向总统介绍了他和斯大林相处的亲身经历，并告诫总统，在和共产领袖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

总统回应说：“比尔，我不否认你说的事实都是准确的，也不否认你的推理逻辑。我只是直觉认为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利（指哈里·霍普金斯）也说他不是，他只想让他的国家获得安全。我认为，如果我无条件地给予他一切，而不向他索取任何回报……他就不会想并吞任何土地，并将和我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与民主。”^[134]

这番话流露出来的理念，是理解二战末期三巨头会议的关键。到了那时，美国的外交战略，已经从1933年的简单共存，演变到第四阶段——完全接受苏联共产党，并且作为维护未来世界和平计划的合作伙伴。

联合国的致命缺陷

1944年8月和9月间，英国、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举行会议。

这次会议奠定了《联合国宪章》的基础。苏联不仅成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更是控股股东。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苏联是争端的一方，尽管其它国家反对，它仍然可以行使否决权。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根本原则，但民主国家竟然同意了。为了让苏联参与进来，它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944年12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对美苏关系，以及苏共在战后将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苏共未来的外交政策有明确的目标，而我们对这些目标还没完全了解……从目前苏共的行为来看，‘友好’和‘独立’的含义，和我们的理解截然不同。”^[135]

随着战局向有利的方向逆转，苏共对待美国官员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傲慢。迪恩将军就《租借法案》写信给华府说：“甚至我们的援助也受到怀疑……第二阶段参战的美国，在苏联人眼里，要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精明商人，要么就是一个应该鄙视的傻瓜……我还没见过苏联人的家庭生活。官员们不敢和我们太亲近，有些

人会因此遭受迫害。”^[136]

到了第2年4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厌倦了苏共的态度。他向罗斯福总统呼吁说：“我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两国要用坚定和直言不讳的态度，让苏联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有一条底线，绝不会容忍任何侮辱。”^[137]

有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也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但是，就在这呼吁发出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就去世了。结束二战、建立联合国的艰巨任务，落到了那些仍然坚信苏共被误解、能够成功建立美苏合作关系的人手中。

1945年4月25日，46个国家的1,400名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代表们对《联合国宪章》达成了共识。

任何熟悉共产苏联《宪法》的人都会发现，《联合国宪章》也采用了类似的形式。它首先是热情宣布民主原则是合理的和值得追求的；紧接着却通过《宪法》限制或程序限制，彻底否定了刚宣布的民主原则。

例如，《苏联宪法》规定了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但是，在第126条中，它规定由一个政党（共产党）向选民提供单一候选人名单。很显然，这等于让所有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冠冕堂皇措辞都变得毫无意义；新闻自

由同样得到了名义上的保障，但又因为所有文章都必须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荡然无存。

《联合国宪章》也是如出一辙，规定了“其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第1条），接着却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和美国）主导的安全理事会。其中任何一国都可以通过行使否决权，轻易地使其它所有成员国的意愿无效。

《联合国宪章》允许每个成员国在大会中拥有一票表决权，这听起来很民主。但它随后又规定大会只能提出建议，所有建议必须提交安理会以决定是否采纳！

（第11～14条）。这使得安理会成为联合国内唯一的立法机构。为了明确说明这一点，《宪章》第24条规定，任何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必须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这意味着，尽管联合国大胆宣布，它是“建立在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之上”，但残酷的事实是，所有成员国都得承诺服从安理会那几个国家的意志。正如接下来十年的戏剧性展现，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小国，都可能受到苏共的遏制。而苏共正是通过频繁使用否决权来主导安理会的。

《联合国宪章》进一步规定，只有爱好和平的国

家才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第4条）。这一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被广泛讨论。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特别强调，联合国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使友好国家携手维护和平，而不是全球所有国家的聚会之地。换句话说，联合国建立的前提，是其成员只包括那些历史已证明“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宪章》通过八年后，杜勒斯向美国律师协会解释了联合国维和失败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织的局限性，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和一个国家的合作，而这个国家却由企图统治世界的国际政党所控制。”^[138]

一些政治权威人士后来指出，联合国设立一个全球警察机构，然后却让国际罪犯头目成为了机构的一员。这就好比建立了一个扑灭火灾的消防队，却让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纵火犯加入了消防队；对小国而言，这就像是承诺有一位好的牧羊人，结果却任命狼和它的幼崽来看守羊群。

这一切，都在紧随其后的“幻灭十年”变得更显而易见。不过在1945年，厌倦战争、满怀希望的自由世界，仍然相信联合国是一个集体安全堡垒，能够抵御侵略国。

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态度

1945年5月24日，美国对战后共产党的期望得到了明确的结果。法国共产领袖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代表他的苏共上级写信，要求美国共产党立即放弃和资本主义友好合作的政策，回归到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上来。

早在1940年，美国共产党就正式退出了第三国际，以避免按照《沃里斯法案》规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后来美共解散，自称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让党员们融入一个美国主要政党。

美共的这些转变，都和苏共的政策保持一致，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随后，苏共宣布：回归传统的共产主义政策。为了证明政策彻底转变的正确性，要求美国共产领袖布劳德对此前的错误背锅。于是，他被开除出党。

福斯特立即接管了美共领导权。他曾在1932年写过一本煽动性的书《走向苏维埃美国》。早在二战之前，他就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说：“由共产党人领导美国政府那一天，就像太阳升起一样必将到来。届时资本主义政府将转变为苏维埃政府，红军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139]

现在不难理解，莫斯科为什么要让福斯特这样的人领导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因为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共产领袖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们在秘密会议中满怀希望地猜测，下次大战，可能就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终极对决。

前苏共密码员古岑科透露，在停战后，他和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其他同事被警告不要自满。扎博廷（Zabotin）上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这样描述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昨天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今天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明天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敌人！”^[140]

要洞察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想法，我们还可以从南斯拉夫共产领袖铁托（Tito）在其高层核心圈的讲话中一窥究竟：

“在第二次资本主义战争中，苏联遭到了最危险、最强大的法西斯敌人的攻击，最终以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我们在刚结束的战争中和资本主义合作，绝不意味着我们将来会继续和它结盟。相反，即便资本主义势力曾协助我们击败了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天敌。我们可能会再次利用他们的援助，但唯一目的，永远只是为加速他们的最终灭亡……

“原子弹是个新变数。资本主义势力企图靠它摧毁苏联和工人阶级的胜利前景，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没能如期实现，因为早在 1945 年，他们的原子弹就快完成了。但是，我们离实现目标并不遥远。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来重整队伍，完善武器弹药储备。

“所以，我们当前的政策应该是走温和路线，以便赢得时间，重建苏联和我们控制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和工业。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到消灭反动派的决战。”^[141]

这就是在二战后，共产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时的战略计划。共产领袖们认为，随着世界进入战后时期，他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八章

共产党战后蚕食自由世界

在二战之后，斯大林推行的共产主义扩张计划，包括三种手段：在占领区建立亲共傀儡政府；操纵卫星国军队征服新领土；通过间谍和宣传进一步渗透自由国家。

我们将探讨这三个计划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并且帮助您了解：

为什么霍普金斯在临终前专程访问莫斯科？

苏共的铁幕战略，是如何使自由世界失去一亿人口的？

自由世界是如何又失去中国 4.5 亿人口的？《魏德迈报告》揭示了什么？

美国外交发言人拉蒂莫尔（Owen Lattimore）在 1949 年语出惊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韩国垮台，但不要让人觉得是我们推的。”您对这句话怎么看？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队是如何首次占据优势的？

1953 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国务卿如何表明将放弃长达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联邦调查局在“地下战役”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为什么美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防止中南半岛的沦陷？

在台海争端中，中共为何嘲讽美国为“纸老虎”？

苏共官员曼努伊尔斯基 (Dimitry Z. Manuilsky) 是如何论述“和平共处”战略的？

霍普金斯的临终莫斯科之旅

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共产党的颠覆和侵略行为变得越发明显，就连那些曾经把职业生涯押在和苏共领袖友谊上的人，也开始警觉起来了。这其中，就包括霍普金斯。

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不到 1 个月，霍普金斯就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他急忙安排去见斯大林。当时，霍普金斯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但他强迫自己最后一次前往莫斯科，想从已被摧毁的战后和平计划残骸中找回些许希望。

然而，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之后，见到的却是粗鲁而又愤怒的斯大林。斯大林对他为苏联倡导的援助计

划——《租借法案》恶语相加。我们要感谢前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情况。^[142]

霍普金斯一直自认为是苏联在美国的铁杆盟友，这通臭骂给他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他和同事们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冒着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期望建立起美苏和平伙伴关系。即便是斯大林给他一记耳光，他可能也不会如此震惊。

霍普金斯极力反驳，说“美国（通过他）如何宽松的解釋法律，为苏联援助了大量的食品和其它非军事物品。”斯大林承认这一点，但只是一带而过，然后强调说，美国在欧洲胜利日之后就终止了《租借法案》，这仍然让苏联人无法原谅。

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有美国再开启一轮慷慨援助，才能平息斯大林的怒火。否则，斯大林显然想不出其它理由，还想假装得到美国的友谊。他甚至威胁，要抵制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

在现在看来并不恰当的理由驱使下，霍普金斯继续恳求斯大林留在联合国，并反复强调共产党参与联合国能获得很多好处。斯大林假装像一个生气的顽皮孩子，先是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然后又渐渐妥协了。他答应出席旧金山的联合国会议。不过，他想让霍普金斯明

白，自己是在帮美国一个大忙。

霍普金斯回国了。到 1946 年 1 月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由于把苏共当成自由世界合作伙伴的“战略”，那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将迎来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自由世界失去一亿人口

毫无疑问，二战的首要目标，是解放所有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苏共非常清楚，如果它要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这些国家，尤其是和苏联接壤的国家，它就必须巧妙操作，制造出一种假象：这些国家通过自己的政治自决，实现了共产主义。

于是，对这些国家的内政保持秘密但极为主动地关注，已成为苏共的既定政策。要通过渗透和破坏，让它们自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在一些国家，这一策略立竿见影。例如，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掌握了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权。一旦获得解放，共产党人就要求获得建立新政府的权力。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两个国家就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后来，斯大林试图清洗铁托政权，但没有成功。铁

托反而一度让南斯拉夫拉脱离了苏共的控制。不过，尽管美国为铁托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援助，但他仍然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

苏共还在东欧国家找到了极佳的机会来实现其策略。苏联红军在二战最后阶段，占领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大部分地区。

在撤出这些国家的红军之前，苏共实施了“和平征服”策略。它促成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只包括左翼政党的联合政府，让人误以为这些国家有代议制政府；下一步是安排共产党人担任政府所有重要职位；最后一步，是强迫所有政党加入，由共产党领袖获得完全独裁权力，形成“铁板一块”。

通过这一连串精心策划的行动，到1949年，这些国家都被彻底征服。共产主义铁幕在这些国家的西部边界悄然落下。自由世界发现，自己和这些拥有1亿人民的昔日盟友，从此完全隔绝了。

蒋介石承诺实行民主宪政

与此同时，自由世界在和共产党角力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个最惨痛的教训——失去了中国。

在经历和日本军国主义十四年的战争之后，中国满

怀希望地迎来了二战的结束。抗日战争是在蒋介石的统帅下进行的。但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诺，一旦国家统一，将尽快实行民主宪政。在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下令恢复公民权利，实现新闻自由。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对中国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于西北地区人数不多、但训练有素的中共军队。尽管如此，蒋介石仍计划制定一部《宪法》草案，允许共产党参政，前提是必须解散武装。蒋介石相信，只要消除武装叛乱，就能为中国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于是，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前往首都，探讨如何和平解决分歧。

毛泽东抵达后，答应合作建立民主制度。但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对毛装出的诚意完全不信任。后来，蒋介石向这些紧张的同僚保证，在他确信政府安全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民手中之前，绝不会放弃他的权力，不能把权力交给那些狡诈的共产党人。

侵犯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

然而，中国战后和平的希望却遭受了沉重打击。早在 1945 年 2 月，英美两国的外交官就已经知道，各国领导人已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如果苏联加入对日作

战，就给予苏联在满洲的广泛财产权。蒋介石对这一单方安排（从未征求过中国意见）非常愤怒。他一直把后来的灾难，归咎于这个严重侵犯中国权益的秘密协议。

就在日本投降的 6 天前，《雅尔塔协定》允许苏军进入满洲和北朝鲜。经过野蛮占领，苏军巩固了对这片领土的控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普遍实现了工业化，这里也是全中国最富饶的农业地区之一。事实上，中华民国政府渴望利用满洲作为工业基地，来恢复饱受重创的中国经济。

在占领满洲后，斯大林又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撤军，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前提是中国承认雅尔塔会议给予的满洲财产权。这还包括满洲铁路的一半所有权，以及租赁旅顺港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在美英两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和苏联签署了条约。

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条约不过是苏共的战略工具，把不公正的《雅尔塔协定》给合法化了。

正如蒋介石所担心的，苏共把满洲铁路当作自己完全拥有的铁路来经营；他们不仅在旅顺港建立了海军基地，还嚣张地拒绝中国人使用自己的大连港；他们不但

没有撤离满洲，反而把满洲的所有重工业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复苏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更为恶劣的是，苏共还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的时间，直到中共军队从西北攻入，并最终占领了满洲。随着中共的到来，苏共又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大量弹药和战争物资，交给了中共军队。

结果，等蒋介石的国军赶到，准备接管满洲时，他们愤怒地发现，中共已经在满洲站稳了脚跟，一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外交官挺共抑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华民国政府准备建立宪政之际。蒋介石主动把 1946 年 5 月 5 日，定为各党派参加的第一次国民大会日期。然而，由于在满洲爆发了内战，这个统一中国并实行民主宪政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破坏。于是，美国外交官决定出手相助。

美国外交战略家们创建联合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始终坚持认为，共产领袖是潜在的和平主义者，并没有领土扩张野心。基于这个假设，他们谴责蒋介石对抗中共军队，制造新的世界紧张局势。因此，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被派往中国

制止内战。

1946年1月，马歇尔将军抵达中国。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悲惨地表明，把共产党纳入代议制政府的想法是荒唐的。

中共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但坚持保留自己的军队；他们希望在全国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却拒绝中央政府介入中共占领区；他们同意停火，但只要对己有利，就会立即发动进攻；他们原本同意帮助成立一个代表各方的国会，但又在最后一刻说他们不会参与。

为了让中共参加，蒋介石推迟了第一次国民大会日期。中共却反咬一口，指责蒋介石未经授权就改期。在第二次延期后，共产党仍然拒绝参加。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终于召开，并在圣诞节当天，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但中共却对此不屑一顾。

至此，蒋介石已经完全确信，中共绝不想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而是要用武力来赢得整个中国。他很清楚，中共永远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政策都是由莫斯科制定的。

时间最终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美国外交战略家直到中国沦陷之后，才接受了这个结论。就在中共

发动攻击时，美国外交使团仍然不认为蒋介石有正当理由反击。当蒋介石要收复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时，却被华盛顿说成是不可原谅的侵略行为。

美国停止对华援助

到了 1946 年夏天，中共一再违反停战协议。蒋介石决定全力反击，并深入到满洲。美国外交官们急忙命令蒋介石停止行动，但他拒绝了。他说，再次休战只会让中共有时间重整旗鼓，以后的攻势会来得更为凶猛。所以，必须采取军事行动，让中共军队解甲归田。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宪政，而不必再担心发生叛乱。

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三次命令他无条件停火。为了逼蒋介石就范，美国最终实施禁运，停止了所有对华援助，蒋介石被迫同意停火。马歇尔将军说：“作为参谋长，我武装了中国的 39 个反共师。现在我大笔一挥，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事实证明，这对中共极为有利。当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压制之时，中共重新集结力量，为后来的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这场战争对中国是致命的。

奇怪的是，即便在蒋介石屈服、宣布停战之后，美国也没有解除禁运。国军无所作为，消耗了许多他们担

心再无法补充的物资。后来，当中共军队如潮水般逼近国军时，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对华援助法案，但因为物资没及时运到，于事无补。

从1947年起，国军的士气开始低落。国军将领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既是叛乱的受害者，也是美英缺乏远见的牺牲品。

在蒋介石宣布无条件停战之后，马歇尔将军呼吁中共领袖和平谈判。而中共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应，并提出一些连马歇尔都认为完全无理的要求。他们想要回刚被收复的满洲所有富饶地区；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并在将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达成和解。马歇尔将军把中共的非分要求，视为它不再对调停感兴趣的信号。因此他请杜鲁门总统召他回国，匆匆结束了他的使命。1947年1月，马歇尔返回美国，成为新一任国务卿。

蒋介石退守台湾

在美国政府高层，有很多人对中国内战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因此，1947年夏天，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奉总统之令前往中国，调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回国后，魏德迈提交了一份报告，对马歇尔和外交使团的和平方案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报告中说，这不仅侵犯了自由中国的利益，就连美国 and 所有盟国的根本利益，也都屈服于共产党的喜怒无常之下。他建议迅速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并预测说，如果援助及时，局势仍有可能挽回。

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到了魏德迈将军批评的人手中。因此，这份报告被埋藏在部门档案中近两年。等到这份报告曝光之时，采取报告中建议的行动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国军的崩溃之势似乎不可逆转。本来在1947年和1948年初，国军坚守得很好。但到了1948年下半年，补给短缺和中国经济崩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军的崩溃不是渐进的，而是突如其来和全面的。数以千计的士兵放弃阵地，混乱地向南逃散；还有数以千计的士兵就地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到了1949年10月，中共领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庆祝胜利，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之后，蒋介石承认失利，放弃中国大陆，退守台湾。

1949年《国务院白皮书》

自由中国的沦陷，在整个美国掀起了强烈的公愤。

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觉得美国的长期盟友中国被莫名其妙地出卖和颠覆了。当时，很少有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沦陷的原因。但他们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的利益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大家迫切要求知道真相。

于是，那些策划了这场致命对华政策的人，迅速联手撰写了一份报告，为他们的远东策略辩护。这份报告名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1949年作为白皮书发布。对许多人来说，报告中的论证很有说服力，但也有人买帐。中国的沦陷，让那些曾追随马歇尔将军、直到最后一刻仍信任共产党的人惊醒了。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博士，就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身为前传教士和中国燕京大学校长，把中国的沦陷视为一场极大的人道灾难。他批评自己参与其中，并谴责同事想在白皮书中掩盖他们的错误。

司徒雷登博士坦诚地说：“我们这些负责实施中国政策的美国人，主要看到的是中共的表面，而忽略了任何极权制度所固有的不宽容、偏执、欺骗、漠视生命等罪恶；我们继续使用共产党提供的形容词，如进步、民主、解放等词，也保留了资产阶级、反动、帝国主义等含义，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我们没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

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和潜力。所以，对于中国沦陷这场巨大的灾难，不仅是中国的责任，美国和自由世界也难辞其咎。”^[143]

谈到白皮书，司徒雷登说：“实际上，我只是对本非同寻常的白皮书感到困惑和不安的人之一。显然，它的目的不是要写成‘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在挑选当时制定政策时使用的资料。可是，那些在当时没被采用的资料，却被忽略掉了。”

这也正是魏德迈将军抱怨的。美国外交战略家们既不愿意承认现实，也不愿意改变他们对共产领袖的评价，尽管共产领袖两面三刀的证据比比皆是。

令人震惊的美国远东政策

到 1949 年，任何警惕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再被共产党的战略迷惑。几十名美国共产间谍已经暴露，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美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他们因图谋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定罪；钱伯斯、本特利和一大批前共产间谍坦白了他们的过去；西方盟国经历了柏林封锁的严峻考验，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防止苏共用占领中国的方式吞噬整个欧洲。尽管如此，1949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仍主办了一场令人费解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请专家们分析如何应对远东局势，由国务院的杰瑟普（Philip Jessup）主持。与会者不仅包括国务院官员，还包括许多对亚洲感兴趣的嘉宾。司徒雷登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会后，他对整个会议的倾向深表担忧。斯塔森（Harold Stassen）也在场。他后来作证说，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以下政策：

1. 援助欧洲应该优先于亚洲。
2. 只有在长期谨慎的研究之后，才能开始援助亚洲。
3. 应该把苏共视为“不像希特勒那样侵略成性”，“不太可能用武力扩张帝国”。
4. 美国应该承认中共政权。
5. 应该敦促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中共政权。
6. 应该允许中共政权接管台湾。
7. 如果中共坚持，应该允许它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
8. 不应该援助印度的尼赫鲁，因为他有“反动和专断倾向”。
9. 应该打破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援助中共政权。
10. 不应该援助蒋介石或华南反共游击队。

在这次会议上最积极推动以上政策的，是拉蒂莫尔（Owen Lattimore）和罗辛格（Lawrence Rosinger）。前《工人日报》编辑布登兹（Louis Budenz）宣誓作证，指认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144]

即使没有布登兹的指证，与会的每个人也都应该知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政策清单都来自于当时莫斯科“党的路线”。几个月来，每一期共产党报刊都在鼓吹这些政策。而且，苏共的挑衅和煽动性政策，正在威胁着几乎所有自由国家。那些盲目听从这些建议的官员，其判断力和专业洞察力可想而知。

在这场会议结束的3个月之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宣布了几项政策，预示中共将夺取台湾并清算蒋介石。他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力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建议，在1950年1月12日宣布，上述第6点和第10点已经定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他还明确表示，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如果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发生攻击，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人民自己抵抗。接着，他建议这些国家可以向联合国寻求援助。这个直截了当宣布放弃台湾和韩国的声明，令许多研究远东问题的学者震惊。这不仅违背了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且等于向共产党发出了邀请——可以入侵这些自由世界的盟友，而美国不

会干涉。

于是，共产党只用 6 个月时间就做好了进攻准备。他们把几乎不设防的韩国作为第一个战场。

不允许打赢的朝鲜战争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根据《雅尔塔协议》，苏共在占领满洲的同时，也接管了北朝鲜。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直到建立稳固的共产傀儡政府之后，苏共才撤军。至于韩国，美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领土。

1949 年，联合国要求，苏联和美国必须各自撤出在朝鲜半岛的军队。但苏共为北朝鲜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 18.7 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173 辆苏联坦克，大量苏联大炮和 200 架苏联飞机。而另一方面，韩国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军队只有 9.6 万人，装备落后，几乎没有坦克、反坦克武器、重炮或战斗机。

这意味着在 1949 年底，和台湾防范中共攻击相比，韩国抵抗北朝鲜攻击的能力更弱。华盛顿外交官向台湾和韩国声明，一旦遭到攻击，他们绝对不可指望美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外交发言人拉蒂莫尔解释了当时的立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韩国垮台，但不要让人觉得是我们推的。”^[145]

1950年6月25日黎明时分，北朝鲜的8个师越过三八线，南下直逼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

韩国总统李承晚急忙向联合国安理会、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求救。三方都迅速做出了回应。安理会宣布北朝鲜犯有破坏和平罪，并要求其军队退回三八线（如果苏联派代表出席，无疑会否决这项决议。但苏联正抵制安理会，因为中国席位依然由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共拥有）。

麦克阿瑟将军飞往朝鲜半岛，向华盛顿报告了韩国的危急局势。杜鲁门总统抛弃了外交顾问制定的政策，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驻日美军投入韩国战场，以遏制北朝鲜的进攻。

连续几个星期，战争的形势一片黯淡。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联合国部队最高指挥官。但初期这些部队的兵力非常有限，只能守住釜山附近的滩头堡。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制定了一个大胆计划，不仅难度大而且不合常理。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会让北朝鲜军队大吃一惊。

9月15日，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美国海军（还包括两艘英国航空母舰）、空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起来，在仁川发动了一次巧妙的登陆战役。仁川海水高潮和低

潮的落差高达 29 英尺，在这里登陆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然而，通过分秒必争的时机控制，登陆终于成功了。这让北朝鲜军队猝不及防，陷入了强大的南北夹击之中。美军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然后迅速合拢，消灭了集中在南方的北朝鲜精锐部队。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1950 年 9 月 15 日的仁川登陆战，美国海军陆战队越过红滩北侧的海堤。（公有领域）

麦克阿瑟将军随后兵分两路，韩国军队沿东海岸，联合国部队沿西海岸，挥师北上。在此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得不到清晰的指令，必须根据华盛顿和联合国的模糊暗示行事。一时之间，他似乎被禁止追击撤往北方的敌军。

到10月中旬，联合国军的沿海先头部队，已逼近朝鲜最北端。战争看似即将结束，统一朝鲜半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景指日可待。然而，到了11月，出人意料的灾难降临了。

从朝鲜北部边界的鸭绿江对岸，如洪水般涌入了中共军队，数量竟然有100万人！联合国军发现，自己已经被狂热、尖叫，自杀式的人潮淹没。麦克阿瑟将军用无线电通知华盛顿：“我们正面临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联合国军队的防线，被敌军切得七零八落，只好退守到三八线以南。麦克阿瑟将军几乎不敢相信，中共竟敢冒着美国原子弹轰炸和空军大规模报复的风险，对联合国军队发动这种不可原谅的攻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中共已经通过间谍得到了惊人的保证：华盛顿、伦敦和纽约的外交官们，不会允许麦克阿瑟动用美国空军报复，麦克阿瑟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

在这关键时刻，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联合国里的亲共势力和美国国务院的左翼支持者们，正在瓦解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朝鲜战争指挥官的决策。他发现自己急需的大量物资，被按照国务院会议定的优先级转到了欧洲；他受到特别限制，不能追击中共战斗机到他们的基地；也不能轰炸输送大量敌军物资到鸭绿江北岸的满

洲铁路；他更被禁止炸毁鸭绿江大桥，这座桥是敌军补给的生命线；而他的后勤补给和增援也被削减，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战略反攻；外交官们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派遣几千名训练有素的国军参战。这是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最后一击。

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将军无奈地看着这些政策导致的屠杀。他终于按捺不住，违反总统1950年12月6日发布的禁言令，回答了国会议员马丁（Joseph W. Martin）的书面询问，解释为什么联合国部队在朝鲜遭遇了挫折。1951年4月5日，国会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如何赢得战争建议的信。五天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立即撤销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

李奇威（Matthew B. Ridgeway）将军接替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返回美国，对自己军事生涯的突然结束满心疑惑。当他抵达旧金山时，迎接他的是大批热情欢呼、赞誉的同胞。他这才明白，原来美国政治体制的疾病并未蔓延到全身，只是局限在头部的一个角落而已。

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后，朝鲜战争又陷入了两年僵局。在后来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斯特拉特迈尔（George E. Stratemeyer）将军、范弗利特（James A. VanFleet）将军和乔伊（Charles Joy）海军上将等人，解释了他们在朝

鲜指挥部的遭遇。他们一致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从来没有被允许打赢战争。

外交政策的“遏制共产党”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变成了“遏制联合国部队”。人们很快发现，朝鲜战争的指挥和政策，和那些导致中国沦陷的政策如出一辙。

此后，更多细节被揭露出来。在这一关键时期，不仅是外交官的阴谋诡计导致朝鲜战争无法全胜，苏共间谍更是常在伦敦、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官员的身边，推动莫斯科的政策路线。这其中就包括两位英国高级外交官——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麦克莱恩是英国外交部美国事务部门主管；伯吉斯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等秘书。就在英国情报部门即将逮捕他们时，两人都逃到了铁幕之后。

朝鲜停战

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人们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普遍感到悲观和绝望，迫切希望以某种方式停止这场血腥的战争。3月5日，一则新闻迅速传遍全球，让和平的希望瞬间升温——斯大林死了！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上任。他是斯大林的前秘书、苏共秘密档案

的管理人。他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avrenti P. Beria）联手夺取了最高权力。贝利亚拥有 200 万人的特工和军队，掌管着强制劳改营，还负责监督核能发电厂。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很快发现，苏联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和卫星国的压力在不断升高，就像 1922 年和 1932 年那样。马林科夫决定给百姓一些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暂时搁置重工业，人民无法靠重工业吃饭，我们应该关心人民的基本需求。”

这是苏共政策的重大转折。马林科夫在国内的口号是“增加粮食”；而对外，他倡导和所有民主国家“和平共处”。

就在斯大林死后的第 23 天，中共根据新的指示，开始和联合国部队指挥官谈判。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12 天后正式生效。

朝鲜战争就此结束。美国耗费了 200 亿美元，超过 13.5 万人伤亡。而韩国有 100 万人死亡，100 万人伤残，900 万人无家可归。还有 400 万北朝鲜难民涌入了韩国。

美国终结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从朝鲜战争走出来的美国人民，比当初参战时更加

悲伤，也变得更加有智慧。权威人士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两大问题。首先，它让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共产主义威胁仍在，就必须时刻整军备战；其次，它向美国人暴露了联合国的致命缺陷。参议员塔夫托（Robert A. Taft）总结说：“联合国作为世界的公共论坛，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抵抗武装侵略，它根本无能为力。”

早在 1950 年，当联合国呼吁所有成员国共同抵抗共产势力时，只有十六个国家响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武装部队，但只有 3.5 万人；韩国虽地小人少，却保持了 40 万人的军队；而美国则出兵 35 万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在此期间，超过 100 万美国士兵在朝鲜半岛轮换，以维持稳定的军力。因此，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联合国已经不再是集体安全的象征。

令人难忘的是，正当美国 and 韩国承受战争重担之时，苏联和英国却违反联合国禁令，向中共运送战略物资。在联合国大会上，苏共外交官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明目张胆地挑战：“苏联从不隐瞒卖给盟友中国军备的事实，而且还会继续卖！”

朝鲜战争的结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1953 年夏天，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宣告，如果共产党在朝鲜破坏停火协议，我们将立即对中共发动大规模战争。英

法两国都支持这一立场。

许多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这一行动，等于宣判了对共产党绥靖政策的死刑。这个政策整整持续了二十年。

FBI 地下战役清算美共

对于绥靖政策的终结，没有人比胡佛更感到欣慰了。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作为美国的执法者，他从 1919 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向政府领袖和公众揭露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那一年，他作为司法部长助理，编写了第一批反映世界共产颠覆运动的法律简报。

在二十年的绥靖政策期间，许多美国人被“共产党统战的甜言蜜语”所诱惑，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而胡佛却双拳出击，严厉打击那些蚕食美国的共产党人。他强调说：“美国共产党……应该和三 K 党、已经消失的德裔美国人联盟和其它极权团体一视同仁……就像普通罪犯寻求黑夜的掩护一样，共产党人藏在虚假的幌子后面，持续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计划，企图剥夺美国人的自由遗产。”

胡佛令共产党大伤脑筋。在大多数国家里，共产领袖都能以腐败和侵犯公民自由的罪名，抹黑政府警政机

构的名声。然而，胡佛用毕生精力建立和发展联邦调查局，并且让大众知道，任何类似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的诡计。

多年来，大众已经了解，联邦调查局特工侦查无辜嫌疑人花费的时间，和揪出有罪者花费的时间同样多。事实上，通过严谨侦查和人道对待罪犯，联邦调查局获得了高达 85% 的认罪率。^[146]

因此，共产党一直想把联邦调查局抹黑成“美国盖世太保”，可惜成效不佳，这让他们非常失望；联邦调查局训练的特工们，具备了自由国家政府官员的应有素质——机警、睿智、科学和勤奋，这使共产领袖们气急败坏；更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特工们追查颠覆分子时悄无声息、有条不紊，俨然在打一场地下战役。这一切都预示，共产党的阴谋家们将迎来清算之日。

1948 年 7 月 20 日，美国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被起诉。受审的“十一巨头”全被定罪。他们的六名律师，也因在审判期间藐视法庭被罚款或监禁。其中 4 人弃保潜逃，联邦调查局不得不跨国追捕，才把他们缉拿归案。

此后不久，美国政府确信苏共间谍一直在窃取原子能情报。于是授权联邦调查局侦查。几周之内，联邦调查局翻阅了数以吨计的记录，询问了各原子能工厂的几

百名受限制雇员。再经过缓慢的筛查，最终锁定了物理学家福克斯（Klaus Fuchs）。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秘密实验室工作过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这位已入籍英国的德裔科学家，已经是颇有威望的英国哈维尔原子能机构的主管。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福克斯是打破自由世界原子弹垄断权的头号嫌犯。英国情报局迅速行动。不到1个月，他们就发现一些证据，初步印证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1个月后，他们已经确信无疑。1949年2月3日，英国宣布，福克斯已被逮捕，并已全盘招供。

福克斯的供词引发了联邦调查局新一轮追捕。福克斯说，他把原子弹的有关情报，交给了一个他只知道叫“雷蒙德”（Raymond）的人。这人显然是个信使，负责把情报送到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联邦调查局必须查明他的身份和下落。尽管除了外貌特征和化名，以及他可能是位化学家之外一无所知，但特工们最终还是抓到了这个人，他就是戈尔德（Harry Gold）。

戈尔德也供认不讳。这使联邦调查局最终揭开了一个困扰全美国的谜团：“原子弹的引爆机制如此精妙，苏共需要很多年才能摸索出来。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戈尔德说，这是他们偷来的。联邦调查局趁热打铁，继续深挖。新的线索把他们带到了两位美国公民——

罗森堡夫妇(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的家门口。

调查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曾向他的小舅子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施压，要求他向戈尔德和他本人提供有关引爆装置的所有核心信息。格林格拉斯也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能秘密实验室工作，对原子弹的构造和引爆原子弹的透镜装置非常熟悉。他最终被引诱画出了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草图，并提供了引爆透镜的详细图纸。罗森堡夫妇随后把这些情报传递给了苏共的间谍小组。

苏共的科学家得到这些情报后，迅速缩短了和美国原子能竞赛中的差距，并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大家还记得，当时让西方国家大为震惊。苏共利用这一暂时优势，大肆炫耀着他们的核武器，并指示中国和北朝鲜的共产领袖，四处寻找军事征服的机会。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为朝鲜战争做准备。

事实上，当罗森堡夫妇被定罪并准备服刑时，美国正处于朝鲜战争之中。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牺牲了生命，以阻挡罗森堡夫妇助纣为虐引发的红祸。

在法庭上，考夫曼(Irving Robert Kaufman)法官注视着这对男女，对他们说：“和你们所犯的罪行相比，蓄意谋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看来，你们把

原子弹情报交到苏共手中，让他们提前几年制成原子弹，超出了我们最优秀科学家的预测。这已经导致共产党对韩国的侵略，伤亡已经超过了5万人，而且还可能会有几百万无辜的人，为你们的叛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你们的背叛无疑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要说的话，对我来说无比沉重。我日夜思考，翻阅档案，扪心自问，想找到一丝怜悯的理由。因为仁慈是人之常情，尽力挽救生命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深信，如果我对被告罗森堡手下留情，我就违背了人民对我庄严而神圣的信任。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我没有权力宽恕你们。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你们的罪行……现在判处你们死刑。”

格林格拉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悲剧，但它验证了胡佛最初的判断：共产领袖们“持续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计划，企图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遗产”。

不过，胡佛深知，只要共产党在“地下战役”中失败，它就永远无法对美国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坚信，经过精心挑选和认真训练的自由战士，完全可以和共产领袖们斗智斗勇，并取得最终胜利。

苏共集团陷入困境

到了 1953 年，苏共不仅在国际上陷入窘境，铁幕出现的巨大裂痕，也显示苏共集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共产党强大和团结的宣传不攻自破了。

共产东德爆发了起义，人民用砖块和赤手空拳面对坦克；拒绝向东德人开枪的苏军官兵被处决；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多起反抗事件；波兰、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起义也在酝酿中。

经济学家从马林科夫的演讲和官方信息中发现，苏联人每周工作 38 个小时赚取的食物，在 1928 年只需 26 个小时就能得到；尽管人口在大幅增加，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的粮食，竟然比 1928 年“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要少。

苏联的卫星国之所以起义，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苏联可能永远无法兑现向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机械的承诺。恰恰相反，破产的苏联，却像一只巨大的寄生虫，不断从卫星国家掠夺资源。

西欧各国的生活和这些共产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正享受着 40 年来的最繁荣时期。美国捐赠 500 亿美元来支持这些国家战后重建，而它们正在迅速走向自立。美国也达到了经济繁荣的顶峰。这证明美国不仅有

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还把财富公平地分配给了民众。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恢复了信心。

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教授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实践，令他大失所望：“所做的一切……不是把财产转移给工人，而是转移给了政府。工人仍然是雇员，在大型企业中受命于人，历尽挫折……那些期望国有化能提高工资的人……已经失望了。这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反而减少了私人财富……它提出的控制问题还没解决，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希望政府拥有多少权力？”^[147]

共产势力控制北越

朝鲜停战之后，共产领袖并没有因为苏联国内问题而减弱侵略的欲望。他们想要征服中南半岛。而中南半岛的战争，原本是当地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尝试，但由于共产势力的渗透，最终使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变成了法国和越共之间的战争。越共获得了苏共和中共的大力支持。而法国共产党（法国最大的单一政党）的妥协，致使法国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54年7月21日，法军战败。在日内瓦会议上，法国同意撤出越南。自此越南分为南越和北越两个国家。

北越由越共统治。实际上，越共并未遵守《日内瓦协议》，一直动作不断，图谋颠覆南越政权。^[148]

此时的毛泽东已陶醉于双重胜利之中。为了确保中共对共产祖国的忠诚，甚至苏共也认为有必要向他和中共做出让步。1954年10月，苏共官员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向毛泽东作出以下承诺：

1. 苏共撤出此前获准租用的旅顺港；
2. 把苏共自战后经营的铁路和其它产业，以“合作伙伴”的名义优惠卖给中共；
3. 为中共提供 1.3 亿美元贷款；
4. 帮助修建两条横贯中国的铁路；
5. 帮助中共新建 15 个重工业项目；
6. 促成（中共）夺取台湾；
7. 争取把日本纳入共产阵营。

显然，即便苏共嘴上说“和平共处”，自由世界也无法回避中共的扩张企图。

“我们正面临被消灭的威胁！”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惨败，是一

场令人痛心的政治悲剧。法国国会中的 100 名共产党员（他们甚至拒绝起立向法国战死的军人致敬），策划了这场 7 年战争的失败结果。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停战会议上，痛斥了那些懦弱和颠覆行为，使 1,200 万人成为共产侵略的牺牲品。他说：“如果是以投降为代价，和平和团结当然容易实现。然而，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要在不放弃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和团结！”

杜勒斯国务卿离开日内瓦后，启动了一轮紧张的环球之旅。他呼吁所有自由国家，对共产帝国主义的荒谬绥靖做痛苦的重新评估。在 20 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行程超过了 15 万英里。当他结束这轮出访时，美国已经加入或加强了一系列遏制共产党的区域组织。

让苏共战略家们沮丧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2 条，美国的这些做法是合法的。因此，美国开始公开利用北约（NA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等区域组织作为互助的安全机构。这大大削弱了苏共此前滥用安理会否决权对西方国家的瘫痪性箝制。

美国还宣布，它不会对苏共建造远程轰炸机部队坐视不管。共产媒体宣传说，这些轰炸机能够向美国城市投掷氢弹。作为回应，美国迅速在铁幕周围打造了一圈

防御基地。苏共立刻像受了伤的熊一样咆哮：“我们正面临被消灭的威胁！”

杜勒斯国务卿冷静地重申一个共产党应该知道的事实——除了侵略者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害怕这些基地。然后，他清晰而又铿锵有力的阐述了一个最新原则——如果苏共胆敢对自由世界发动突然袭击，将立即启动大规模报复。

一时间，莫斯科陷入了不祥的沉默。

苏共测试美国的新强硬政策

1954年下半年，苏联国内显然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好战而又顽固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循规蹈矩的党内政客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开始频繁登上新闻头条。

前苏共官员霍赫洛夫（Nikolai E. Khokhlov）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他认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世界共产革命的推动者，这和马林科夫、贝利亚有所不同，他俩想首先改善苏联人的生活条件。

1954年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团访问北京。在那里，中共得到了准备进攻台湾的指示。由此可见，苏共已经更新了权力结构。接下来，马林科夫抛弃了他的

搭档贝利亚，加入了赫鲁晓夫 - 布尔加宁的新阵营。

12月下旬，贝利亚和他的三名助手被处决。马林科夫也被立即降职，但他及时改变了立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布尔加宁取代了他的位置，赫鲁晓夫则在幕后制定政策，并喊出了新口号：“恢复重工业制造武器”和“用法令增加粮食生产”。

与此同时，中共领会了新上级的精神。在莫斯科的默许下，他们令人震惊地宣布，违反朝鲜战争结束时的战俘交换协议，扣留美军战俘。

《朝鲜停战协议》明确规定，所有要求回国的联合国军战俘，即使其中一些人可能被指控犯罪，都应立即送还。现在，中共却以犯有间谍罪等为借口，要扣留一些美国战俘。美国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许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共产党的承诺是多么不靠谱。

尽管公众义愤填膺，一些美国人还是左右为难。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摆脱外交困境，专注于国内发展，这将给美国自由经济带来空前繁荣。

毛泽东把这种大众心理认定为厌战情绪。于是，他一方面在整个亚洲加大宣传攻势，把美国说成“纸老虎”；另一方面，他继续向美国政府挑衅，宣布将扣留更多美国战俘，看看美方如何回应。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决定按照赫鲁晓夫战争指令，对台湾发动攻击，向全世界证明美国的无能。就在短短几周内，中共密集轰炸了掌控在蒋介石手中的近海岛屿，这是对台湾全面进攻的前奏。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已经承诺保卫台湾。如果美国动摇了，东南亚的自由之光，很可能就此熄灭。此外，五亿中立的亚洲民众也在密切观察，看美国领袖到底如何评估风险，又会如何拷问自己的道德信念。

1955年2月初，中共和世界其它共产党得到了答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两党支持的决议，授权美国总统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下令在遭到攻击时，发动全面战争。这自然包括使用核武器。

东南亚的小国们群起欢呼。显然，美国不仅有“大规模报复”的意愿，而且还真的会这么做！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几个小国大胆指责中共的“共产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侵略”。这无疑对毛泽东的宣传战和他莫斯科后台的威信是一记重击。

几周之内，美国和太平洋盟国的坚定立场开始结出神奇的果实。莫斯科发出命令，“和平共处”再次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共开始释放他们非法扣押的美国战俘；

台湾问题已被悄然淡忘；赫鲁晓夫还向美国发出了互访的邀请，连媒体编辑、国会议员和农民都包括在内。他本人表示，可能会访问美国。战后弥漫全球十年的紧张气氛开始消散。面对这些出人意料的转变，全世界都似乎感到满意，民主国家再度回头，安心专注于国内事务。

就在看似世界岁月静好之时，军事情报部门却发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警。一份报告说，苏共虽然在国外对民主国家宣扬软政策，在国内却仍然向军队灌输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苏共教导军队说：“在现代战争中，突袭的重要性已大大增加。”并且“共产党要求我们陆海军全体官兵，必须保持极度警觉和持续战备，以便能够先发制人，发起猛烈攻击，并最终彻底击败敌人。”^[149]

这些话让很多人觉得耳熟。警觉的美国人回忆起1949年，代表苏共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Z. Manuilsky），就曾在莫斯科的列宁政治战争学院这样教导人们：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要想获胜，我们需要出其不意，必须让资产阶级觉得高枕无忧。所以，我们将首先发起有史以来最轰轰烈烈的‘和平运动’。到时候，我们将有激动人心的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妥协。愚蠢而又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再次抓住成为朋友

的机会，并欢欣鼓舞的参与自我毁灭的过程。一旦他们
放松警惕，我们就会用紧握的铁拳摧毁他们！”^[150]

第九章

赫鲁晓夫的共产革命

1955 年，莫斯科的局势已经显而易见。为争夺斯大林的宝座，苏联共产党人正在进行残酷的权力内斗。贝利亚和他的助手已被处决，幕后出现了权力大转移的迹象。就在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喧嚣之中，赫鲁晓夫爬上了权力之巅。

在苏联高层的权力竞争者中，西方最陌生的可能就是赫鲁晓夫了。所以，美国国会委员会决定搞清楚他的来历。他们邀请所有认识赫鲁晓夫的人出庭作证。证人们络绎不绝，讲述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丑陋不堪。西方外交官们一旦了解了这位共产领袖，他们改善和苏联关系的希望就瞬间破灭了——赫鲁晓夫不是普通的共产政客或党内打手，而是一个凶狠狡诈、无限渴望权力的野心家。

“乌克兰的刽子手”

证人们揭露了赫鲁晓夫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苏共高官

的。他们说，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盲目而又不理性的。他在成长期间几乎是个文盲，直到成年后才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小时候是个牧羊人，后来成为了铁匠和锁匠。

189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出生在偏远的乌克兰村庄卡利诺夫卡（Kalinovka）。17岁时，赫鲁晓夫逃离了那里。有几年时间，他四处漂泊打工。1918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在苏联内战期间参加了红军。直到1922年，他才开始接受为期三年的正规教育。1929年，他获得了斯大林工业学院的入学资格。到1931年，他已经成为了莫斯科的地方官员。

很快，赫鲁晓夫就赢得了斯大林的好感。因为他加入了地方党组织清洗斯大林敌人的行动。有超过500多人被秘密警察处决。斯大林后来说，虽然他讨厌赫鲁晓夫，但在党的政策需要时，这位乌克兰人杀害或背叛老朋友的能耐却让他印象深刻。所以，斯大林指派赫鲁晓夫回到乌克兰，强迫当地人民生活在共产党的铁腕镇压之下。此前的红军领导人一直使用大规模处决来压制反抗。不过，赫鲁晓夫说他有更好的办法——大规模饥荒！亲历这场人为饥荒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悲惨情景：

普里乔多科（Nicholas Prychodoko）：“我在基辅看到有篷马车，在我居住的街道和其它街道上行驶。

他们拉着尸体去处理……涌入城市的这些人，是为了得到一点面包皮的农民……我的朋友……是乌克兰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给我穿上一件和他一样的白大褂，然后，我们来到医院外面，走进一个很大的车库。当他打开灯时，我看到墙边躺着 2,000 ~ 3,000 具尸体。”

阿伦斯先生 (Mr. Arens)：“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普里乔多科：“饿死的。”

阿伦斯先生：“为什么会饿死呢？”

普里乔多科：“……我们在科学院地下室的隐蔽处，找到了一些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显示，1932 年收获的粮食，足够所有乌克兰人吃 2 年 4 个月。但是，（共产党）只留下了大约 10% 的粮食，其它粮食一从脱粒机出来，就直接运往乌克兰以外的地区。这就是造成饥饿的原因。”

阿伦斯先生：“那一时期，为什么共产政权要抢走乌克兰的粮食？”

普里乔多科：“因为乌克兰人无时无刻……都在抵抗共产政权，包括莫斯科推行的集体化运动……”

阿伦斯先生：“在 30 年代，乌克兰的这场人为饥荒，饿死了多少人？”

普里乔多科：“估计有 600 ~ 700 万，其中大部分是农民。”^[151]

目击者证实，在赫鲁晓夫的铁腕统治下，饿死了几百万人的乌克兰终于建立起集体农场。1934 年，赫鲁晓夫得到了奖赏——斯大林提拔他进入莫斯科共产党高层，成了权力很大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然而，由于持续的动荡和人民对共产政权的抵制，1938 年，赫鲁晓夫又被派回乌克兰，在当地实行独裁统治。乌克兰人再一次遭受大规模镇压，所以对共产党极其憎恨，以至于在二战爆发，德国军队踏入乌克兰时，乌克兰人把他们当作解救者来欢迎。

赫鲁晓夫对此耿耿于怀。在逃往莫斯科之前，他对乌克兰人疯狂报复。官方报告显示，德军在乌克兰发现了大量的集体坟墓。仅在一个地区，就有超过九十个巨大坟场，埋葬了约一万具农民、工人和神父的尸体。每具尸体的双手都被反绑，头部中弹。

1944 年，德军被赶走后，赫鲁晓夫再次回到乌克兰。他铁了心要消灭所有“通敌分子”。大批人口被流放，主要教会被清除，民间领袖被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以可怕的凶残手段恐吓人民，消灭对共产党重新占领的一切抵抗。赫鲁晓夫因此被民众称作“乌克兰的刽子手”。

到了1949年，赫鲁晓夫已经展现了对斯大林的无比“忠诚”。所以他又被调回莫斯科，担任大权在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接下来，他被委以重任，设法让低效的集体农场提高粮食产量。赫鲁晓夫继续用恐怖手段逼农民多干活，多产出，但枉费心机。他筹集的粮食只能让人民勉强糊口。这就是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的处境。

赫鲁晓夫的夺权之路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他给他的共产党同志们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每位党领袖都紧盯着竞争对手，掂量着夺权的可能性。赫鲁晓夫立即开始布局，以争取到有利的战略位置。在苏联内外，赫鲁晓夫都被认为处于“权力图腾柱”的最底层。

实力第一的是斯大林的秘书马林科夫，他掌控着共产党的所有秘密档案。据说他收集了很多人的罪证，所以人们都讨好他，推举他为临时政府首脑。

排在第二位的是贝利亚，他是令人憎恨的秘密警察头目，也是核开发计划的管理者，拥有两百万武装人员的强大势力。

排在第三位的是莫洛托夫，他是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也是苏联有史以来最精于算计、最善于欺骗的外交家。

排在第四位的是布尔加宁，他是共产党在军队的官方代表，也就是军方政治领袖。

排在第五位的是赫鲁晓夫，他是国家集体农场负责人。

许多人并没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大腹便便、头脑顽固的打手。但赫鲁晓夫却挺把自己当回事。他拼命争取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他的招数和共产党的老把戏——“分而治之”恰恰相反，是“先团结再征服”。

首先，他和总理马林科夫结盟。他说服马林科夫相信，贝利亚是他最大的威胁和敌人。1954年1月，贝利亚和其同伙被处决。

随后，赫鲁晓夫又和布尔加宁联手，要除掉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对这位大胡子军队政治领袖说，他布尔加宁应该当总理，而不是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欣然同意。不久，幕后权力发生了转移，布尔加宁在1955年春，取代了马林科夫。

下一个倒台的是莫洛托夫。他没有强大势力作为后盾，只能依靠他作为斯大林搭档的威望。不久，他发现自己被流放到了蒙古边境。

现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的权力联盟，掌控了整

个共产党阵营。但赫鲁晓夫的野心并没有满足。他的下一步，是说服布尔加宁逼二战名将朱可夫元帅退休，并且把其他重要政府官员降职。其中一些官员，正是前些年帮助赫鲁晓夫晋升的人。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赫鲁晓夫认为，要同时铲除他的朋友和敌人，防止他们东山再起，用和他一样的手段推翻他。

最后，赫鲁晓夫使出了绝招——废掉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迫使布尔加宁排挤朱可夫元帅，在他和他的后盾红军之间制造了隔阂，于是赫鲁晓夫趁虚而入，用自己的亲信填补了重要职位。

到了 1956 年，布尔加宁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傀儡。又过了两年，赫鲁晓夫通过布尔加宁控制政府。但谁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已经毫无悬念。

就这样，赫鲁晓夫靠着阴谋诡计，步步为营，爬上了苏共的权力巅峰。但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些内斗和权力转移，并没有解决苏联持续的经济困境。在中国、苏联和其它卫星国，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共产主义是成功的。三年多来，苏共控制的国家不断发生起义，以至于不得不在这些国家部署重兵。

就在 1956 年赫鲁晓夫权力巩固之际，一个重要的卫星国想挣脱枷锁，为自由而战。

1956 年匈牙利革命

在二战期间，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斯大林曾承诺，任何在战争期间受红军控制的国家，在战后都能享有自由选举和自治权。匈牙利就是第一个要求自治、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

也许再也没有比匈牙利革命，更能展现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到极点的了。

1956 年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几千名市民走上街头，希望摆脱苏联的殖民统治，自由选举民主政府。当人群拒绝解散时，苏联秘密警察奉命开枪，由此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在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中，布达佩斯的自由战士正准备把国旗在拆毁的斯大林雕像底座上竖起。

([Pestisrác2/commons.wikimedia.or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stisrác2))

第一个重大行动是推倒了斯大林巨像，这是苏联霸权的象征。随后，自由战士们在残破的底座上升起了匈牙利国旗。苏联占领军立即奉命前来镇压，但他们遭到了起义的匈牙利部队抵抗，这些共产党训练的部队也成为了自由战士。许多苏联占领军也选择了叛逃。在5天内，起义军就击败了残余的苏军。基拉伊利（Bela Kiraly）将军描述了接下来的情况：

“为了避免苏军被歼灭，赫鲁晓夫本人策划了一场极其狡诈的行动。他向布达佩斯派来第一副手米高扬（Mikoyan）和党内高层苏斯洛夫（Suslov）。这两个苏联人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坐下来商谈，很快发现苏联已经被打败了。在通过电话和赫鲁晓夫交谈后，经赫鲁晓夫批准，他们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外交行动进一步推进。接下来的谈判目标，是如何撤离苏联军队，并如何恢复匈牙利的国家独立。”^[152]

苏联代表建议，双方到布达佩斯南部托科尔村的苏军总部商定最终细节。于是，匈牙利代表团应邀前来，准备讨论苏军离开匈牙利的确切日期。他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抵达苏军总部，却惊讶地发现，他们被围捕、监禁起来。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下令，发动对匈牙利的新一轮全面进攻。

苏联这次动用了5,000辆坦克和25万士兵。他们

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罗马尼亚蜂拥而至。1956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发出绝望的呼救：

“全世界人民，请倾听我们的呼唤！帮帮我们！请不要忘记，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进攻不会停止，你们可能就是下一个牺牲品。救救我们！紧急求救！紧急求救！”^[153]

过了一会儿，电台广播又说：

“文明世界的人们，我们以自由和团结的名义，请求你们伸出援手。我们的船要沉了，光明消失了。阴影每时每刻都在加深。请聆听我们的求救，愿上帝和你们同在——也和我们同在。”

声音戛然而止，电台再也没有出声。

当历史学家回忆那些悲惨的日子时，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自由西方的良知何在？联合国在哪里？北约的军队在哪里？1945 年联合国在旧金山做的冠冕堂皇承诺又都在哪里？

“……为了让子孙后代免遭战争之祸害。”

“……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和大小国家平等权利的信念。”

“……建立对条约义务的尊重。”

“……确保不使用武力。”^[154]

最终，对成千上万匈牙利人的屠杀，镇压了他们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总理伊姆雷（Imre Nagy）被处决，其他大多数革命领袖被押往苏联，从此音讯全无。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大使洛奇（Lodge）提出了一项决议，建议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暴行，但苏联否决了这个决议！

这个令人震惊且背信弃义的事件，是由赫鲁晓夫亲自操盘的。他公然违反了《雅尔塔协定》、《华沙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前两条，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挑战。而西方阵营也没能抓住这一绝佳机会，有勇气把苏联踢出联合国，兑现联合国的庄严承诺。

恰恰相反，联合国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收集事实，编写报告，然后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这就让亲苏势力有了更多机会，在联合国内暗中操作，进一步掩盖了苏联的暴行。普通美国人很难想象，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渗透有多么严重。

丹麦外交官邦 - 延森（Povl Bang-Jensen）说，在他开始担任这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就开始感受到共产党的强大压力。^[155] 不仅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蔓延而来，就连委员会的许多同事也对他施加影响。

邦 - 延森不知道该向哪里求助。最后，他开始给委员会和秘书长写信抗议。他指出了报告中的错误，这将会让苏联人得以诋毁报告，而委员会主席却拒绝纠正这些错误。一些重要事实被悄然抹去。而这些事实本可证明，苏联政府对匈牙利事件负有官方责任。他还指出，委员会对卡达尔（Janos Kadar）态度软弱，他是匈牙利的新共产傀儡政府领导人。

最令邦 - 延森愤怒的是，秘书长竟要求他公开匈牙利证人的秘密名单。他曾被书面授权向证人承诺，绝不会披露他们的身份，以免给他们在匈牙利的家人带来残酷的报复。邦 - 延森遵守了这一承诺。他声明，交出名单将有可能使信息泄露给苏联人，联合国内部已有风声，苏联间谍正企图用巨额贿赂获取这份名单。

突然间，邦 - 延森发现联合国秘书处和调查委员会开始对他人身攻击。联合国高官不但不去处理实际问题，反而说邦 - 延森是精神病患者。

三位驻联合国的美国高级雇员也参与了攻击。他们是：科迪埃（Andrew Wellington Cordier），他曾是希斯的助手，已晋升为联合国二号人物；格罗斯（Ernest A. Gross），曾促使美国承认中共政权；还有联合国副秘书长邦奇（Ralph Bunche），他是最早在官方备忘录中，给邦 - 延森贴上“精神病”标签的人。

渐渐地，邦 - 延森感到无力抵抗这股来势汹汹的反对力量。当联合国官员无法迫使他公开匈牙利证人的秘密名单时，他被命令当着联合国代表的面，销毁这些名单。他照做了。然后，他就被解僱了。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继续对他施压，发出的诋毁性报告，使他无法获得几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有段时间，邦 - 延森担心可能会遭到暗杀。他曾是二战中的丹麦地下战士，与纳粹和共产党作战。他熟悉如何把暗杀伪装成自杀。所以，他在 1957 年 11 月 30 日，给妻子写了以下字条：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这有悖于我的天性和宗教信仰。如果发现任何我亲笔书写的相反内容的字条，那一定是假的。”

1959 年感恩节那天，人们在离邦 - 延森家两英里的僻静处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部中弹，身边有一把手枪和一张有潦草字迹的纸条。

他在 72 小时前，离家前往公共车站。验尸官发现他刚死了几个小时。在他还活着的那两天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专业调查人员怀疑是谋杀，而且是精心策划的，故意伪装成了自杀。但是，官方最终认定为自杀。许多人

并不信服。

此时，联合国对匈牙利事件的调查早已完成。经过删节、歪曲和掺水的报告，已经提交联合国，并得到了大会的认可。

不断下滑的苏联经济

共产党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其残暴程度无与伦比。他们只有一个微弱的借口，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承诺的，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类更美好生活的捷径。共产党绞尽脑汁，想为自己的信仰寻找切实的证据。但事实真相是：经过 100 年的斗争，带来的却是悲惨而枯燥的生活。

对苏联经济一项为期 5 年的分析，揭示了一个足以让共产党羞愧的事实：在他们统治的 40 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如过去 400 年的君主统治时期。^[156]

尽管通过从西方窃取技术，绑架被打败敌国的科学家，使苏联在技术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苏联在大规模生产方面，仍无法和资本主义竞争。这一直是共产领袖们的心中之刺。

1955 年之后，美国人终于获准访问苏联。人们发现，社会主义体制浪费了大量人力。往往是有一个人在工作，

就有另一个人袖手旁观。为了调动工作积极性，苏联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工作激励机制。即便如此，僵化的计划经济仍然束缚着生产效率。

对这类问题警觉的美国游客注意到，赫鲁晓夫正在使用童工来弥补产能不足。苏联政府承认，它正在招募学生到农场和工厂工作。赫鲁晓夫宣布了他的计划，让大多数苏联青少年只接受七到八年教育，并且大部分教育将在夜间进行。只有极少数杰出的学生才能上大学。^[157]

至于集体化农场，即使苏联一半人口劳动，也只能让人民勉强糊口。而美国只靠 12% 的农民，就能产出国内吃不光也卖不完的食物，这让赫鲁晓夫等共产农业专家目瞪口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时常抨击苏联疲软的农业计划。以下是他在 1955 年演讲中批评苏联农业的话：

“生产进度滞后，管理极其混乱”；

“国营农场不能完成增产计划”

“草料田不能及时收割”；

“没有修建粮仓”；

“种子问题出现了糟糕的状况”；

“拖拉机都设计六年了，但至今还没有成果”；

“许多集体农场没有使用机械”

“国营农场混乱不堪”；

“有破坏卡车和拖拉机的案例” “旷工”；

“上交到国家的牛营养不良”；

“养猪业有严重问题” “牛奶产量下降了 10%”；

“能产犊的母牛仅占 34%”；

“肥猪体重和羊毛产量都减少了”；

“美国的畜牧业取得显著成就”；

“在美国，玉米产量世界最高”。^[158]

这就是赫鲁晓夫放弃五年计划改为七年计划的原因。他期望能在 1965 年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但刚到了 1961 年，赫鲁晓夫就对苏联农民发出了咆哮——农业产量已连续五年下滑！^[159]

火山口上的赫鲁晓夫

1958 年，赫鲁晓夫正式宣布，自己是苏共领袖和苏联最高统治者。然而，他不得不面对一些无情的事实：

冷战进入僵持阶段，铁幕被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

的核防御基地包围，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

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变得越来越挑衅、挑剔和独立；

为了维持铁幕后的围城状态，展现国内安宁的假相，需要六百多万士兵和秘密警察；

苏联在联合国的影响力逐渐消退，承受着西方联盟的压力；

卫星国持续动荡。由于当地军队可能像匈牙利那样起义，必须在各卫星国驻扎大量红军；

红军内部也军心不稳，对赫鲁晓夫无情排挤朱可夫元帅依然心存怨恨；

赫鲁晓夫只部分开放了国际市场，让中苏集团购买他们计划经济不能自产的商品。但他还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没钱支付外贸款项，因为经济始终处于破产的边缘。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赫鲁晓夫还时刻面临着被推翻的威胁。那些心怀不满的共产领袖们，也可能会像他赶走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那样，把他赶下台。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决心通过迫使美国邀请他访问来实现这一目标。

给美国设圈套

自 1955 年以来，赫鲁晓夫一直想受邀访美，却屡屡碰壁。为了达到目的，他决定在柏林制造一场危机。

1958 年，他向美国及其盟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限定日之前撤出西柏林。否则，他将放任东德共产党发起攻击。

这一要求公然违反了所有现行条约。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宣布，任何强迫我们撤出柏林的企图，都将面临军事反击。赫鲁晓夫立即表示，他并不真心想要打仗。他认为只要他亲赴美国和总统商谈，双方就可以友好解决。他还多次表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苏联。

最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表示反对。邀请这位共产独裁者到美国来，正是杜勒斯国务卿至死都在警告的风险。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访问可能会让赫鲁晓夫亲身感受到美国的强大，使他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

此外，艾森豪威尔也相信，美国总统访问苏联，可能会带来很多好处，这将进一步推动自己倡导的“民间外交”计划。所以，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了正式邀请，使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美的苏联独裁者。

赫鲁晓夫访美之行

研究共产主义的美国战略家们立即警告说，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几位专家还到国会委员会作证。里昂（Eugene Lyons）曾任驻苏联记者，是赫鲁晓夫传记作者、《读者文摘》的高级编辑。他把对赫鲁晓夫的邀请，称为“共产主义的巨大胜利”。

他说：“这沉重打击了共产世界抵抗运动的士气，是对其内部亿万反共人士期望的背叛。”“宣布邀请那天，对几千万苏联人民和卫星国家的几乎所有人民来说，是一个悲观和绝望的日子。”^[160]

当问到赫鲁晓夫访美，是否会让他放慢甚至放弃征服世界的计划时，里昂回答说：

“这是一个幼稚的童话。共产高官对我们的物质繁荣和政治自由了如指掌。赫鲁晓夫来这里，不是要验证我们的实力，而是要摸清我们的软肋。如果认为他会被我们的富裕和自由所震撼，从而收敛共产主义的扩张野心，那是政治幼稚到了极点……这位苏联新老大，尽管外表看似粗俗，却是现存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他是在尸山血海中攀上权力巅峰的。那些铺红地毯欢迎他的人，不久之后将会面红耳赤。”^[161]

甚至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美国人也在他的自吹自

播、陈词滥调和提议以《圣经》起誓之间，多次听到他的咆哮和冷酷的威胁。媒体注意到，他对以下提问非常敏感且易怒：

在他最近大肆鼓吹“自决”之后，却非法残酷镇压了匈牙利起义；

关于他被称为“乌克兰刽子手”的提问；

关于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的问题；

关于卫星国成千上万难民不断逃亡的问题。

共产势力扩张愈演愈烈

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计划，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迅速推进。美国共产党大胆走向前台，招兵买马。它公开攻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如果它能成功摧毁这个委员会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解散联邦调查局。

好莱坞的共产党员被定罪后，又重返电影之都，开始毫无顾忌地编剧和制作，通过耗资巨大的电影宣传共产主义。美共主席还宣布，将发起全国性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共产势力的扩张，在全球也愈演愈烈，从日本到东南亚，从印度到非洲，再到古巴、中美洲和南美洲，共产浪潮不断蔓延。杜勒斯和里昂等战略家的可怕预言果然成真。

不过，这次访美对赫鲁晓夫来说也是双刃剑。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回访，也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前尼克松副总统访问苏联及其卫星国时，赫鲁晓夫对他受到的热烈欢迎还记忆犹新。

赫鲁晓夫知道，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够像他在美国那样，在广播、电视、公开会议和新闻采访中享有言论自由，那么亲共浪潮就可能被逆转。赫鲁晓夫绝望地四处寻找借口，以取消艾森豪威尔的访问。就在这时，就像共产党早有预谋一样，一个绝佳的借口从天而降，落到赫鲁晓夫眼前。

U-2 侦察机事件

1960年5月1日，美军飞行员鲍尔斯（Francis G. Powers）驾驶一架没有武器的U-2喷气式侦察机，在深入苏联境内1,200英里处被俘。共产领袖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们用一枚神奇的新型防空导弹击落了它。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苏联人展示的飞机并

没有受损。而且美国监测人员报告说，他们听到了苏联飞行员迫使侦察机降落的通信。政府官员透露，U-2 侦察机迫降的原因是引擎熄火。

这一事件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美国人习惯于从事间谍活动，当鲍尔斯被俘时，他们不知所措。起初，美方说 U-2 是一架可能偏离航道的气象飞机；最后美方笨拙地承认，这架飞机确实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拍摄苏联导弹基地的照片。

赫鲁晓夫假装义愤填膺，抨击美国领袖“不道德”的间谍活动，谴责 U-2 事件是侵略行为。他还立即宣布，取消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几天后，他又利用 U-2 事件，破坏了巴黎峰会。

与此同时，美国大众向华盛顿提出了许多问题：

- 这是一次孤立事件，还是多次侦查飞行的其中之一？
- 这种行动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 这种行动起到了什么作用？
- 为什么苏联人过去没反对这种行动？
- 美国是继续侦查还是叫停？

由于苏联已经缴获了 U-2 飞机和机上的所有设备，美国政府觉得，应该把这一秘密公之于众了。原来，这次侦查行动只是 200 多次侦察任务之一，目的是绘制苏联的攻击战备进程图。这个计划已经在苏联和中国上空，运行了 4 年多。

据透露，美国早在 1956 年就已经得知，共产领袖正式通过了一项大规模偷袭计划，作为苏联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于是，美国就在一直派遣 U-2 侦察机到苏联上空侦察，高度在 12 到 14 英里之间，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喷气式战机或防空导弹攻击的射程。

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吗？由于苏联拒绝谈判任何事关领空的国际法，所以这些飞行并不违法。著名记者林德利 (Ernest K. Lindley) 总结了国务卿赫特 (Christian Herter) 的看法：

“一个国家的主权延伸到地表以上的高度，从来没有达成国际协议。传统的规则是，可延伸到它能够有效控制的最大高度。根据这一规则，只要 U-2 的飞行高度在苏联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之外，就不算违法。”^[162]

那么，U-2 侦查的效果如何呢？国防部长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从这些飞行侦查中，我们掌握了有关机场、飞机、

导弹试验和训练、特种武器储存、潜艇制造、原子弹生产和飞机部署等重要情报。”^[163]

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空军透露，这是用高精度摄影设备创造的奇迹。它能从距地面 9 英里的高空拍摄高尔夫球场，公开的照片清楚的显示了绿地、汽车、俱乐部会所和球员。照片说明写道：“连高尔夫球也能被图像分析专家清晰辨认。”^[164]

但是，苏联和中国幅员辽阔，又该如何有效覆盖这么大的区域呢？空军揭示了这个谜底：这种设备不仅精度极高，而且覆盖面极广。两架携带这种特殊照相机的喷气式飞机，可以在 4 小时内拍摄美国三分之一的领土！

赫鲁晓夫在猛烈抨击 U-2 事件时，不小心说漏了嘴——他知道这些飞机已经有三年多了。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不早提出抗议呢？专家分析说，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戳穿苏联的防御坚不可摧的谎言宣传。他一直吹嘘，苏联的雷达、喷气式战机和防空导弹，可以阻止任何国家对苏联的攻击。

U-2 侦查机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的防线是敞开的，对大规模报复性攻击毫无防备。赫鲁晓夫在得到这架 U-2 飞机之后，声称是苏联人击落了它。他们甚至成功地让鲍尔斯在莫斯科审判时承认，他是在 6.8 万英尺高

空被击落的。但当他父亲从美国来看他时，他却说没有被击落。这似乎证实了华盛顿军方的说法——苏联人的战机和防空导弹，达不到这个高度。

至于未来 U-2 的飞行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决定不再进行。但他明确说，这并不是因为飞行非法或不合理，而是因为美国很快有其它手段收集苏联情报。

1960 年 5 月 23 日，美国成功把第一颗人造卫星迈达斯号(MIDAS)，送入太空轨道。这颗卫星搭载了 3,000 磅技术设备，能够侦测全球任何地方的导弹发射活动。

几个月后，美国又发射了萨莫斯号(SAMOS)人造卫星，它专门设计用来拍摄苏联和中国。它在 300 英里高空，每 94.5 分钟绕地球运行一圈。当然，要从这个高度获得清晰的影像，需要相当高超的摄影技术。美国空军透露，萨摩斯卫星上的高精度相机，能够捕捉任何面积超过 1 平方英尺的物体。

苏联击落美国 RB-47 侦察机

1960 年 7 月 1 日，一架美国 RB-47 侦察机，在苏联北方的巴伦支海上空失踪。一连几天，苏联都假装在帮助搜寻，后来直截了当地承认，飞机被他们击落了。除两人外，机上其他人员全部遇难。苏联人说，他们将

两名幸存者作为囚犯关押。

美国震惊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苏联发出任期中最愤慨的抗议。苏联辩解说，击落这架侦查机，是因为它像 U-2 一样侵犯了苏联领土。美国大使斥责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架侦查机一直在英国电子监控之下，美国有证据证明，这架侦察机从未接近苏联边境 30 英里。

当年 7 月 26 日，美国要求联合国进行公正的调查，以确认这次非法袭击事件不可饶恕的责任。袭击导致四名美国人丧生，两人被劫持。

这项要求提交后，安理会普遍同意调查，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信誉。但调查并未进行，因为苏联行使了否决权！意大利代表随后提出动议，要求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探访两位幸存者，同样遭到苏联否决。

大多数美国人都忽略了联合国渎职的严重后果。苏联再次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前两条规定，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媒体和公众也没有特别抗议，也没有全面呼吁把苏联赶出联合国；更没有人强烈要求彻底审查联合国的机制。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里，孩子们还在继续学习——联合国是人类和平正义的唯一希望。

美苏太空竞赛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 1 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 1），并把 184 磅有效载荷送入轨道，震惊了世界。它是用二战后从美国窃取的设计建造的。

面对挑战，美国立即奋起直追。不过，美国导弹专家选择的是广泛的实验性研究，而不是像苏联人的单点突破策略。美国的做法很快就显出成效。苏联继续发射更重的有效载荷，但美国却能获得更优质的科学数据。渐渐地，美国的卫星和导弹团队开始领先。

到 1960 年 4 月 1 日，美国成功地把“提洛思 1 号”（Tiros I）太空飞行器送入轨道。它在 450 英里的高度，每 99 分钟绕地球一周。它装有太阳能电池，可由地面来控制上面的相机传送天气变化的图片。这是当时最成功的太空拍摄器。

1960 年 8 月 11 日，美国首创，把重达 300 磅的卫星舱从太空脱轨，重返大气层；第二天，美国又把一个 10 层楼高的充气球送入太空，它被称为“第一个无线电反射镜”，用于建立一个巨大卫星通信网；当年，美国还首次从水下潜艇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这意味着苏联再也无法偷袭西方，因为美国可从海上移动的导弹

基地进行大规模反击。

美国期待已久的迈达斯号和萨莫斯号卫星，也分别在 1960 年和 1961 年初进入轨道。美国官方透露，未来的卫星将携带红外感测器，能够探测到共产党的原子弹爆炸和弹道导弹发射，还能追踪导弹飞行的轨迹。

随着美国的科技已经逐渐接近把人类送入太空，载荷的大小也日益受到重视。美国承诺，将在 1963 年左右发射一颗 15 吨重的卫星。不过，专家们进一步承诺说，在此之前就会有美国人进入太空。

在未知的苏联太空计划激励之下，美国全力以赴投入了太空竞赛。到 1961 年的时候，成绩已经相当显著：

卫星	美国	苏联
发射总次数	32	7
仍在轨道上	16	1
仍在太阳系轨道上	2	1
仍在传输信息	9	0
发射月球探测器	0	1
从轨道回收	4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非洲的刚果和美洲的古巴。

第十章

共产党祸乱刚果和古巴

1960 年的局势清晰显示，共产党正在按时间表征服非洲。早在 1953 年，共产领袖就许下诺言——到 1960 年代，“革命浪潮将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很快就会被赶进海里。”^[165]

但是，到了 1960 年，拥有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正在积极用和平手段，准备让当地人民实现独立和自治。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将让他们的征服计划彻底失败。

共产领袖们很清楚，任何秩序良好的本土政府都会抵制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他们决定，要在当地人还没真正准备好自治之前，就煽动他们马上要求独立，在由此造成的混乱中，共产党就可以趁机掌权。这正是非洲局势的发展方向。

卢蒙巴上台

1960 年，在非洲比（比利时）属刚果发生的一连

串事件表明，把自治权交给尚未准备好的原始民族，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由于比利时早已承诺，当地人将在1964年之前获得独立，所以，他们的暴动与其说是为了独立，不如说是为了追求“马上自由”。

要了解事件的全貌，我们需要追溯到75年前——比利时人刚进入刚果的时候。当时的刚果，由大约120个食人部落组成，他们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最底层。

到1960年，比利时人在这个非洲的中心创造了大量财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加丹加省（Katanga，也译作卡坦加）。这个省生产了世界上75%的铜、60%的钴、大部分的镭，以及大量的铀和锌等金属。

比利时人和英法两国一样，也希望通过培养当地人的技能，让他们逐步承担起稳定政府的责任，从而实现当地人自治。只要新政府管理有方，商界领袖和投资者也愿意承担政府过渡的风险。在这种相当友好的氛围中，双方同意刚果在1964年独立。比利时人承诺，将为新成立的政府提供宽松的贷款，还答应让他们的公务员和当地人一起工作几年，直到他们能够安全接管为止。

没想到的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从刚果圆桌会议冲了回来，就高喊着当时共产党的口号：“马上独立，马上！马上！”卢蒙巴曾是斯坦利维尔市的邮

局职员，在捷克布拉格的共产党特别学校受过培训。他有一个兄弟住在莫斯科。卢蒙巴很快就成为刚果最左翼的政治派别领袖，并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比利时官员发现，卢蒙巴的要求语带威胁，而且有爆发类似阿尔及利亚内战的可能。所以，比利时突然决定，在1960年6月30日实现刚果独立，不再等到1964年。

比利时人以为，这样卢蒙巴就会满意了，所以就在既定日期把政府交给了他。但是，卢蒙巴刚一就任总理，就立刻对白人，特别是比利时人猛烈抨击。预先安排的和平过渡机制，一夜之间就彻底崩溃了。

刚果红祸

刚果军队领会了卢蒙巴透露的意思，迅速发动兵变反抗白人上司。很快，他们变成了一群疯狂暴徒，在主要城市的白人区肆虐，殴打、抢劫、强奸。随着暴力的蔓延，白人居民在恐惧中逃离了刚果。有些人暂时躲避在大使馆里，有些则赶往机场。仅在雷堡(Leopoldville)市，医生们估计，在逃往机场的妇女中，至少有四分之一被强奸，有些人甚至被强奸了十几次。

在白人撤离之后，刚果的政府、学校、医院和商业

服务，几乎全部停摆。尽管刚果人的识字率在非洲名列前茅，但整个刚果却没有一个本地工程师或医生，大学毕业生也寥寥无几。

为了避免刚果全面崩溃并保护白人逃离，比利时政府调来了伞兵。但是，卢蒙巴把他们视为敌人，要求联合国也空降部队。可是，联合国部队刚刚抵达，卢蒙巴又转而拒绝，邀请赫鲁晓夫派共产党部队接管刚果。

很快，苏共的飞机、卡车、设备、技术人员和宣传人员陆续到来。卢蒙巴开始实行土地集体化，并组建军队，赶走了联合国和比利时的军队。然后，他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共产独裁者一样，对刚果人民实施种族灭绝。在开赛（Kasai）省，卢蒙巴的部队消灭了巴卢巴斯（Balubas）部落，而卢蒙巴的堂兄、安全部门头目奥莫农贝（Omonombe），亲自指挥了对巴克万加（Bakwanga）部落的大屠杀，并且阻止救援妇女、儿童或伤员。^[166]

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继续支持卢蒙巴，把他视为刚果政府的合法首脑。

但是，刚果人民受够了，他们觉得自己被出卖了。9月5日，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总统向全世界宣布，罢免卢蒙巴的总理职务。就在同一天，卢蒙巴

的部队也开始强烈反对他。陆军总司令蒙博托（Joseph Mobutu）把虚张声势的卢蒙巴关进了监狱，并且让他的共产党信徒马上离开刚果。

奇怪的联合国

此时，大部分人都觉得情况在好转。但是，让刚果人和外界观察家惊讶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却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卢蒙巴说情。敢做敢当的加丹加省长冲伯（Moïse Tshombe）质问他：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起初，哈马舍尔德派到刚果的代表，是美国黑人邦奇（Ralph Bunche）博士，他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但是，邦奇无法让刚果人接受卢蒙巴的共产统治。于是，他被撤换了。接替他的是一位来自印度的联合国官员，名叫达亚尔（Rajeshwar Dayal）。

时间不长，卡萨武布总统就对达亚尔的政策同样震惊。1961年1月，他给哈马舍尔德写了两封信，恳求联合国解除达亚尔的职务，因为他严重“偏袒”。

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初，卢蒙巴的部队在刚果中部、北部肆虐。媒体报道了强奸修女和其它针对白人的暴行。1961年2月初，突然有消息说卢蒙巴已经

逃离加丹加，想到刚果中部和他的部队会合。由于卢蒙巴是共产主义和暴力的象征，冲伯重金悬赏捉拿他。几天后，他被当地人抓获并处决。

莫斯科随即发出强烈谴责，联合国也爆发了一连串抗议。卡萨武布总统和冲伯省长不明白，在卢蒙巴给刚果造成血腥浩劫之后，为什么这位联合国秘书长仍然对卢蒙巴深表同情。

当哈马舍尔德强迫卡萨武布总统成立共产党联合政府时，刚果人大吃一惊。这正是使东欧国家沦为苏联卫星国的手法。联合国官员还强迫冲伯终止和比利时人的关系，解僱他的比利时顾问。这让冲伯更加愤怒。他谴责说，哈马舍尔德赶走比利时人的目的，就是想实现联合国夺权。

冲伯果然言中了。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指挥联合国部队进攻加丹加，导致冲伯被迫下台。取代他的，是共产领袖的得力助手吉赞加（Antoine Gizenga）。

然而，冲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战斗口号鼓舞人心，开始反抗联合国的征服行动。就在此时，哈马舍尔德飞到非洲，想在他支持的政权被推翻之前达成停火协议。然而，在飞往加丹加的途中飞机坠毁，哈马舍尔德身亡。

在华盛顿特区，参议员多德（Thomas A. Dodd）在参议院揭露说，哈马舍尔德的行动，已经把刚果变成了共产党的集中营。他谴责国务院用美国人的钱支持联合国去征服刚果，这是一个重大错误。^[167]

在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中，许多美国人误以为联合国在保护刚果不被共产党接管。他们的根据是，赫鲁晓夫一直猛烈批评哈马舍尔德的刚果行动计划。

但现在看来，赫鲁晓夫和哈马舍尔德之间的争斗，并不是共产党接管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在推动这个目标。他们之间的实质矛盾在于，一旦共产党在刚果掌权，由谁在背后说了算。

就在全世界都聚焦刚果事件之时，一幕更加剧烈的变局，正在距离美国海岸 90 英里的古巴上演。

是“救星”还是“灾星”？

1960 年，美国人震惊地看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扒掉了“古巴华盛顿”的伪装，得意地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一个铁杆共产党阴谋家。

卢蒙巴在刚果没有干成的事，卡斯特罗在古巴全都做到了：草率的军事审判；大规模处决；把工业收归国有；土地集体化；终止公民权利和民主进程；和共产国

家结盟，这些都成了卡斯特罗政权的显著标志。

对无数美国人来说，这非常令人痛心和失望。他们读过《纽约时报》马修斯（Herbert Matthew）支持卡斯特罗的文章，也看过电视上的名人把他描绘成“古巴的救星”。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卡斯特罗和共产党的关系无需反驳。

多年来，他和共产领袖以及他们的叛乱行动、意识形态和计划紧密相连。即使没有这些证据，古巴哈瓦那和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警方记录，也足以告诉那些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卡斯特罗肯定不是古巴的希望。他在法学院毕业之前就已经劣迹斑斑，犯下了使用致命武器袭击、纵火、叛乱和谋杀等罪行。

卡斯特罗其人

卡斯特的父亲安吉尔·卡斯特罗（Angel Castro），是一位富有的甘蔗农场主。卡斯特罗是父亲的五个私生子之一。他的母亲是一位农场的女仆。^[168]传记作者说，卡斯特罗早年的成长环境并不利于培养人的优秀品行。

卡斯特罗进入中学后，成绩平平。但他生性好斗，野心勃勃，性格叛逆，在学校里人缘不佳。为了引人

注目，他决定做出惊人之举——骑上一辆自行车，一头撞向高高的石墙，这让他昏迷了好几天。有专家至今仍在怀疑，他是否真的完全康复了。

16岁那年，卡斯特罗因成绩差和老师发生了争执，想拿枪杀死老师。19岁时，他决心成为一名律师。于是，父亲把他送到哈瓦那大学读书。可是，他在那里很快就和校园里的最激进分子打成一片，还加入了一群以不刮胡子、不讲卫生为荣的垮掉族。在哈瓦那大学，人们至今还记得卡斯特罗的绰号“脏油脂球”。

卡斯特罗告诉巴拉特（Rafael Diaz Balart，后来成了他姐夫），他打算当学生会主席，然后利用自己的威望鼓动学生们的革命热情，最终使自己成为古巴的政治领袖。然而，他因嫉妒滋生的野心，并没有让他当上学生会主席。相反，却导致他在1947年策划了第一次谋杀未遂案。

受害者是哈瓦那第一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戈麦斯（Leonel Gomez），他在学校广受欢迎。卡斯特罗出于政治原因想杀死他，开枪射中了他的胸部。没想到，戈麦斯幸运地康复了。当时，卡斯特罗认定他必死无疑，于是就逃离这座城市，加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远征队。他们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推翻特鲁希略（Trujillo）政权。

在远征军出发前，卡斯特罗听说戈麦斯已经康复，觉得自己可以安全返回大学了。

第二次谋杀成功

到了 1948 年，卡斯特罗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信心满满，并决心不让任何事情挡住自己的路。他自封为大学恐怖组织的头目。当年 2 月 22 日，他用机枪杀害了前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一位名叫桑佩尔（Carlos Pucho Samper）的朋友，另有两人受伤。卡斯特罗因这起谋杀案被捕，但由于调查不力，他最终获释。有人怀疑，因为他的同伙是古巴总统侄子，法官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

卡斯特罗的学生运动引起苏联特工注意，他们正在寻找年轻激进分子来颠覆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卡斯特罗受命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带上皮诺（Rafaeldel Pino）同行。考虑到他正有法律麻烦，这似乎是一个远行的好时机。

波哥大骚乱中的苏联特工

1948 年 4 月，波哥大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那里将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指导下，举办第九届泛美会议。苏

共的战略家们选择在这个场合，发动一场由共产党指挥的叛乱，目的是推翻哥伦比亚保守政府，破坏美洲会议。

一年后，哥伦比亚安全部长尼诺（Alberto Nino）出书，详细讲述了这次叛乱。其中有关卡斯特罗的笔墨甚多。尼诺说，卡斯特罗和皮诺一抵达机场，就被置于监视之下：“这两个人是来替换两名驻扎在古巴的苏联特工的。哥伦比亚警方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在等着他们，但出现的却是这两位……在4月9日之前，他们截获了一封电报，说会有一位苏联人抵达。”^[169]

尼诺和他的手下发现，计划中的叛乱并不是由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一群在波哥大苏联使馆中活动的“国际共产党员”领导的。有9位国际共产党员为苏联人打掩护，卡斯特罗和皮诺就是其中两位。

共产党特工首先暗杀了盖坦（Jorge Gaitan）博士，他是哥伦比亚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然后，共产党在事先印好的传单中，把这起谋杀案归咎于政府，煽动哥伦比亚人洗劫城市来复仇。不到1小时，波哥大就沦为了暴力和火焰的地狱。

尼诺还发现，苏共事先安排一组人砸开门锁、打开商铺和仓库。在暴徒洗劫之后，另一组人负责在地板和墙壁上喷洒汽油。最后，训练有素的纵火犯开始有条不紊

紊地焚烧这些建筑。

当叛乱结束时，波哥大市政中心已被完全摧毁，存放大量民事和刑事档案的司法宫被夷为平地。还烧毁了学院、教堂、商店等 136 栋重要建筑，损失超过 2,100 万美元。警察和暴徒的战斗平息后，街道上留下了 1,000 多具尸体。

尽管卡斯特罗的一些传记作者试图掩盖他在这次恐怖活动中的角色，但在波哥大警方的档案中，有一张“目前由侦探办公室保管、带有两名古巴人照片的通行证，确认他们是苏联第三战线的一级特工。”^[170]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卡斯特罗和皮诺显然是受命策划谋杀盖坦的人，他们的活动彻底暴露。佩雷斯（Perez）总统在全国广播中，谴责他俩是叛乱中的共产党领袖。当叛乱明显失败后，卡斯特罗和皮诺迅速逃回了古巴。

谋杀哈瓦那警官

卡斯特罗刚回国，就得知哈瓦那警察局的卡拉尔（Fernandez Caral）警官，一直在仔细调查年初的机枪谋杀案。现在，他已经掌握了卡斯特罗犯案的确凿证据。卡斯特罗马上召集了他的同伙，在 1948 年 7 月 4 日，

伺机杀害了卡拉尔。

警方迅速在哈瓦那撒网搜捕，当天就抓获了卡斯特罗，并指控他犯有谋杀罪。但警方很快发现，由于害怕遭受卡斯特罗恐怖团伙的报复，所有目击证人都不敢出庭作证。当局无奈，再次被迫释放了卡斯特罗。他马上躲藏了起来。

从此，卡斯特罗团伙在古巴活跃的地下党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到了 1948 年，钱伯斯、本特利和大批叛逃的美国共产党人，揭露了苏联企图把全人类纳入共产世界的阴谋。所以，各地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共浪潮。西半球上上下下的共产党员，都接到指示躲藏起来，透过“阵线”开展活动。

在古巴，卡斯特罗决定和奇巴斯（Eddie Chibas）领导的改革运动“正统党”结盟。奇巴斯很快就发现卡斯特罗有问题，警告他的伙伴说，卡斯特罗不仅是共产党，而且还有黑帮暴力革命倾向。这个警告阻止了他在党内获得更多权力，但仍允许他保留党员身份。

古巴巴蒂斯塔政权

1952 年，又到了古巴大选的时候。和此前一样，“革

命”的威胁无处不在。候选人遭到暴力袭击，流血事件频发。军队中有些派系也想武力夺权。于是，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将军突然决定，亲自夺权并恢复秩序。

要评价巴蒂斯塔政变，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古巴赢得独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巴人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民主和稳定的自治。古巴的政治史就是一幕幕悲剧：非法选举、政治暗杀、政府无能、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威胁恐吓和独裁统治。虽然举行普选，但选举总是充斥着腐败和欺诈，无法确定“当选”官员是否真的代表了民意。而落选的候选人，往往成为企图夺权的革命党派领袖。所以又会导致执政党的专制报复。就这样，古巴的政治局势一直在当权者和反对者之间摇摆不定，民间造反和政府镇压此起彼伏。

对巴蒂斯塔将军来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军队夺权并恢复秩序了。早在1933年到1934年间，他就曾平息长期的内乱，让一位新总统能够就职；当人民对总统和其他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时，他在1940年使自己当选，并在当年通过了一部古巴新《宪法》。但是，在1944年大选时，巴蒂斯塔安排的候选人落选了。

巴蒂斯塔之后的两届政府，都极其腐败，贪污成风，这进一步摧毁了人们对民主进程的信心。到1952年，这

些政客还破坏了古巴经济的稳定。

巴蒂斯塔是这次的总统候选人，但他认为选举将是一场骗局，可能会引发内战；所以，他认为形势危急，决定再次出手，接管政权，建立临时军政府。

当巴蒂斯塔取消选举并解散国会时，在美国和古巴，都爆发了强烈抗议。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行了一项四管齐下的计划：

1. 通过农业多样化和加快工业发展，稳定古巴经济；
2. 加强和美国的经济、政治联系；
3. 抵制共产主义；
4. 提高古巴的生活水平。

他还向美国大使承诺，最迟到 1958 年举行自由选举。

到了 1957 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古巴的人均收入已经在拉丁美洲二十个共和国中排名第四，虽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却远高于日本，是印度的六倍，是意大利的 90%。美国商务部报告说：“古巴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71]

巴蒂斯塔的传记作者们都认为，他并不是拉美常见“军事独裁者”。实际上，他非常支持劳工，并力图推行民众欢迎的政策，而不是实行专制统治。

人们很快发现，巴蒂斯塔的政策，正在使古巴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旅游圣地，还吸引了大量美国资金投入工业发展。

同时，古巴也逐步从甘蔗种植的单一经济模式，转变成更均衡的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综合型经济体。工资增加了10%~30%，许多工人首次享受到健康、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从1950年到1958年，国民总收入在扣除10%的通货膨胀率后，实际增长了22%。

这就是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之前，古巴正在经历的、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

但在政治层面，巴蒂斯塔政权却和历届政府差不多。存在一定程度的贪污腐败；面对武装叛乱，他会以暴制暴；出现少数派造反，他会终止民权，实行军事管控。尽管如此，他坚持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愿意象1944年那样，接受全民选举的检验，并会尊重选举结果。

他的反对者（尤其是卡斯特罗）嘲笑这种承诺，并指责巴蒂斯塔反对宪政。历史记录显示，每当巴蒂斯塔试图放松控制时，都会立即爆发暴力事件，迫使他不得

不再次收紧控制。

“入侵古巴”行动

就在 1952 年巴蒂斯塔接管政权时，卡斯特罗马上就成为了反对派的急先锋。我们前面提到过，卡斯特罗一直用正统党掩护他的活动。但在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他坚持要求正统党和共产党联合，组建一个反对巴蒂斯塔的“人民阵线”。正统党领袖拒绝了他。于是，卡斯特罗立即退出，并宣布将创建自己的组织。

此后不久，1953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对圣地亚哥的军营发动了灾难性的袭击。军营医院里的人被残忍杀害。他的部下也同样下场悲惨，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毙，幸存者则遭受酷刑，最后被报复性处决。“7 月 26 日运动”由此得名。

卡斯特罗在这次进攻中，把自己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当他看到进攻失败，大喊“各自为战！”然后就逃之夭夭了。他的弟弟劳尔（Raul Castro）也成功逃脱。不过，卡斯特罗兄弟俩很快都被抓获入狱。分别被判刑 15 年和 13 年。但是，由于巴蒂斯塔在平息这次未遂袭击后为他们减刑，两人实际只坐了 22 个月的牢。

对巴蒂斯塔的宽宏大量，卡斯特罗兄弟却报以轻蔑。1955年7月，他们离开古巴，宣布将很快组织一支入侵部队，回来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解放”古巴。

他们在墨西哥城附近建立了入侵部队指挥部。各路人马涌向那里，支持他的所谓“解放”古巴事业。有些人是巴蒂斯塔的政敌，有些人是投机者，还有许多人是“真诚的自由派”。不过，和非洲刚果的卢蒙巴一样，一些阴险的铁杆共产党员很快进入其中，提供“指导”。

卡斯特罗部队的参谋长，就是阿根廷共产党员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博士，他是由苏联的“技术援助”机构派到卡斯特罗身边的。弟弟劳尔由于在布拉格、莫斯科和中国访问期间接受了大量的训练，所以，他被任命为部队指挥官。其他训练有素的共产党员，也巧妙地融入了计划的各个环节。

然而，尽管进行了充分的训练和策划，卡斯特罗部队著名的“入侵古巴”行动，还是以惨败告终。卡斯特罗的全部兵力只有82人。1956年11月19日，他们爬上一艘漏水的游艇出发。船长卡斯蒂略(Hipolito Castillo)是苏联颠覆拉丁美洲组织的著名战略家。这艘行动迟缓的游艇好容易抵达了古巴。当他们涉水上岸，准备“英勇”入侵时，却被敌方的枪林弹雨打散了，大部分人被俘或击毙。

卡斯特罗设法逃进了山区，最终爬上了马埃斯特拉（Sierra Maestra）山脉的 8 千英尺高峰。此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不足 10 人。于是格瓦拉接过指挥权，运用宣传和战术，逐步巩固地盘，煽动激进的年轻古巴人加入。就这样，共产革命的力量开始成形，内战之火很快蔓延到整个古巴。

但正是在卡斯特罗革命期间，巴蒂斯塔的政治诚信得到了切实体现。他宣布，根据他之前的承诺，将于 1958 年 6 月 1 日举行大选。他呼吁卡斯特罗恢复和平，以便确定人民的意愿。然而，卡斯特罗却以一份嗜血的宣言作为回应。

绑架美军陆战队员

卡斯特罗宣布，从 1958 年 4 月 5 日起，任何仍在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罪”；他还警告说，大选的候选人必须立即退出，否则将被判处“十年监禁直至死刑”，他还命令城镇中的民兵立即处决候选人。

斯特林（Marquez Sterling）博士等有责任感的古巴人，到卡斯特罗的山中藏身之处，恳求这位共产领袖停止杀戮，允许进行选举。卡斯特罗傲慢地拒绝了他。

这导致选举无疾而终。

在古巴共产革命浪潮中，许多美国人都忽略了巴蒂斯塔的重要努力。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本可以避免卡斯特罗对古巴的共产主义征服。

在早期，美国大使加德纳（Arthur Gardner）就被撤职，因为他主张支持巴蒂斯塔，直到古巴的问题可以通过选举解决为止。接替他的是史密斯（Earl Smith）大使，当他试图说明，卡斯特罗显然正在把古巴和美国，带入苏联制造的共产主义陷阱时，很快就被国务院怒目而视。

这些令人震惊的国务院专家，为表现完全蔑视大使的建议，故意对巴蒂斯塔实施严格的武器禁运。然后，为确保巴蒂斯塔必败，他们更进一步，推动中美洲和南美洲共和国之间达成协议，不向巴蒂斯塔出售武器。如此一来，结果不言而喻。

绝望的巴蒂斯塔，想从美国购买 15 架不装备武器的教练飞机。双方最终达成满意的协议，巴蒂斯塔预付了货款。

随后，卡斯特罗命令他弟弟劳尔发动一场恐吓和羞辱美国的行动。劳尔绑架了 3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17 名美国平民和 3 名加拿大人。他用这些人质的

性命，威胁美国取消出售教练飞机。结果，国务院的专家们温顺地屈服了！

一些勇敢的美国公民说，如果老罗斯福总统尚在人世，他一定会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卡斯特罗的山寨。那位残暴的古巴共产头目，一定会“欣然”释放美国人质，而且无需任何条件。

苏共的军援

卡斯特罗革命最终取得成功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来自苏联的支持，另一个和美国有关。

劳尔此前多次前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为武器和资金谈判。武器由潜艇运过来，资金则由信使传递。在政变的最后几个月里，卡斯特罗部队使用了大量捷克和苏联的装备，让观察家们大吃一惊。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卡斯特罗拥有雄厚的资金，用来支付工资、食品、装备、酒水、贿赂和奖金。

另一方面，巴蒂斯塔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岌岌可危。他原以为，凭借自己的亲美立场，在古巴的局势危急之时，美国一定会卖给他武器和物资。可是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向美国提出的武器购买请求，竟然石沉大海。

巴蒂斯塔并不知道，在美国，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默罗(Edward Murrow)、沙利文(Ed Sullivan)、菲利普斯(Ruby Phillips)、杜波依斯(Jules Dubois)等很多作家和意见领袖,一直在赞扬卡斯特罗,抨击巴蒂斯塔。

在美国国会,参议员莫尔斯(Wayne Morse)、众议员波特(Charles O. Porter)和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都在为卡斯特罗的事业献计献策。这些把卡斯特罗描绘为“罗宾汉”的宣传,显然行之有效。

与此同时,助理国务卿鲁博托姆(Roy Rubottom)和加勒比海事务主任维兰德(William Wieland),这两位本应是了解真相的人,却向所有询问者明确保证——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希望,绝无任何共产主义色彩。即便到了1959年6月(已经太迟了),众议员波特还在向他的同事们保证:“国务院没人相信卡斯特罗是共产主义者或亲共者。任何有责任心、想查清事实真相的人,都不会这么看。”^[172]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巴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共产浩劫。历史的进程让国会议员和国务院都感到尴尬。在冲突的最后几个月,美国的政策误入了歧途,权威人士把这个恶果,归咎为“愚蠢、无能甚至更糟糕”。

卡斯特罗的共产革命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政治领袖。民众在战火中茫然失措；前统治者巴蒂斯塔已经逃亡；所有反对派都被镇压。许多美国自由派和受了迷惑的报纸读者却是一片欢呼，仿佛古巴终于迎来了自由和宪政。

但是，许多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却看到了不祥之兆，认为古巴的苦难和流血才刚刚开始。最初的警讯，是共产党报刊得意洋洋地炫耀说，“他们”已经赢了。莫斯科的《真理报》指出，从卡斯特罗运动开始，“我们党就认为，首要职责是援助反叛者，为他们指明正确方向并获得群众支持。党领导了土地争夺战，提高了在农民中的威信。我们党……以各种方式支持群众和卡斯特罗。”^[173]

古巴共产党也毫不掩饰地吹嘘说，他们在“推翻巴蒂斯塔血腥暴政”的革命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巴蒂斯塔暴政是帝国主义利益的傀儡，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174]

如果巴蒂斯塔将军读到这些话，他可能会想，这种“帝国主义的支持”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共产党指责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那他们肯定是在混淆视听。

卡斯特罗一上台，他就利用暴民革命法庭审判，把

六百多人送上刑场。美国自由派认为，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罪有应得。随后，卡斯特罗就发起了一场典型的共产主义“改革”运动：

1. 没收土地，把古巴劳工安置在苏联式的大型集体农场。

2. 没收了价值十多亿美元的美资工业企业。而卡斯特罗既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资金来经营这些企业。

3. 瓦解古巴家庭。把学龄孩子安置在特殊的集体农场，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受到老师而不是家人的影响。

4. 重组学校，让它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和“仇恨美国佬”的宣传阵地。

5. 终止公民自由和其它《宪法》保障。

6. 取消自由选举。

7. 垄断所有报刊、电视和广播，为政府宣传所用。

8. 终止和美国的一切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

9. 与苏联结盟。

10. 承认中共政权。

11. 与共产阵营国家开展贸易。

在 1959 年和 1960 年初，古巴的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运行，许多美国人继续为卡斯特罗辩护，坚持认为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独裁者，只是“被误解了”。他们捕捉来自古巴的每一点看似乐观的消息，认为卡斯特罗“现在可能变得更通情达理了”，或者“他正在改变中”。

然而，到了 1960 年夏天，这些自欺欺人的幻想都被卡斯特罗亲手打破了。他响应赫鲁晓夫的召唤，前往联合国，加入了共产集团的“力量展示”。在卡斯特罗入住的哈莱姆总部，两位独裁者热情拥抱——他们是兄弟和战友。

现在，铁幕已经在古巴轰然落下。一些美国人也许偶尔会想起，1957 年马修斯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他笔下的卡斯特罗形象如此光辉：“卡斯特罗怀抱自由、民主、社会正义的理想，主张恢复《宪法》，举行自由选举。”

其他站错队的美国人后来说：“这一切太不幸了，或许是命中注定。”

这句话听来好像耳熟。这正是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白皮书中强调的主题，对于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他的借口就是不可避免。但《魏德

迈报告》揭示，失去中国也是因为“愚蠢、无能甚至更糟糕”的错误。就在中国为生存而热血奋战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对这个长期盟友实施了武器禁运。后来对古巴的巴蒂斯塔又是故伎重施。由此导致两个盟国沦陷，成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所有这一切，都让前古巴大使加德纳黯然神伤：“我们完全有能力阻止这场灾难，但是我们没有做。如果我们和巴蒂斯塔保持正常关系，履行我们的合同，巴蒂斯塔就会如期下台，安居佛罗里达，由一个理想的人选接任。”

“一个支持巴蒂斯塔的人吗？”有人这样问加德纳。

“不，是大家都喜欢的斯特林（Marquez Sterling）博士。他是巴蒂斯塔的对手。讽刺的是，尽管他反对巴蒂斯塔，却因为卡斯特罗上台而不得不逃离古巴。”^[175]

猪湾事件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没有对古巴的局势引起足够重视。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他身材高大，充满活力。但在上任不久，他就犯下了一

个致命的错误。

4月17日，在美国支持下，一支不足1,400人的古巴人队伍，在猪湾（Bay of Pigs）发动了“反卡斯特罗起义”。而开始之前的各种不利条件，已经预示了它的失败。

这支队伍组织混乱、装备简陋，打着日渐衰落的美国旗号，乘坐陈旧的船只登陆。可是，卡斯特罗已经准备好苏联坦克、大炮和喷气式飞机等着他们。结果，这些起义者被一网打尽。全球的共产党宣传机器，都歇斯底里地抨击“美帝国主义”；而自由世界的媒体则哀叹：这是“美国声誉的头号灾难”。

在随之而来的恐慌气氛中，卡斯特罗开玩笑说，他可能会用拖拉机来交换战俘。美国自由派人士信以为真，立即开始筹款购买拖拉机，以满足卡斯特的勒索。卡斯特罗高兴地看到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公民在他面前屈服，得意地向谈判人员不断提高条件。果不其然，谈判最终徒劳无功。

这场令人触目惊心的军事失败，也给肯尼迪的政治前途蒙上了阴影。然而，谁都不会想到，第二年，他将面对一场事关人类命运的更大挑战。

古巴导弹危机^[176]

猪湾事件过后，卡斯特罗非常担心美国将会大规模入侵。而赫鲁晓夫正在忧心和美国核武的差距越来越大，储量少，技术落后，苏联导弹几乎无法覆盖美国本土。

1962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想出了一个自为一箭双鵬的“妙计”——在古巴境内秘密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样既能对美国产生核威慑，又可以保障盟友古巴的安全。他告诉党内高层同事，美国已经在苏联周边的意大利、西德和土耳其部署了导弹，这次要“让他们尝尝自己酿下的苦果”。他觉得，不太可能因此引发核战争。

这个绝密行动被命名为“阿纳德尔（Anadyr）”，将运送4万多名苏军官兵、40个导弹发射器、60枚导弹、60枚核弹头到古巴。但是，要想做到秘密部署几乎是不可能的，古巴的棕榈树根本无法遮挡美国U-2侦察机对导弹基地的拍摄。但是因为没人能阻拦赫鲁晓夫，这个计划还是启动了。

8月31日，肯尼迪总统接到了难以置信的消息：中情局的U-2侦察机在古巴发现了苏联S-75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基地都靠近美国本土，而且很可能还有其它导弹基地。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打过几次交道，认为他不是个值得信赖的谈判对象。所以，他决定强硬表态，威慑苏联。9月4日晚，白宫发布声明，证实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大量导弹，并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卡斯特罗以武力威胁。

第二天，美国发现古巴导弹的消息传到了苏联，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但他仍然想再赌一把——在导弹被全部发现之前尽快完成部署。9月6日，赫鲁晓夫会见了美国内政部部长尤德尔。他承认向古巴提供了“防御性”的现代化武器，然后威胁说，如果美国攻击古巴，苏联将报复美国在土耳其或意大利的导弹基地。

9月8日，苏军高层通知驻古巴集团军司令，在得到赫鲁晓夫命令之后，可在遭遇敌人入侵时使用核武器。同一天，肯尼迪请求国会授权征召15万名预备役军人。这使赫鲁晓夫更加坚信，美国会入侵古巴。

9月1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部队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他吹嘘自己的核武威力巨大，警告美国不要入侵古巴，否则将引发“一场使用热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看到肯尼迪对此没有反应。9月28日，赫鲁晓夫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再次威胁——如果美军击沉苏联船只，将引发核战争。

10月14日，一架美国中情局的U-2侦察机再次进

入古巴领空，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已经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截至此时，已经有4万多名苏联军人秘密进驻了古巴。但中情局估计最多只有4,000人。

16日，肯尼迪召开顾问团队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大家都认为必须清除这些导弹，但是对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行动存在分歧。军方分析，驻古巴苏军很可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美军如果不能一举消灭所有导弹基地，就会导致一些导弹轰炸美国部分地区。军方确实判断对了。但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这些导弹还配有核弹头，如果此时美军进攻古巴，极可能引发核战争。令人庆幸的是，尽管肯尼迪支持军事行动，但并没有立即拍板。

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传来。10月18日，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拍到的一个导弹基地，很可能部署了射程约为3,200公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可打击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丹佛等城市。肯尼迪和顾问团队都意识到，事态已经极其严重，大家对实施海上封锁达成了共识。

在10月20日的白宫顾问会议上，中情局长汇报了最新发现——古巴有8枚中程弹道导弹已进入战备状态。爆发核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肯尼迪自上任后，一直担心核战争。军事顾问告诉他，如果和苏联打核战，美国

的 1.8 亿人口将死亡 7,000 万人。

会议结束后，肯尼迪和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来到阳台。他望着华盛顿纪念碑，严肃地对弟弟说：“我们离战争非常非常近了，白宫的避难所可不够我们用的。”

肯尼迪决定，实施海上封锁，然后空袭古巴导弹基地，除非赫鲁晓夫答应撤出导弹。10 月 22 日晚 7 点，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封锁运往古巴的所有攻击性武器装备，并警告赫鲁晓夫，如果在古巴有任何核导弹发射，都将引发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

苏联高层提前得知了肯尼迪的演讲时间，但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急忙开会商讨对策。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对高层同事们说：“关键是我们不想发动战争。我们是通过古巴震慑和制衡美国……可悲的是，如果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反击。冲突将可能会升级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此时的克里姆林宫，已经被与日俱增的恐慌所笼罩。赫鲁晓夫心想：“完了，列宁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正在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之际，他收到了外交部传来的肯尼迪演讲稿，得知美国将实施海上封锁，并没有宣布进攻古巴，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封锁是可以

接受的。

莫斯科时间 10 月 23 日上午，苏共高层会议决定：“让所有向古巴运送武器的船只返回苏联港口，但暂不向美国宣布此决定。”不过，一艘已驶近古巴、载有第二批核弹头的干货船，以及装备核弹头的苏联潜艇的航向仍保持不变。

10 月 24 日上午，虽然美国没得到苏联通知，但已发现了苏联船只返航的奇怪动向，看似极度紧张的局势正在缓解，于是军方收回了攻击苏联船只的命令。



在古巴危机期间，一架美国海军海王星巡逻机飞越一艘苏联货船。
(公有领域)

但与此同时，苏联接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情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前所未有地命令部队高度戒备，

1,479 架轰炸机、182 枚弹道导弹和 2,962 枚核弹头，随时准备对苏联实施核打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事后透露，赫鲁晓夫在看到这个情报后，“吓得差点尿裤子”。

10 月 25 日，肯尼迪用电报回应了 9 月 28 日赫鲁晓夫的恐吓信。他强调美军实施封锁理所当然，是赫鲁晓夫首先挑起了事端。“我希望贵国政府采取必要行动，让局势恢复如初”。赫鲁晓夫的恐吓适得其反，反倒把自己带到了核战的边缘。

心慌意乱的赫鲁晓夫急忙召开高层会议，说服同事们支持他和肯尼迪的交易——撤走古巴导弹，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就在一天前，他还在为那艘运送核弹头的货船抵达古巴而窃喜，现在却好似拿着一个烫手山芋。他立即指示，准备把这船核弹头运回苏联。

这时，克格勃报告，美国将在 24 小时内攻击古巴！为防止核战爆发，赫鲁晓夫马上口授了一封信，告诉肯尼迪他的交易条件。莫斯科时间 10 月 26 日晚上，白宫收到了这封信。

到了 10 月 27 日，赫鲁晓夫发现美国并没有进攻古巴，他认为这是肯尼迪软弱的表现。因此，他决定再加上要求美国撤除土耳其核导弹的条件。于是，他又给肯

尼迪写了一封信：“我们愿意将您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手段从古巴撤走……并在联合国做出承诺。”然后要求美国也从土耳其撤回同类的手段。为了尽快通知肯尼迪，在通过外交渠道传递信件的同时，赫鲁晓夫让苏联电台播出了这封信。

美东时间 10 月 27 日下午，肯尼迪在顾问团队会议中，得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古巴防空炮对低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开火，在高空飞行的一架 U-2 侦察机被苏军地对空导弹击落，飞行员牺牲。会议室气氛沉重，所有人都无法理解赫鲁晓夫接连两封信的真实意图，但都判断是他下令击落了 U-2 侦察机。军方强调，机不可失，必须尽快全面攻击古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U-2 侦察机飞行员的牺牲，使肯尼迪避免核战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决定接受苏联的条件，给赫鲁晓夫写一封回信。与此同时，他派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Dobrynin），告诉他，“美国政府决心除掉这些基地……甚至会炸毁这些基地”，这是因为“它们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但是“这样一来，一场真正的战争就会爆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苏联人都会因此丧命”。美国愿意接受苏联的条件，但“土耳其一事，肯尼迪总统不能

公开表态”，并且美国只会在保密的前提下兑现这笔交易。最后，罗伯特要求赫鲁晓夫必须第二天回复。

参加顾问会议的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在晚上走出白宫时心事重重，无心欣赏华府美丽的夜景。他心想，或许自己“再也不能活着看到下周六的夜晚了”。

当晚，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进入了备战状态。美国大陆防空司令部发布命令：“如果遭遇苏军袭击，可使用核武器。”

与此同时，在马尾藻海域，美国科尼号军舰发现了苏联潜艇，由于美军巡逻机投下了几颗照明弹，苏联潜艇以为遭到了攻击，想发射鱼雷。战斗一触即发，科尼号舰长主动向对方传递信号，澄清了误会。此时他们并不知道，苏联潜艇的鱼雷是装备了核弹头的。他们无意中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击落美军侦察机并非赫鲁晓夫的命令。莫斯科时间10月28日凌晨，赫鲁晓夫得到了来自古巴的这个坏消息，发现神经已经高度紧张的驻古巴苏军正在失控。不过，也有个好消息——前天晚上，他收到了肯尼迪的回信。

肯尼迪开出的条件是：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这些导弹，并停止向古巴运送武器。作为交换，美

国将取消封锁并保证不会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已经准备接受了。

当天中午，就在苏共高层开会商讨之时，多勃雷宁用加密电报发来了肯尼迪的最后通牒：美国已决心清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期望苏联在一天内明确答复。苏联军方也提供情报，在莫斯科时间下午 5 点，肯尼迪将发表全国演讲。所有人都觉得，核战马上要爆发了。

时间极为紧迫，赫鲁晓夫命令外交部长立即给多勃雷宁发电报，让他转告肯尼迪，苏联对他的条件没有异议，稍后将正式回信，并在电台播出。

写完给肯尼迪的回信后，赫鲁晓夫又给卡斯特罗写信，安抚这位愤愤不平的盟友。建议他“耐心，克制，再克制。”

美东时间 10 月 28 日上午，肯尼迪得知赫鲁晓夫接受了他的条件，如释重负。他对助手说：“要知道，我们已经安排好星期二的空袭。感谢上帝，这一切都结束了。”

古巴摆脱了核战的厄运，得到了美国不入侵的保证。但卡斯特罗却因为苏联和美国谈判时没征求他的意见，恼羞成怒，拒绝联合国在古巴核查导弹拆除情况。

不过，这并没有难倒赫鲁晓夫。他决定按照肯尼迪

要求，撤出可携带核弹的伊尔 -28 轰炸机，来换取肯尼迪同意在国际水域核查撤出导弹的船只。10 月 31 日，导弹拆除完毕，很快被运离了古巴。卡斯特罗因此成了全球媒体报道的反核战搅局者。

赫鲁晓夫曾经以为肯尼迪缺乏经验，软弱可欺。经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却发现，肯尼迪是一位需要尊重的强大对手。

赫鲁晓夫肆意妄为，险些把美苏两国、古巴甚至整个世界都推向核战的深渊。两年之后，苏共高层以此为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第十一章

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解体^[177]

1964 年 10 月，苏共高层集体逼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表态说：“感谢你们给予我退休的机会。”“我只请你们为我写一篇合适的声明，然后我会签字。”随后，勃烈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被推举为新任苏共总书记。

勃烈日涅夫 23 岁加入苏共，在二战期间晋升为少将。1956 年，他又晋升至苏共高层。^[178] 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勃烈日涅夫继续对国内和东欧卫星国实施铁腕统治。1970 年代中期，苏联在欧洲部署了 SS-20 中程导弹。而美国则为欧洲盟友提供了潘兴 -2 导弹，并在英国和西德建立了美军基地。双方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实现了战略平衡。

1979 年 12 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引发了西方各国对苏联的全面制裁，成为苏联走向衰败的转折点。由于苏联长期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到 1980 年代初，军队人数已从赫鲁晓夫时期的 300 多万

增加到 440 万。而此时，苏联偏重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已接近停滞，消费品严重短缺，“老百姓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179]

1981 年 1 月 20 日，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里根入主白宫。^[180] 他强硬的反共态度，吓坏了已是风烛残年的苏共领袖们。

“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面容和蔼，谈吐风趣。他曾是一位好莱坞演员，1947 年成为美国演员工会主席。从 1966 年开始，他连任两届加州州长。在 1980 年的大选中，他击败卡特，成为第 40 任美国总统。

里根在上任之后，很快就宣布采取“双轨”对华政策——在维持中美关系的同时，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高性能的 FX 系列战斗机。邓小平对此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他不想因中美关系倒退，而让苏联在对华关系中重获优势。^[181]

在上任两个月后，里根的总统生涯险些戛然而止——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外，一名枪手射中了他，让他几乎丧命。在手术室里，里根幽默地对第一夫人南希说：“亲爱的，我忘记躲开了。”

里根面对暗杀的勇气和淡定，进一步提高了支持率。里根认为，美国已经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落后，应该大幅增加军费，打造一支强大的美军。与此同时，他还要改变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逻辑——一旦爆发核大战，双方都将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数以亿计的民众死于非命。他要不遗余力地避免这个灾难。

1983年1月，里根阐述了自己的对苏战略。他决心要彻底击垮苏联——不仅要“遏制和全力逆转苏联的扩张主义”，让苏共领袖明白“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将招致远超任何收益的代价”，还要推动苏联向“更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所以，美国绝不会实施可能缓解苏联经济困境的政策。

里根大大加长了对苏联禁止出口的工业品名单，禁止任何可能被用于军事的技术转让。他认为，“苏联帝国内部存在很多重要的弱点和缺陷，美国应该利用它们”；美国应支持任何想挣脱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要让苏联为入侵阿富汗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被迫撤军。里根并不反对和苏联谈判。但他认为，谈判的基础只能是“严格的互惠和共同的利益”。^[182]

里根在欧洲有两个坚定的盟友。一个是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对里根大力支持。里根在日记中写道：“玛格丽特·

撒切尔是中流砥柱，也是美国可靠的朋友。”^[183]另一位是生于波兰的梵蒂冈教宗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他极力反对苏共的极权统治和无神论。^[184]

3月23日，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讲，宣布美国将启动“外太空反导弹防御计划”（也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这将让美国有能力击落敌人的导弹，保护美国人免遭核威胁。这个耗费巨资的宏大计划一箭双雕，将把财力早已捉襟见肘的苏联逼入困境。里根希望“把它们耗到死”。

里根的演讲激怒了苏共高层。此时勃烈日涅夫已去世半年，疾病缠身的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继任苏共领袖。苏联正在阿富汗深陷战争泥潭，美国升级的军备竞赛，无疑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

当年8月，安德罗波夫回应说，如果美国推进这个计划，他将重启反卫星武器试验。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这将让苏联承担“天文数字般的开销”。

接下来，一场间谍战在两国之间展开。美国接到令人震惊的情报——苏联间谍正在大量窃取美国的工业技术。美国安全部门决定将计就计——给他们错误的技术。不久，西伯利亚的管道就发生了大爆炸。随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立即行动，逮捕了几十名苏

联间谍。

里根的坚定反共立场，有时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1983年8月，他在一次电台演讲前的例行测试时开玩笑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了一项永久取缔苏联的法案。我们将在5分钟后开始轰炸。”没想到，这几句话竟被播出了，把苏共高层气得暴跳如雷。^[185]

戈尔巴乔夫上台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肾衰竭去世，苏共高层推举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接任。契尔年科指定53岁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做非正式助手。每当他无力工作时，就让戈尔巴乔夫代行职权。

戈尔巴乔夫出生在苏联边疆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路升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农业方面的政绩，赢得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赞赏，在1978年把他调到莫斯科，负责中央农业部，后来又升任政治局委员。

在一次招待法国总统的晚宴上，面色苍白的契尔年科询问苏联农业情况，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每个人都

说一切进展顺利，但这是错的。事实上，在苏联全境，农业都是一场灾难。”契尔年科吃惊地问：“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戈尔巴乔夫回答：“1917年。”法国客人会心一笑，对戈尔巴乔夫的直率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离世，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为了摆脱面临的经济困境，他期望大刀阔斧改革，扭转长期向军工倾斜的政策。

他向里根呼吁，双方不要再扩大核武库，并主动宣布取消在欧洲部署更多 SS-20 导弹的计划。他还表达了和里根当面对话的愿望。

此时的里根已赢得第二个任期。他并不信任戈尔巴乔夫。他一直强调，不要看苏联人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做了什么。

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提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任命他的好友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长。但是，他遭遇了苏共高层和军方顽固派的阻挠。

1985年8月，戈尔巴乔夫再次主动向美国示好，宣布把苏联的核爆试验推迟到年底。他暗示说，如果美国也能这样做，他将进一步推迟核试验。双方经过频繁沟通，终于决定开始首脑会谈。

日内瓦峰会

1985年11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城堡举行峰会。里根提议，把双方的核弹头削减到6,000枚。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但他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解释说：“那不是个进攻性系统……我说的是盾，不是矛。”戈尔巴乔夫非常生气：“当我说苏联永远不会进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相信我？”里根回应说，美国人民并不依赖某个人的承诺，而是依靠坚固的防御系统。双方虽然各持己见，但都承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86]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日内瓦峰会上会谈。（公有领域）

苏联电视播放了两位领袖在日内瓦的画面，这正是里根所期望的：“苏联人民第一次在国内媒体上看到了

一位面带微笑的、负责责任的美国总统，而不是一个卡通怪物。”

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分三阶段削减核武器的计划，期望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向里根施压。

里根回应说，苏联仍在支持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Gaddafi），这让他怀疑苏联的诚意。中情局也一直提醒里根，苏联仍在测试巡航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也强调，苏联在做到尊重人权、停止支持其它共产党和恐怖组织之前，美国是无法信任它的。

撒切尔夫人给里根写信提醒说，她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她“过去了解的苏联共产主义者没什么两样”。他发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她建议里根坚守“星球大战计划”，削减核武库存的进度，应该与该计划的进度同步。^[187]

戈尔巴乔夫本以为给西方献上了一份大礼，没想到欲速不达，反而加重了西方对他的不信任。他首先要赢得国内的支持。在2月的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担忧，他强调说，他将优先停止军备竞赛和世界各地的冲突，把苏军尽早撤离阿富汗。不过，他没透露经济更加恶化——由于全球油价暴

跌，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减少了。

随后，又一件让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件发生了。3月，里根政府下令，要求苏联大幅减少驻联合国使团的人数，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间谍。^[188] 戈尔巴乔夫更加担心里根放弃谈判。紧接着，他又遭遇了国内改革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基辅以北约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大爆炸，污染扩散到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官方报告，有840万人受到核辐射，约15.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受到污染，40万人被重新安置，但仍有几百万人生活在有残留核辐射的环境中。^[189]

起初，苏联当局试图掩盖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瑞典向世界发出了警报，苏联才承认发生了核事故。然而，尽管仍散发着危险的核辐射，3天后的苏联“五一节”庆祝游行，仍然在莫斯科、基辅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照常进行。大多数人对事故一无所知。^[190]

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了下级官员和科学家的失职和瞒报。和他的前任大为不同的是，他要求苏联媒体更开

放、诚实地报道这场灾难。

为消除这场核灾难的影响，苏联耗费了 40 亿卢布，加重了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坚持 1 月宣布的计划。他主动向里根表示，愿意回到他们在日内瓦的议程上来。

雷克雅未克峰会

戈尔巴乔夫为了应对让他忧心忡忡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了一个名为“非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的秘密计划，^[191] 估计将在 1986 年到 1990 年间，花费 400 亿卢布。

戈尔巴乔夫向高层透露，苏联的生产力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距——日本缝纫公司 600 人生产的商品，在苏联需要 90 万人才能完成。他强调说，只有和美国谈判削减军备，才能有资源发展苏联经济。

1986 年 10 月 11 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会谈。戈尔巴乔夫呼吁，把战略核武器削减一半，并且全部清除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他主动提出，如果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只局限在实验室之内，他将不再反对。

里根仍然不让步。他强调这个计划只是用于防御，

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未来某个疯子，比如希特勒——不会去试着制造核武器。”

里根认为，如果清除欧洲的中程导弹，就必须同时减少苏联在亚洲部署的导弹。同时，还必须确保落实这些削减核武协议。里根特意提到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信任，但要核查。”（Doveryai, no Proveryai）。戈尔巴乔夫笑了，说他知道这句谚语。^[192] 双方虽然在这次峰会上减少了一些分歧，但结局还是不欢而散。

戈尔巴乔夫沮丧地回到莫斯科。他面对的依然是军方顽固派的阻挠。第2年，一件离奇事件给他带来了“修理”军队的理由。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青年马赛厄斯（Mathias Rust）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擅自飞入苏联领空，并成功降落在莫斯科红场。

这位善良的年轻人冒险此行的目的，是想告诉戈尔巴乔夫如何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而苏联军方竟然既没拦截也没击落他。世界各国媒体都在嘲笑苏联的防御能力。

戈尔巴乔夫借机逼阻挠改革的国防部长辞职，然后对军队大规模裁员，几百名高层军官被迫退休。^[193] 这对里根来说是个好迹象。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继续发动全球舆论攻势。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以多语种在全球发行。他在书中说，苏联将走向民主，并找出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与此同时，苏联继续抨击“星球大战计划”，并散布各种谣言抹黑美国。美国新闻署戳穿了很多苏联造假文件，并给予有力的反击。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已经使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动摇。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告诉人民——腐朽的资本主义即将垮台。可是，资本主义国家却越来越繁荣，反倒是共产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已经把美国视为改革的榜样。

在每次峰会上，里根都会敦促戈尔巴乔夫改善人权，推动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自由移民，停止输出革命等等。戈尔巴乔夫因此逐渐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

苏联人不仅可以收听美国之音、BBC等外国电台，还可以在美国电视广告上了解令他们羡慕的西方世界。向西方国家打电话和出国旅行的限制也开始解除。到1988年11月，苏联又宣布，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就允许移民海外。这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让美国无法信赖苏联。美国

知道了苏联对抗“星球大战”的秘密计划，要求参观其激光实验设备，被其断然拒绝；美国还发现，苏联仍然在军队规模和武器数量上撒谎。这些问题，都成了推动美苏谈判的巨大障碍。

“推倒这堵墙！”

在欧洲，有一堵象征共产铁幕的柏林墙，已经阻挡了共产东德和自由世界交往 20 多年。

在二战之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德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而西德则是民主国家。柏林是双方来往的唯一通道。东德人不断穿过柏林前往西德，寻求自由和富裕的生活，仅 1960 年就高达 19 万人，这让苏联和东德共产领袖非常难堪。

于是在 1961 年，东德建起了这堵围墙，把柏林一分为二。如果东德人再逃离，就会被射杀。^[194] 但是，东德人依然发挥创意，利用地道、热气球等各种方式投奔西德。

1987 年 6 月 12 日，里根访问了西德，并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寻求和平，如果你寻求苏联和东欧的繁荣，如果你寻求自由化，就来到这座门前。戈尔巴乔夫先生，打

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195]

对里根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媒体都保持了沉默。



1987年6月12日，里根在德国柏林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讲。
(公有领域)

当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来到美国白宫，和里根共同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规定在3年内，双方将销毁所有中程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196] 1988年5月底，美国参议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个条约。随后，里根飞往莫斯科，出席批准书交换仪式。

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发表了演讲。他告诉大学生们，社会发展的钥匙，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

交流自由。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没有旅行的障碍，没有思想交流的障碍。这番话让台下的年轻人听得如醉如痴，欢欣鼓舞。

“党在选举中失败了”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改革成果显著，但国内改革却进展缓慢。党的官僚们仍墨守成规，人民的生活不但没改善，反而越来越糟。随着对西方社会和共产黑幕的不断了解，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

为了削弱党的控制，戈尔巴乔夫模仿西方的议会，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由它选举产生的最高苏维埃。1989年3月，苏联人翘首期盼的人大代表选举终于拉开帷幕。由于各地党组织仍然控制着选举委员会，安排对党有利的候选人名单，这次选举显然是不公正的。

尽管如此，选举结果还是让党的官员们大吃一惊。虽然共产党员占据了多数代表席位，但还是有很多异议人士设法成为候选人并胜选。被党罢官的原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现在大众的普遍看法是，凡是共产党讨厌的人肯定是英雄。苏共的反叶利钦运动，反而使他的声望

不断飙升，成了所有不满者的领袖。

在列宁格勒，官员们精心安排了一场没有竞争对手的选举。但是，选民用不选名单上的候选人来表明他们并不买帐。结果，唯一的共产党候选人由于只获得24万选票中的1万票而落选。很多选区的共产党候选人，都遭到了这种选民的嘲弄。这可是苏共掌权以来的第一次。

苏联总理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197]

这次选举让民主人士深受鼓舞。他们的诉求各有不同。有的要求结束一党制；有的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有的呼吁民族自治和独立。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和戈尔巴乔夫互相呼应。他们知道，目前戈尔巴乔夫还不太敢公开支持他们，因为可能会导致他被顽固派赶下台。但他们希望他能暗中提供保护，以便他们逐渐集聚力量。一旦他和那些顽固派摊牌，他们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这次选举导致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敢说真话了。在几十年前，如果党怀疑你有异议，就会有性命之忧；就在不久之前，异议人士仍难逃入狱

或流放的命运。而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畅所欲言地批评共产党了。

党控制下的媒体也逐渐宽松。1988年，苏联废除了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198]许多共产党的暴行和丑闻被勇敢的媒体人揭露出来。发生在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就是其中一例。

苏共一直说，是德国盖世太保在占领波兰后，杀害了这批被俘的波兰军官。1989年，《莫斯科新闻》曝光了真相——在苏军和纳粹瓜分波兰之后，是斯大林下令处死了这批波兰军官，目的是防止波兰的“资产阶级”卷土重来，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前律师、医生和商人。这些不断曝光的黑幕，激起了民众对共产党的憎恨。

在12月12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提议修改议程，对阻碍改革的《宪法》条款进行辩论。这些条款涉及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等等。主持大会的戈尔巴乔夫没等他进一步解释，就逼他下了讲台。随后，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这一幕在当晚的国家电视台播放，引起了改革派的愤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在他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两天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去世。很多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对他的羞辱，导致了他心脏病发作。悼念现场人山人海。人们在挽联上写道：“原谅我们，当他们折磨您时，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再不会没有勇气面对独裁”，“您为我们指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天职”。深孚众望的萨哈罗夫，已成为苏联人追求民主人权的象征。

“波罗的海之路”行动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使苏联内部各共和国的民族意识与日俱增，他们纷纷组织起“人民阵线”。当初这些共和国并非自愿加盟，而是苏共用武力强迫它们合并的。而且，斯大林对各民族文化的破坏、大清洗和强制迁移，制造了很多冤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现在，戈尔巴乔夫必须面对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挑战。

“人民阵线”首先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兴起。它们是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款的牺牲品。斯大林在1940年吞并了这3个国家。第2年，这3国又被德国纳粹占领，直到苏联红军在1944年卷土重来，强迫它们加入了苏联。

这 3 个国家都提出了独立诉求。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形势的严重程度。1989 年 1 月，他准备允许这三国实施民主，但不会同意它们独立。

1989 年 8 月 23 日，阳光明媚，暖风拂面。“人民阵线”发起了“波罗的海之路”行动，呼吁世界关注这 3 国不幸的历史遭遇。200 万多人手拉手，形成了一个超过 600 公里的人链，把 3 国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连接起来，场面盛大，堪称世界之最。这 3 个国家人口一共约有 500 万，参加活动者竟然高达 40%，可见独立是民心所向。

美国和西方盟友一直不承认苏联对这 3 国的非法吞并，支持它们独立。1989 年 1 月 20 日，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成为美国第 41 任总统。他身材高瘦，严谨而务实，18 岁就成为美军飞行员，参加过菲律宾战役，后在耶鲁大学毕业，创办了一家成功的石油公司。后来他当选国会议员，又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和中情局长。最后，他又成为里根的搭档，连任两届副总统。他决定延续里根的外交政策。

东欧去共产化运动

在美国的敦促和自身经济压力之下，苏联开始从阿

富汗分批撤军。到 1989 年 2 月，撤军已经全部完成。现在的戈尔巴乔夫，既无心也无力继续对东欧卫星国提供支持。这些失尽民心的共产政权面临垮台危机，只好私下谋求西方国家的帮助，但依然阻挡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

反共民主运动在东欧风起云涌。当年 6 月 4 日，波兰举行大选，反对共产政权的团结工会大胜，人们兴高采烈。戈尔巴乔夫拒绝干预。老布什及时飞往波兰，对共产党领袖施压说，美国的帮助，将取决于波兰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进程。8 月 24 日，团结工会领袖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成为波兰政府总理。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紧随其后。10 月，匈牙利宣布成为共和国，并定于第 2 年选举。11 月，捷克共产领袖承诺取消一党制。

11 月 4 日，大约 50 万东德人在东柏林市中心集会，要求民主和自由。为缓和矛盾，东德共产领袖决定放松出境限制。5 天后，一位东德官员宣布了新规定：“私人旅行申请无需先决条件……立即生效。”其实他说的并不准确。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听说这一消息，立即涌向柏林墙。卫兵们没有接到制止的命令，迫不得已打开了栅栏，东

德人欢呼着穿过了柏林墙。这一幕很快传遍世界，成为东欧共产阵营解体的高潮。东德共产领袖向苏联求援，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打算救他们。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告诉媒体：“让这些国家决定自己的路吧。”^[199]



东德解除柏林墙禁令后，东德人在勃兰登堡门前和西德人聚在一起。（公有领域）

12月2日，美苏峰会在南欧马耳他举行。老布什呼吁苏联政府进一步尊重人权，并要求戈尔巴乔夫阻止古巴输出革命。戈尔巴乔夫回答说，苏联已经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理念，他对波兰和东德巨变的态度，已经证明了他的信誉。

戈尔巴乔夫还向老布什保证，他允许东欧人自主选择政治经济制度，不会在东欧动武，而且会把苏联军队

从那里撤走。老布什也承诺，如果苏联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利用东欧的变化来增加他在国内改革的难度。

不过，在波罗的海3国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保证并不明确。老布什提醒他，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如果苏联诉诸武力，就会严重破坏双方关系。

两位领袖还对削减核导弹和化学武器的时间表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双方已不是敌对国，冷战很快就结束了。

马耳他峰会之后，东欧国家的去共产化运动更为猛烈。戈尔巴乔夫已提前知道，罗马尼亚人要推翻其共产政权，他表态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

12月17日，罗马尼亚军队在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开枪镇压抗议民众，引发了全国性抗争。21日，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出现在首都党总部大楼的阳台上，要求下面的民众支持他镇压。这次人们不再欢呼，也不再害怕，反而吹口哨嘲讽他。随着抗议者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撕毁他的画像、焚烧他的著作，即便秘密警察开枪镇压也无济于事，局势愈演愈烈。

第2天，军方也倒戈了。齐奥塞斯库和妻子乘直升机仓皇而逃，但当天就被抓获。几天后，军事法庭宣判

他们死刑，带到一个院子里枪决。^[200]

左右摇摆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下场，对苏共官员们是一个巨大冲击。改革派更加坚信，必须尽快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才能赢得民心；而顽固派则发现，一旦失去了共产极权的庇护，他们不但会失去高官厚禄，人民还将清算他们欠下的血债。

为了进一步摆脱苏共的束缚，戈尔巴乔夫想继续模仿西方，让总统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在1990年3月的人代会上，他当选为苏联总统。接下来，各共和国也纷纷效仿，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非对中央负责，中央的控制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了。这次大会还修改了《宪法》，取消了苏共的一党独裁，实行多党制。^[201]

这时，苏联非法生产生物武器的行径又被美国和英国发现。苏联辩解说，这只是出于防御目的。但美英两国并不认可这个理由，苏联最终被迫答应停止生产。几个月的争吵，并没有换来美苏的任何安全协议。

5月31日，两国峰会在白宫举行，随后转到了戴维营。戈尔巴乔夫说，他将在苏联实施经济改革，老布什

则提醒他一定要坚持到底：“改革就像怀孕——你不可能有点儿怀孕。”戈尔巴乔夫深有同感。他还告诉老布什，自己现在“非常焦虑”，如果没有外国援助，苏联会面临一场“灾难”。但老布什仍表示爱莫能助，因为美国法律不允许。

由于经济仍然毫无起色，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日益不满，而顽固派的反对声音也越发强烈，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已经不稳了。

为了安抚顽固派，戈尔巴乔夫决定对他们做些让步。12月20日，面对顽固派企图赶走改革派官员、镇压要求独立共和国的严峻形势，戈尔巴乔夫的最亲密盟友、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独裁就要来了，我负责任地说这句话……我要退休了……无论如何，我都相信：独裁注定失败；未来属于民主。”此前，他向美国驻苏联大使透露了心里话：“我不愿成为手上沾满血腥政府的一分子。”

退党大潮

就摆脱苏共而言，叶利钦比谢瓦尔德纳泽走得更远。早在1990年7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已当选俄罗斯议会议长的叶利钦，就公开宣布退出苏共，由此引发了一

场退党大潮。

叶利钦的退党想法，源于他 1989 年 9 月访美期间。当时，他以最高苏维埃委员（相当于西方国会议员）身份，参观了美国 11 座城市和约翰逊航天中心。其中，最令他感到震撼的地方是繁华的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和苏联空荡荡的商店形成鲜明对比。他的顾问说，这次访美“使叶利钦对布尔什维克最后的一点‘觉悟’也瓦解了”。

在纽约，叶利钦乘坐直升机在自由女神像上空盘旋了两圈。然后他告诉助手，这样一来，他就拥有了“双倍的自由”。

叶利钦后来对媒体说：“这么多年来，我被灌输——包括阅读《共产党简史》——而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印象，对美国的印象，以及对美国人的印象，在我到那里一天半的时间里，发生 180 度的转变。”

现在的戈尔巴乔夫还不敢退党。他唯恐这个仍控制苏联的党把他赶下台。叶利钦在宣布退党的几天前，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段对话。戈尔巴乔夫评论那些苏共书记们：“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除了饲料槽和权力，他们什么也不要。”叶利钦劝他说：“离开他们吧……你看清楚这个党是怎么回事了，事实上，

你是人质，是替死鬼。”戈尔巴乔夫无奈地回答：“你难道认为我不懂吗？我明白。但是我不能让这只脏狗挣脱绳索，否则，整架机器都将反对我。”

其实，一旦精英们开始退党，苏共离垮台就不远了。在很多人心目中，党员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提升地位的台阶，而是一种耻辱。于是，很多党员采用了一种低调的方式退党：他们或是拒交党费，或是拒绝参加党的会议，或是拒不执行党的任务，结果被开除出党。仅在叶利钦公开退党的1990年，苏共就失去了270万党员，就连在日内瓦工作的14位苏联外交官都退党了。1991年6月，谢瓦尔德纳泽也宣布退党。

退党大潮极大地削弱了苏共，苏共高层非常恐慌，但束手无策。到1991年7月1日，主动退党和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已高达400多万，占党员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分崩离析

随着苏共的快速瓦解，各共和国的民族意识也达到了高潮，苏联正在走向分崩离析。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受其影响，到1990年夏天，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共和国，也都各自宣示了主权，这意

意味着共和国法律将高于苏联法律。到1991年初，苏联中央部门已无力行使职权，军队士气低落，就连克格勃也不知道该干些啥。

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的态度日趋强硬，最让谢瓦尔德纳泽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指控立陶宛违反了《宪法》，责令他们“废除此前通过的所有违宪法令”。第2天，苏军伞兵部队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些建筑物。2天后，克格勃精锐阿尔法突击队，又攻占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导致一些民众被杀，几百人受伤。

尽管戈尔巴乔夫否认自己下令屠杀，但人们认为，至少他没有去阻止。这场血腥镇压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恶劣影响。人们对他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一位戈尔巴乔夫的前顾问在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民主人士纷纷离开戈尔巴乔夫，聚拢到叶利钦周围。

戈尔巴乔夫也发现，自己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不过，他仍然以“先知”自居：“结局总是先知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我被钉上十字架的时间也要到了。”

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这个普选产生的“小总统”，控制着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17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高层会议上警告，如果苏联无法恢复秩序，就可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垮台。与会者一时鸦雀无声。

7月17日，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在伦敦继续会谈。他问老布什，你希望苏联变成什么样儿？老布什回答说，美国希望苏联变成一个民主、有活力、可以融入世界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再次要求他提供援助，帮助苏联度过难关。老布什说，如果苏联不能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协调好与各共和国的关系，就无法指望外来投资。戈尔巴乔夫回国时两手空空，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忧心忡忡：“十个天使也救不了我们。”

当月30日，老布什来到莫斯科。第2天，他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确定各自部署的核弹头不得超过6,000枚，导弹发射装置不得超过1,600个，到2001年，双方还将销毁80%的战略性核武器，实现了里根削减核武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改革卓有成效，但是，党内顽固派却已经对他非常不满，准备联手把他赶下台。

“8·19 政变”

1991 年 7 月 29 日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别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们商定在 8 月 20 日，召集各共和国签订新《联盟条约》，赋予它们更多权力。新联盟政府将不再有克留奇科夫等顽固派官员的位置。他们没想到，这位克格勃主席早有二心，窃听了他们的谈话。

克留奇科夫和许多其他苏共高官一样，起初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认为改革能巩固党的统治。可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改革将导致党垮台时，他们就变成了反对者。尽管他们未必真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和党共存亡的。

于是，克留奇科夫急忙暗中联络其他顽固派高官，包括总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国防部长亚佐夫（Dmitry Yazov）等实权人物，商定趁戈尔巴乔夫度假之机发起一场政变。

8 月 18 日下午，在克里米亚海滩别墅，戈尔巴乔夫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想询问是怎么回事，却突然发现所有电话都被切断了。这些客人是政变团伙派来的代表。他们劝说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并赞成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拒绝签署任何文件，把他们赶出

了房间。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

8月19日凌晨6点，苏联媒体播出的一条新闻震惊了世界：戈尔巴乔夫已经被罢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持续6个月；各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停止活动，禁止罢工和游行；对媒体实施监管；必要时将实施戒严。一些民主领袖已经被列入克格勃抓捕名单。

叶利钦看了电视公告，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政变。他发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已无法接通，赶紧召集俄罗斯政府官员商讨对策。他们很快发布声明，宣布紧急委员会非法，号召人民大罢工，直至戈尔巴乔夫出面讲话。

此时，坦克已经把俄罗斯议会大楼包围。叶利钦爬到一辆坦克上面，向前来声援的莫斯科市民宣读了声明。大楼前聚集的市民达到了几万人。他们和士兵聊天，要求他们不要镇压老百姓。

叶利钦能借助的只有强大的民意。20日中午，10万市民在议会大楼前集会，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俄罗斯最著名的当代诗人甫图申科（Yevgeniy Yevtushenko）、举世闻名的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遗孀邦纳（Yelena Bonner）等人轮流上台演讲，持续了3个小时。人们不断呼喊：“叶利钦，我

们支持你！”“审判临时政府！”

当邦纳演讲时说道：“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统治我们，指使我们。但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人，真正的人，而不是牲口。”集会的人群沸腾了。集会组织者呼吁人们守在这里，捍卫议会大楼，人们纷纷响应。

傍晚时分，叶利钦接到了老布什总统打来的电话。老布什告诉他：“所有美国人都支持你。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正确。”这使他信心大增。

起初，克留奇科夫并没想抓捕叶利钦，他期望把叶利钦拉到自己这边，但现在看来显然不可能。于是，他下令抓捕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但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拒绝执行命令，他们不想攻打民选的俄罗斯政府。国防部长亚佐夫打电话要求手下进攻议会大楼，空军司令和空降兵司令也都拒绝行动。

但在凌晨，还是有军队对议会大楼发起了进攻，导致3人死亡，很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亚佐夫赶紧下令停火。他发现，政变团伙的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只有他在“干脏活”。21日早8点，亚佐夫命令部队全部撤出莫斯科。他告诉惊讶的同伙们，他不会做一个军事独裁者。政变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飞往克里米亚，想争取戈尔巴乔夫的宽恕。戈尔巴乔夫对他们避而不见，转而登上了叶利钦派来的专机，飞回了莫斯科。在飞机上，他对助手说：“我们将飞向一个新的国家。”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这句话将一语成讖。

参与政变者很快都被逮捕，有几个人自杀。22日，重掌大权的戈尔巴乔夫在记者会上，竟然继续重申自己追随社会主义信仰，他“必须尽力确保改革我们的党，使其成为改革的有生力量。”这番话让改革派大失所望，认为政变并没有让他认清共产党。然而，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发现，他已经无党可依了。

苏联解体

就在戈尔巴乔夫开记者会的同时，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市政府组织了大型集会游行。为避免伤亡，他们阻止人们冲进武装守卫的克格勃大楼，并建议拆除楼前的克格勃创始人“铁人费利克斯”雕像。

到午夜时分，安装雕像的螺栓终于被拧断了，起重机把雕像连同基座吊了起来。人们欢呼雀跃，喊着“打倒克格勃！打倒苏联！打倒刽子手！”在整个拆除过程中，三幢克格勃大楼漆黑一片。每当有办公室亮灯，人

们就朝它大声呼喊，直到灯光熄灭。人们说：“他们害怕我们。”

集会的人群并没有散去。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开会时，得知苏共官员正在销毁参与政变的文件。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关闭苏共中央大楼，以便彻查。莫斯科市官员拿着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冲到苏共中央，要求所有人马上锁上办公室回家。

此时，抗议的人群已经围住大楼，喊声震天。莫斯科市官员警告苏共官员：“除非你们安静地离开，否则我们会把这里的每个人都撕得粉碎。别再做蠢事了，照我们说的做！”数以千计的苏共官员们被迫灰溜溜地走出大楼。人们朝他们高喊：“可耻！可耻！”

8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多项命令，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解散了背叛他的苏共中央，让地方党组织自谋出路，授权地方苏维埃控制共产党财产。乌克兰的共产党组织很快被取缔，俄罗斯也禁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至此，93年历史的苏共不复存在了。

同一天，在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引起了更大的波动——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了《独立宣言》，并决定在3个月后对独立全民公投。就在几天前，波罗的海3国谴责了政变，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先后

宣布独立。9月6日，苏联正式承认了波罗的海3国独立，由此树立了一个先例。到1991年9月底，大多数共和国也都宣布了独立，开始和戈尔巴乔夫就新联盟条约谈判。

12月1日，乌克兰公投结果出炉，90%的选民赞成独立。几天后，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白俄罗斯议会议长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来到白俄罗斯境内的一座猎场别墅，商讨联盟事宜。

克拉夫丘克说，公投已经决定了乌克兰的未来。他们不需要加入任何形式的新联盟。而叶利钦认为，新联盟里如果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也不会加入。最后，这三个国家领袖放弃了联盟的想法，商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这等于苏联这三大创始国合法解散了它。《苏联宪法》一直冠冕堂皇地保证，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无力回天，只能接受这个结果。12月25日圣诞节，他通过电视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克里姆林宫的镰刀斧头国旗落下，换上了俄罗斯国旗。至此，苏联正式解体。

两个月后，老布什总统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世界上发生的最大事情就是：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长久的恐惧结束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 * * * *

英国历史学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生动地总结说，推翻共产政权，在波兰用了 10 年，在匈牙利利用了 10 个月，在东德用了 10 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只用了 10 天。^[202]

里根发起的“星球大战计划”，加剧了和苏联的军备竞赛，拖垮了已陷入危机的苏联经济，实现了“把它们耗到死”的目标。与此同时，他敦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议程，推动了苏联的民主转型。老布什继续推进了这些议程，并最终完成了削减核武器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积极响应美国的要求，让苏联人了解西方世界和苏共黑幕，尝试民主选举，给各共和国更多自主权，从阿富汗和东欧各国撤军。最后，又解散了苏共，和美国携手结束了冷战，对实现世界和平功不可没。

可悲的是，就在多数苏联人都认为共产党不可救药

之时，戈尔巴乔夫不但死抱着它不放，还不断向顽固派妥协，导致改革派纷纷离他而去，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和悲剧性人物。

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早日看清——共产党才是导致一切危机的根源，逐渐壮大改革派，削弱顽固派，及早解体苏共，实现和平转型，或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历史潮流，民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中共却并没有吸取苏联解体的正面教训，走了一条和戈尔巴乔夫截然不同的路。我们要想解体中共，就得先搞清它的来历，以及它是如何起家的。

致谢捐助人

本书和“美国常识丛书”的问世，直接受益于观众朋友们的慷慨捐助。我在此代表斯考森教授和所有读者，向以下几位捐助人致谢：

Xi Gao 和 Joe Lin

Yi Fei

Yuan Ping

Nien T.Chang

Arlene Chang

Amber Chang

Alvin Chang

Sara Huang

你们不仅是在帮助传播真相，普及美国常识，也是在书写历史！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方伟' (Fang Wei).

致谢出版团队

在本书中文增补版的创作与出版过程中，蒙受许多友人与专业人士的鼎力相助，谨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开新出版社责任编辑 Kevin Bai 的悉心指导与专业协助，使全书内容更加严谨、通俗易懂。他亦提供了多项宝贵的修改建议，对于书稿的提升贡献良多。

责任校对 Ming Yuan 与 Chingyi Wu 以一丝不苟的精神投入，使本书的文字表达更臻精准，阅读体验大为提升。排版设计师 Sarah Gao 则展现出非凡的专业与耐心，反复调整版面，精益求精，令本书在视觉呈现上达到极高水准。

在英文翻译方面，感谢 Carl Xia、Joseph Fan、Janice Liu 与 Yuan Zhang 的热心协助，尤其 Carl Xia 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堪称此一工作中最重要的贡献者。

增补第七章至第十三章的创作亦有赖众人支持与合作。在此特别感谢高原、徐阔与 Janice Liu 对第九章

的贡献，高原亦对第十三章提供了关键协助；徐阔同时亦参与了第十六至第十八章的部分内容的编纂。

此外，本书所新增内容广泛参考了多位学者与专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与深刻见解，对本人启发尤深。碍于篇幅限制，兹仅列举部分对本书影响深远之学者，以表谢忱（排名不分先后）：辛灏年、谢幼田、张戎、乔·哈利戴、冯客、何清涟、程晓农、远藤誉、高华、丁抒、辛子陵、李锐、杨继绳、郭岱君、文安立、李志绥、李云汉、吴仁华、张庆洲、罗伯特·瑟维斯、小杰克·马特洛克、沙希利·浦洛基、白邦瑞等。

诚然，因个人能力与经验所限，书中或仍难免存在疏漏与错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与补充，以期日后得以更臻完善。

方伟

作者简介

克里昂 · 斯考森 (Cleon Skousen)



克里昂·斯考森博士 (1913 ~ 2006 年)，是著名演讲家、教师和作家。他著书几十本，包括《裸体的共产党》、《飞跃五千年》等畅销书。他还创建了国家《宪法》研究中心，在美国各州和四十多个国家讲学，向三百多万人讲授《宪法》。他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部门主管和公共演讲人。

保罗 · 斯考森 (Paul Skousen)



保罗·斯考森是《美国宪法》学者、作家和大学教授，著书 15 本，对《美国宪法》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化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他还曾任职中央情报局 (CIA)，担任里根总统的白宫情报官。他拥有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国家安全研究的

硕士学位，以及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新闻学学士学位。

方伟



方伟是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和高科技人士，从事科技业与媒体业 30 余年，创办多家传媒和科技公司，主持和参与《方伟时间》、《走入美国》和大型讲史节目《美国史话》，对美国的历史与当代事务有深入研究。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取得计算机硕士学位。

附注

[1] 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1, 26 September 1947, Copy No. 23, declassified.

[2] Gentry, Kurt, J. Edgar Hoover: The Man and the Secret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p. 442. ISBN 0-393-02404-0.

[3] NKVD is short for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It was the Soviet's law enforcement agency primarily during Stalin's era, and was best known for running the Gulag, conducting mass executions, forcing mass deportations, committing espionage and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abroad.

[4] See John Haynes, Harvey Klehr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04 pages, ISBN: 9780300123906.

[5] Schechter, Jerrold L. (2003), Sacred Secrets: How Sovi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hanged American History, Potomac Books, p. 122, ISBN 1-57488-522-7.

[6] FBI Memorandum Mr. Ladd to J. Edgar Hoover, "To advise you the positive identification of agent Jurist (the

cover name of a Soviet agent operating in 1944 and named by Venona project) as Harry Dexter White, deceased. White was formerly th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to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orgenthau.” October 16, 1950, FBI Venona file pp. 17-18.

[7] Venona Project is one of many code names for a long-running effort by the U.S. and the U.K. to decipher Soviet coded messages intercepted primarily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roject's materials were released in 1995 and supported evidence already gathered involving several high-profile spy cases. The program ran from 1943 until 1980.

[8] WCS notation on a file copy of “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9] FBI Memorandum, L. B. Nichols to Mr. Tolson, April 6, 1945; and, Inspection Report from SAC R.B. Hood dated July 16, 1946, “Agent Skousen makes an excellent personal appearance. He dresses in a neat and conservative manner and has an affable personality He also makes numerous speeches on behalf of the Bureau, for which he has received numerous letters of commendation. He makes an excellent Bureau representative. Status: Excellent.”

[10]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entry undated but located in 1998-Jan-Mar binder.

[11] The FBI: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Athan G.

Theohari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12] From a speech by W. Cleon Skousen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1967, “The Naked Communist,”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ism Today.”

[13] W. Cleon Skousen, Peppperdine College Freedom Forum, April 13, 1960.

[14] Ibid.

[15] John Meroney, Olivia de Havilland Recalls her Role—In the Cold War,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2006.

[16]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December 28, 2002, reflections on Skousen's FBI career.

[17] Crismon Lewis interview of W. Cleon Skousen, 1998; ibid.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98.

[18]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January 28, 1948, mentions speaking in behalf of Mr. R. B. Hood on espionage and crime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Communist menace in America. Audience was 400 guests at the Jewish Men's Club of the Wilshire Hebrew Temple, the largest and wealthiest group of Jews outside of New York. Afterwards, “nearly all of those present came by to shake my hand.”

[19] Crismon Lewis interview, op. cit., 1998.

[20] Ibid.

[21] J. Edgar Hoover to William E. Fort, Jr., March 20, 1962.

[22] J. Edgar Hoover to W. Cleon Skousen, January 6, 1959. Hoover laments, “I, too, am sorry that your schedule did not permit you to drop by my office—it would have indeed been a pleasure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talking to you.”

[23] Dozens of examples citing Skousen as “one of my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were mailed from Mr. Hoover to prospective audiences announcing Skousen as his substitute. For example, in Hoover to Mr. Bernard Batty, dated March 20, 1944, “... I am very happy to suggest Mr. W. Cleon Skousen, one of my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Mr. Skousen makes an excellent speech ... Sincerely yours, J. Edgar Hoover.” WCS Journals, 1944.

[24] J. Edgar Hoover to J. Willard Marriott, May 7, 1958. See FBI personnel file on W. Cleon Skousen

[25] Crismon Lewis interview, op. cit., 1998

[26] Crismon Lewis interview, op. cit, 1998; see also W. Cleon Skousen, “J. Edgar Hoover As I Knew Him” ; see also Behind the Scenes, The Freeman Institute, November 1979.

[27] A copy of the first 17 chapters, with title page, resides in Skousen's files.

[28] W. Cleon Skousen, “My Reply to Dr. Richard D. Poll and His Critique of The Naked Communist,” self-published.

[29] Monroe Stearns, editor, Prentice-Hall, Inc. to W. Cleon Skousen, May 26, 1955.

[30]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December 28, 2002.

[31] W. Cleon Skousen to William C. Sullivan, December 30, 1957, written in response to a cordial Christmas greetings letter from Sullivan to Skousen, December 16, 1957.

[32] For example, Sullivan to Skousen, September 11, 1958, provides Stalin quotes more accurately translated than those Skousen originally used. See the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58.

[33] Cecil B. DeMille to W. Cleon Skousen, April 10, 1958.

[34] W. Cleon Skousen to Jerry L. Rowley, January 20, 1966.

[35] Skousen sent a leather-bound copy with the inscription, “March 18, 1958, To John Edgar Hoover, Whose wisdom, loyalty and integrity have powerfully bolstered this nation and the thinking of its people for nearly two generations. Please accept a copy of this volume as an expression of my deep admiration for you both as a person and as the leader of the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 you have built. Sincerely, [signed] W. Cleon Skousen.”

- [36] J. Edgar Hoover to W. Cleon Skousen, April 2, 1958.
- [37] J. Edgar Hoover to W. Cleon Skousen, May 21, 1959.
- [38]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58-1961.
- [39] Skousen said Stanley Tracy “was the immediate assistant to Mr. Hoover for many years. I worked closely with him on a number of important projects for the Director When I wrote the Naked Communist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FBI officials to give it a warm endorsement.”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98-Jan-Mar binder.
- [40] Paul Harvey to W. Cleon Skousen, October 7, 1958.
- [41] Samuel C. H. Ling to W. Cleon Skousen, December 1, 1958.
- [42] Dr. George K. C. Yeh to W. Cleon Skousen, October 8, 1958.
- [43] George E. Sokolsky, These Days newspaper column, January 14, 1959.
- [44] Ronald Reagan to Mrs. John Mathias, February 19, 1964, op. cit, WCS Journals, 1964.
- [45] Look Magazine, March 13, 1962.
- [46] Congressional Record—Appendix, pp. A34-A35,

January 10, 1963, Current Communist Goals, Extension of Remarks of Hon. A. S. Herlong, Jr. of Florida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47] FBI Memorandum, A. H. Belmont to L. V. Boardman, April 8, 1958, ref. 67-69602.

[48] Visit to the CIA headquarters building, May 1986, with son Paul B. Skousen.

[49] Patricia Cohen, "Leftist Scholars Look Right At Last, And Find A Histor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98.

[50]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48-49.

[51] Los Angeles Mirror, October 17, 1961.

[52] W. Cleon Skousen to Eric N. Skousen, October 19, 1961.

[53] FBI Memorandum, William C. Sullivan to A. H. Belmont, January 2, 1963

[54] FBI Memorandum, M. A. Jones to Mr. DeLoach, August 10, 1964.

[55] Ibid.

[56] W. Cleon Skousen to J. Edgar Hoover, June 12, 1962.

[57] Crismon Lewis interview, op. cit., 1998.

[58] Ibid.

[59] Ibid.

[60] TIME Magazine, April 4, 1960.

[61] FBI Memorandum, C. D. DeLoach to Mr. Mohr, March 31, 1960.

[62] William C. Sullivan, assistant director at the FBI and personal friend, wrote,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in my mind that being a man of principles and ideals, with your courage to adhere to them, you have run afoul of opposing forces of the world.” William C. Sullivan to W. Cleon Skousen, April 4, 1960, WCS Journals 1960.

[63]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60-1961: Angry crowds left a burning cross on Lee's lawn with “Lee, you are a fool” ; TIME Magazine wrote that Lee was “beyond doubt the most unpopular man in town,” April 4, 1960.

[64] J. Bracken Lee to Education Information, Inc., August 16, 1960. All administrative staff rejected Mayor Lee's charges. The daughter of one secretary was paid by Skousen to do some typing for him, but she was not a city employee. Journals of W. Cleon Skousen, 1960.

[65] See, for example, Dennis L. Lythgoe, Let ‘Em Holler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J. Bracken Lee, Utah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2.

[66] JoAnn Jacobsen-Wells, "J. Bracken Lee, at 83, Still Pulls No Punches," Salt Lake Tribune, August 10, 1981.

[67] See Rudger Phelps, "J. Bracken Lee's Biggest Political Blunder" 1961.

[68] Police Mutual Aid Magazine, April 1960; Gunsmoke, April 1960.

[69] Journals of Paul B. Skousen, 1985-1988.

[70] Wilson, Edmund, To the Finland Station, pp. 217-218.

[71]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209-308.

[72] Wilson, Edmund, To the Finland Station, p. 115.

[73]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383-384.

[74]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157-158.

[75]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202-204.

[76]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248-249.

[77] Ruhle, Otto, Karl Marx, pp. 262.

[78] Engels, Friedrich, Ludwig Feuerbach,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p. 31.

[79] Conze, 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N.C.L.C Society, 1936, p. 35.

[80] 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see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by Dr. Charles McFadden, pp. 177-184.

[81] 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211-240 页，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2]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第 187-190 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3] Engels Friedrich *Anti-Duhring*, p. 138.

[84]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第 190 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5] 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see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by Dr. Charles McFadden, pp. 193-194.

[86] 《地球面临第六次大灭绝危及人类生存文明延续》，BBC 中文网，2020 年 6 月 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2891972>

[87] Quoted by V. I. Lenin in *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 p. 125.

[88] Engels, Friedrich, *Anti-Duhring*, p. 79.

[89] 《惠虎宇：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11）》，大纪元新闻网，2018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15/n10486200.htm>

[90]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和门客共同编著，《淮南子·天文训》：道曰规，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https://ctext.org/huainanzi/tian-wen-xun/zh>

[91]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第 173-176 页，人民出版社，2004 年。

[92] McFadden, Charles J.,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p. 50; see also C. Porter, *The Carbon Compounds*, p. 10.

[93] 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第 262 页，人民出版社，2010 年。

[94]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第 177 页，人民出版社，2004 年。

[95] Engels, Friedrich, *Anti-Duhring*, pp. 78, 85.

[96] Engels, Friedrich, *Anti-Duhring*, p. 18.

[97]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 197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

[98]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 202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

[99] 纪录片《揭开生命的奥秘》，Illustra Me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U1SCxcvbk>

[100] ERRY BERGMAN, PH.D.Ernst Chain: Antibiotics Pioneer.
TUESDAY, APRIL 01, 2008.

<https://www.icr.org/article/ernst-chain-antibiotics-pioneer>

[101] Sir 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1728. p. 504-505. https://redlightrobber.com/red/links_pdf/Isaac-Newton-Principia-English-1846.pdf

[102] Karl Marx, Poverty of Philosophy, pp. 152-153.

[103] Selected Essays of Marx, p. 16.

[104] Joseph Stalin, Leninism, Vol. 1, p. 387.

[105] Quoted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77, pp. 1539-1540.

[106] Friedrich Engels, quoted in the Handbook of Marxism, p. 249.

[107] V.I. Lenin, Religion, p. 47.

[108] Quoted by Gabriel M. Roschini in his article, "Contradictions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Soviet Russia," which appears in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by Giorgio La Pira and other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2, pp. 97-98.

[109] Outchit Gazeta, October 10, 1929. Quoted by Charles J. McFadden in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sm*, pp. 292-293 and note.

[110] Lenin, V. I., *Religion*, p. 47.

[111] William Z. Foster, *Syndicalism*, p. 9.

[112] Marx-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p. 12.

[113] J.E. LeRossignol, *From Marx To Stalin*, pp. 152-153.

[114] 章天亮,《中华文明史》上册,第5-10页,飞天大学出版社,2022年。

[115] 丁抒,《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修订本,第七章和第十八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年;《反右研究文集》,第176页、187-188页,劳改基金会 & 中国信息中心,2008年。

[1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117] Ralph E. Blodgett,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p. 735.

[118]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 187.

[119] E. Burns, *Handbook of Marxism*, p. 745.

[120] Related by Thomas J. Shelly, instructor in Economics

and History, Yonkers High School, Yonkers, New York.

[121] From a letter of Andrew D. White dated at Berlin, Nov. 9, 1885, in the White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22] William Bradford, History of Plymouth, pp. 160-162.

[123] 请参阅下册附录 “什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124] Final Report of the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April 1953, p. 208.

[125] Excerpt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to the 76th Congress, January 3, 1939, pp. 18-21.

[126] Chambers, Whittaker, Witness, p. 164.

[127] Chambers, Whittaker, Witness, p. 229.

[128] Elizabeth Bentley, Out of Bondage, pp. 173-174.

[129] In 1951 he wrote a book on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on page 220 declared: “The USSR,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and China lead the world struggle for peace.”

[130] This chapter in Stalin-Hitler relations is discussed by General Krivitsky in his book,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131] Speech of Harry Hopkins quoted in Roosevelt and Hopkins, by Robert E. Sherwood, p. 588.

[132] A rather complete summary of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James Burnham, *The Web of Subversion*,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54

[133]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anadian Commission*, p. 663.

[134] *Life magazine*, August 30, 1948, p. 94.

[135]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1, 1955, p. 41, in an article entitled: "U.S. Was Warned of Soviet Double Cross."

[136]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1, 1955, p. 40.

[137]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10, 1954, p. 29, in an article entitled: "Six Weeks That Shaped History."

[138] *The U.N. Today*, H.W. Wilson Company, New York, 1954, p. 198.

[139] See the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January 3, 1939, pp. 18-21.

[140]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f Canada*, p. 655.

[141] Report by the Continental News Service, November 8, 1946, and quoted in *The Communist Threat to Canada*, Ottawa, 1947, pp. 10-11.

[142] 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Harpers, New

York, 1947.

[143] For a rather full report by this official who saw the fall of China see *Fifty Years In China*, by John Leighton Stuar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5.

[144] See Report of the McCarren Committee To the Senate, p. 1049 and also Report of the Hearings on Philip Jessup's Nomination, pp. 714-721. For Budenz's testimony, see Report of the McCarren Committee To the Senate, p. 148.

[145] A full article on this them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Daily Compass*, July 17, 1949.

[146] The role of the FBI is well presented in *The FBI Story*, by Don Whitehead, Random House, 1956.

[147] *U.S. News & World Report*, "Socialists Sour on Socialism," July 8, 1955, p. 48.

[148] 台湾政治学术期刊《问题与研究》第十四卷第十九期：
chrome-extension://efaidnbnmnnibpcajpcglclefindmkaj/
<http://wenti.nccu.edu.tw/upload/%E8%98%87%E4%BF%84%E8%88%87%E5%8C%AA%E5%85%B1%E7%AB%B6%E7%9B%B8%E8%B5%A4%E5%8C%96%E6%9D%B1%E5%8D%97%E4%BA%9E%E7%9A%84%E9%99%B0%E8%AC%80.pdf>

[149] Article in *Pravda*, May 5, 1955, by Major General D. Korniyenko.

[150] Quoted by Joseph Z. Kornfeder who was a student at the school. In a letter to Dr. J.D. Bales of Harding College dated March 7, 1961, Mr. Kornfeder said: "Enclosed is a copy of the quote you asked for. It is part of what he (Manuilsky) said to a group of senior Lenin School students at a conference held in Moscow, March, 1930, at which I, as one of the students, was present."

[151] The Crimes of Khrushchev,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September 1959, Part 2, pp. 1-2.

[152] The Crimes of Khrushchev,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59, Part 3, p. 12.

[153] "How a Free Nation Was Killed,"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16, 1956, p. 94.

[154] Preamble of the U.N. Charter.

[155] The Bang-Jensen case is treated fully in a recent book, *Betrayal At the U.N.*, by DeWitt Copp and Marshall Peck, Devin-Adair, 1961.

[156] "Russia's Growth Under Communism Less Rapid," by Dr. Warren Nutter,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 1959, p. 75.

[157] "Russian Plan Cuts Down Schooling,"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3, 1959.

- [158] “Why Russia Is in Troub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25, 1955, p. 58.
- [159] “Russ Admit 50 Percent Drop in Farm Output,” Los Angeles Examiner, January 11, 1961.
- [160] The Crimes of Khrushchev,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59, Part 1, p. 3.
- [161] The Crimes of Khrushchev,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59, Part 1, p. 3.
- [162] “U-2 Making the Points,” Newsweek June 12, 1960, p. 38.
- [163] “Arms Chief Weighs U-2 Futur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7, 1960, p. 45.
- [164] “The World's Big Spy Game,”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23, 1960, p. 47.
- [165] Congressional Record, April 29, 1954, p. 5708.
- [166] Paris Report of Hilaire Du Berrier, September 1960, p. 1.
- [167] The four speeches of Senator Thomas A. Dod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a pamphlet by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It is called The Crisis in the Congo (1961).
- [168] Thus far the best political history on Fidel Castro is Red Star Over Cuba, by ex-Communist Nathaniel Weyl, Devin-

Adair, 1960.

[169] Alberto Nino, *Antecedentes y Secretos del 9 de Abril*, Editorial Pax, Bogota, 1949, p. 77.

[170] Nathaniel Weyl, *Red Star Over Cuba*, p. 33.

[17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port, *Investments in Cuba*, p. 184.

[172] Nathaniel Weyl, *Red Star Over Cuba*, p. 157.

[173] Pravda, Moscow, February 29, 1960.

[174]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59, "Fear of Red's Role in Castro Regime Alarming Havana."

[175] Nathaniel Weyl, *Red Star Over Cuba*, p. 180.

[176] 本节内容，主要引自《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美]沙希利·浦洛基著，孙宁、王梓诚翻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同时参考了《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美]迈克尔·多布斯著，陶泽慧、赵进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和《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第十一章（文安立著，陈柏旭、林书嫩译，联经出版公司，2023年。）

[177] 本章内容，除专门标注部分外，主要参考了罗伯特·瑟维斯著，周方茹译，《冷战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小杰克·马特洛克著，张敏谦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第四章，上海三联文化出版社，2021年；沙希利·浦洛基著，宋虹译，《大

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78] 文安立，《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第十四章，联经出版公司，2023 年。

[179]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四篇第二章第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80] Ronald Reagan,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Acceptance Speech, 1980, 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republican-national-convention-acceptance-speech-1980>

[181]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 版）第四篇第二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182]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o.75, “U.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 , 17 January 1983.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tclefindmkaj/https://irp.fas.org/offdocs/nsdd/nsdd-75.pdf>

[183] The Reagan Diaries, e-book, p32,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May 2007.

[184] Pope stared down Communism in homeland - and won, CBC News Online, April 20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630153609/http://www.cbc.ca/news/obit/pope/communism_homeland.html

[185] Hedrick Smith, REAGAN's GAFFE,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6, 1984.

<https://www.nytimes.com/1984/08/16/world/reagan-s-gaffe.html>

[18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1988, Volume V, Soviet Union, March 1985–October 1986, p698, 700–702.

[187] Defence: MT letter for President Reagan, p1-4, 1986 Feb 11,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200455>

[188] John M. Goshko, Spy Game Occupies U.N.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8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6/03/16/spy-game-occupies-un-again/9b567ef9-b719-4525-b312-c4a1287323a2/>

[189] 联合国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背景信息。 <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chernobyl-remembrance-day/background>

[190] History.com Editors, Chernobyl, April 24, 2018.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1980s/chernobyl>

[191] Pavel Podvig, Did StarWars Help End the ColdWar? Soviet Response to the SDI Program, Science & Global Security, Science & Global Security 25, no. 1 (2017): 3-27

https://scienceandglobalsecurity.org/archive/2017/01/did_star_wars_help_end_the_col.html

[192] U.S.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Reagan-Gorbachev, First Meeting, 11 October 1986.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tclfindmkaj/<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03/Document09.pdf>

[193] Tom LeCompte, The Notorious Flight of Mathias Rust, Smithsonian Magazine, July 2005.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ir-space-magazine/the-notorious-flight-of-mathias-rust-7101888/>

[194] 文安立，《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第十一章，联经出版公司，2023年11月。

[195] Remarks on East-West Relations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in West Berlin, June 12, 1987,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remarks-east-west-relations-brandenburg-gate-west-berlin>

[196]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Elimination Of Their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 (INF Treat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s://2009-2017.state>

gov/t/avc/trty/102360.htm

[197]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98]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五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99] 《柏林墙 30 周年:撼动世界格局的 1989 年》,BBC 中文网,2019 年 11 月 7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335418>

[200] 冯客,《独裁者养成之路:八个暴君领袖的崛起与衰落》第七章,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 2 月。

[201]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202] Ronald Grigor Suny, Empire Falls: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The Nation, October 28, 2009.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empire-falls-revolutions-1989/>

增补内容网络来源备份库: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fFLPyrsOPluX7rWqNBtJ2B59QPJOWdQ?usp=sharing>